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紀念 第十三編

傳道義在河套

(續編)

周北宇題



9~

三區新舍

015000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05.10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十三辑

# 傅作义在河套

(续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  
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一九九二年八月

封面题字：陈北坤

封面设计：三俊郎

责任编辑：张启富 主任编辑：冷国雁

巴拿马历史资料 第三卷（内附地图）

编辑：中国民族出版社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辑委员会文光部 杨海、王会

印刷：巴拿马国家出版社印刷厂

书号：内部发行字（总第）第 30 号

## 编辑说明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八辑《傅作义在河套》一书出版之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河套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和傅作义先生的老同事、老部下及其亲属后裔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对于存史、资政、团结、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也有一些知情者提出，《傅作义在河套》一书，虽然将傅先生在河套期间的所作所为的主要方面作了如实、具体、生动的反映，但是仍然有一些事件或反映得不够详尽或无所反映。为了拾遗补缺，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出傅先生在河套七年之久所作出的业绩，决定出版《傅作义在河套》（续编）以飨读者。于是，我们派出专人赴呼和浩特、北京、山西、河北等地寻访知情者，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同时，查阅了大量的书刊、资料。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工作，又新征集到三十多万字有关傅的资料。经认真的筛选、精选，力求避免重复、累赘，最后选定约15万字价值较高的史料，在“续编”中出版。

“续编”是由盟政协文史委和杭锦后旗政协文史委协作成书的。在征稿过程中得到了过去傅先生的老同事、老部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

应当提到的是，傅先生过去的老部下，现在北京市丰台区的政协常委苗玉春同志，他不仅亲自为“续编”撰写稿子，而且热心帮助我们走访知情人组稿。原杭锦后旗政协副秘书长、文史委副主任、巴盟政协文史委委员张启高同志，更是从“续编”征稿到编辑出版，他都参与工作，付出了不少辛劳，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征稿工作肯定还会有不周之处，加之编辑水平所限，疏漏、谬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知情者批评指正。

《傅作义在河套》（续编）编辑小组

一九九二年八月

## 目 录

- 河套地区抗日戏剧活动及其他片断回忆  
.....凡塞(1)
- 抗战期间三十五军的政治工作忆述  
.....张鸿恩(39)
- 抗战初期傅将军培训军政干部开展敌后工作的忆述  
.....董然韬(83)
- 抗战时期在河套的片断回忆  
.....高映明(91)
- 抗日时期的绥远省政府  
.....李福祺(110)
- 游击军抗日和五原大捷回忆  
.....刘万春(129)
- 回族劲旅乌镇阻击战亲历记  
.....白震(143)
- 骑七师在河套  
.....丁子敬忆述、丁源盛整理(156)
- 忆骑七师的几件事  
.....许庆阳(168)
- 傅将军在河套组训国民兵  
.....白震(176)
- 傅部东进受降抢架胜利桥的经过  
.....张振耀(185)

傅将军在河套创办银行、制鞋、制糖厂的  
回忆

..... 据陈德起、周汝智、张连武资料整理 ( 199 )

傅将军在河套惩治烟赌脏的部分回忆

..... 张振耀、殷华生 ( 209 )

忆傅将军的几件事

..... 据张振耀、姚毓斌、萧如芝来稿整理 ( 216 )

傅将军在河套整军经武励精图治

..... 樊真 ( 221 )

# 河套地区抗日戏剧活动 及其他片断回忆

凡 塞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北国边疆，活跃着一支救亡文艺队伍，使沉睡的茫茫草原，唱起响彻云霄的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戏剧，鼓舞了河套军民的抗日热情，坚定了抗日胜利的意志。使话剧这一艺术形式，播种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傅作义将军对于戏剧宣传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对演员非常器重，不时与我们亲切会谈，具体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段历史对我来说，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当年我们还是风华正茂，而今我已年届八旬，幡然老翁矣。然而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往事，仍历历在目，每逢与当年战友晤谈，仍兴味盎然，竟忘老之已至。

我是怎样参加傅部的？请让我从头说起：

一九三七年开始，我参加了“中剧救亡演剧队”在津浦线、陇海线沿线各地，进行救亡戏剧演出，当年冬天到达西安，在这座古城的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学校和农村，演出了不少宣传抗日的街头剧、活报剧，起到了战时



的鼓舞作用。这个剧团的成员，大多是各地的流亡青年，剧团是自动结合的群众团体，没有经济来源，进入一九三八年，便靠在西安的剧场作营业演出的收入来维持。当时剧团里有些电影界、话剧界的著名演员，如周伯勋、宗由、赵曼娜、冷波、李次玉、童凤人、丁尼、王者、李畏、凡塞等，团长是“中旅”名演员戴涯。演出《日出》、《雷雨》、《李秀成之死》和《黄花岗》等名剧。白天仍到街头广场进行宣传演出，曾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合作演出过塞克编写的话剧《歼灭》。到了下半年，一些演员陆续离开，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重庆，剧团面临解体。正在这时，傅作义将军以北路军总司令部名义，派于纯斋、崔载之到西安招收干部，我和李畏认为到前方从事实际的抗日工作，比在城市里搞营业演出有意义得多。而且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傅作义将军在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中率部英勇杀敌，特别是百灵庙大捷，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还是为绥战慰劳募捐的积极分子，我们敬仰傅将军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愿意在他领导下，从事抗日工作，便毅然决然的报名参加了傅将军的所部。当时一起参加的共五十七人，都是各地流亡青年，大约有半数是延安抗大或陕公的毕业学员，而且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另

外一半也是进步的爱国青年，其中不少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都是抱着抗日爱国的激情，决心到前方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记得其中是共产党员的有白杨、李特（廖志恪）（女）、朱光甫、葛红、丁文川（尹育然）等；“民先”队员有萧离、萧凤（女）、高坪（高招弟）（女）、向石青、凡塞等人。另外，还有杨格非、耿庄民（女）、朱绍斌、肖金钟等人，都是积极抗日、进步爱国的青年。我之所以着重叙述这些，是要说明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傅作义将军非常敬佩共产党、八路军，特别羡慕他们的部队政治工作。他派于纯斋到西安招收干部，主要是政工干部，并强调不分党派，尽量招收决心抗日的爱国青年，特别欢迎曾在延安学习过的人，把他们作为基本骨干力量。这也说明傅作义将军在那个时期，有真心实意与共产党八路军密切合作，并向他们虚心学习的强烈愿望。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于纯斋领导下，这个生气勃勃、充满青春活力，满怀抗日热情的青年团体，便从西安徒步向晋西北进发。途经延安，住了十来天，参观了抗大、陕公、鲁艺、马列学院，看了京剧和话剧，毛泽东主席还亲自为我们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勉励我们到前方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我们行军沿途书写标语、张贴壁报，教唱救亡歌曲，在耀县、清涧、神木和榆林等地还演出过街头剧。走到那里，歌声唱到那里，一路上热火朝天，激情满怀奔向抗日前方。大约在十二月中旬，到达晋西北河曲，会见了傅作义将军。他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勉励有加，同时也强调了前方生活的艰苦和战争的残酷。我们既然是抱着抗日的决心到前方来的，谁也没有把那些艰险放在心上。在这里我们也见到了比我们早些时候从西安和延安招收来的第一批干部，有潘纪文、阎又文、鲁志浩、王中、张沧、王景泰、由竹生等人。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形。这里与贺龙将军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友邻，彼此往来密切，傅部刚刚结束绥南战役，并在八路军配合下取得一间房战斗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西北战地动员委员会，还从晋西北各县动员了三千人，充实到傅将军的部队里去。傅部的部队政治工作也初步建立起来。这批早来的同志，都成为三十五军的政工骨干。

在河曲，我们进行了几场话剧演出，主要是慰问军民。其中一次是傅将军召开一个盛会，由我们作汇报演出。在座的有马占山、何柱国、张励生，共产党方面的有程子华、续范亭、罗贵波和傅部将领董其武、孙兰峰、张濯清等。为了搞好

这次演出，我们自编自演了一出小歌剧《流亡曲》，是叙述沦陷区在日寇铁蹄下灾难深重，流离失所的人民反抗敌人和逃出虎口的故事情景。我们利用仅有的条件、制成茅屋苇篱的布景，汽灯罩上有色玻璃纸；用人在梁上口吹蒲绒，造成大雪纷飞的效果；加上女主角凄凉的歌声和白发老人的愤怒表情，深深打动了台下的各位领导及数百观众。这次演出，奠定了以后成立正式的话剧团体的基础。

我们在河曲住了三个星期，便奉命开往河套，仍是徒步行军，在东胜过的农历新年。那时的东胜只是一个土城圈，城里包括县长才有七家人，仅有一位女性，便是县长夫人，那是非常荒凉的。我们在旧历除夕到达后，县长好不容易才派人搞来几棵白菜和几斤牛肉，我们自己带的白面，大家高高兴兴的包饺子，女同志们自然大显身手，男同志剁馅和面，笨手笨脚的我，只能担当抱柴烧火的角色。居然在这沙漠包围的荒凉土城，美美地吃上一顿饺子，可以说是很幸运，很不寻常的。

第二天，大年初一，继续行军，路过一个叫暖水的小镇以及马占山将军司令部所在地——哈拉寨。这一带过春节，有个奇怪的风俗：家家户户门前，都堆着一个两三米高的尖塔形的煤堆，

是用二三十斤大的煤块堆垒而成，用柴草从底下点燃，从上面冒出熊熊火苗，据说从除夕晚上一直燃烧过正月十五，当地人管这叫“旺火”，取一年兴旺之意。老乡们在冬闲时，便用毛驴、牛车到附近野地里挖出煤块堆到门前，不论贫家、富家，都是如此。现在知道这一带煤炭储量非常丰富，这就是当前闻名全国的东胜神府露天煤矿，盛产工业用的优质煤。方圆几百里，平地里挖上几尺，便是这种黑色的金子。虽说不是取之不尽，但据说一两个世纪是挖不完的。伟大的祖国，到处是宝哇！

我们这些人，谁也没见过沙漠，走起来感到特别新鲜。那看不到尽头的漫漫黄沙，被风吹成层层波涛。远处沙梁上的皑皑白雪，宛如点点白帆，徜徉在这浩瀚的黄色海洋里，使人顿觉心胸开阔。为我们驮运行李和粮食的一长串骆驼，像绅士一样昂首阔步的行进。驼铃丁冬作响，却显得那么幽静，辽阔，在喧闹的都市中的人们，是享受不到这种大自然的博大奇瑰的景色的。我们这队沙漠行旅的情景，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在这库布齐沙漠里，大约走了七八天，到了黄河岸边的马七渡口。这时黄河冻着厚厚的冰层，往日汹涌咆哮的黄河，现在像熟睡的巨龙，静静的躺在那里，毛泽东主席在《沁园春·雪》

词里说的：“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北国风光，我们都真的领略到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冒着寒风，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踏着坚冰，走过数里宽的黄河，到达扒子补隆，终于踏上河套的土地。扒子补隆是个小镇，有四、五十户人家；有几间杂货铺、干货铺和小酒铺；最令人瞩目的是一座教堂。这里是安北县战时的县政府所在地，绥远游击军的军部也设在这里，就借驻在教堂里。军部对我们热情招待，安排食宿都很周到。我们从河曲出来，在荒漠中行军十多天，能美美地吃上一顿，睡上一觉，特别感到满足。崔载之告诉我们，傅作义将军已先期到达五原，打电话来命我们前去。这里距五原只有一日行程，第二天我们出发，太阳没落山，我们便到达终点目的地——五原了。

五原这座塞上小城，是古代重镇，也是军事必争之地。北伐时期，冯玉祥将军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就在这里。县城里有数千居民，有一条贯通东西约有二里长的一条街，街中心店铺林立，比较繁华。

这时，傅作义将军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他亲切的会见了我们，请我们吃了一顿手抓羊肉。他告诉我们要

整顿绥远游击军，成立政治部。我们这五十多人全部分配到政治部。政治部主任为于纯斋，秘书为崔载之。少数人（主要是女同志）留在政治部工作，大部分人全部分配到各连、团、营，担任旅、团政治部主任或营教导员，从事部队政工。我和李畏组成奋斗剧团，李畏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兼剧务主任，直属于政治部。这个奋斗剧团就成为抗战时期活跃在河套地区的一支小小戏剧队伍。实际上只有李畏和我是专业演员，专门搞戏剧工作，筹划排练和演出。其他人都另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不过是打游击式的参加演出；连主要演员肖离、肖凤也要用一部分时间做些文字宣传工作。好在都住在一处，当需要排练和演出时，便化零为整，随找随到，排演完了，再化整为零，各干各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二月间，我们全体人员又从五原回到执子补隆。绥远游击军政治部马上成立起来，大部分人深入到前方部队中去。我们的奋斗剧团在执子补隆演出了三天，都是些独幕剧和演唱些小节目，演出的话剧有：《三江好》，《打鬼子去》，《千方百计》等等。在演出间隙里，我们向老乡教唱救亡歌曲，还用当地的民歌爬山调，配上新词，使老乡们容易上口，一时歌声起伏；尤其是孩子们，三五成群的唱着救亡歌。

曲，如《游击队歌》、《开荒曲》、《洗衣歌》等，都是从延安鲁艺带来的歌曲。看戏的观众除了老乡，还有游击军各团的战士。这是我们踏上河套地区的第一次演出，也是第一次以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出现在塞上草原。

接着，奋斗剧团又马不停蹄地返回五原进行演出，同样引起轰动。这时，黄河的凌汛就要开始了，傅作义将军号召群众扩大春耕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方，并指示我们配合这项任务进行宣传。于是我们集体自编自演了多幕剧《春耕曲》，内容是揭露地主老财，不愿多开垦荒芜的土地，甚至夺佃的错误行径，宣传抗日爱国、扩大春耕、支援前方人人有责的道理。剧中情节虽然不太曲折，但都是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说了群众的心里话；加上剧里一些歌曲，都是后套民歌改编的，为群众喜闻乐见。所以一经演出，很受欢迎，大大激发了军民合作，大搞生产的积极性。傅作义将军亲自观看了演出，深为赞许。

这几次演出，都是临时用竹竿、木板和芦席搭的野台子，观众自带凳子，或干脆席地而坐，演出前闹闹嚷嚷，非常热闹。当大幕拉开，观众便安静下来，而且被台上剧情的进展、演员的表演和歌声所吸引，或哀叹或欢笑，随着剧情而变化。我们料想不到这里的观众能如此的看懂并喜



爱话剧，取得这样的效果，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观众的喜爱和理解，对演员来说是最高的奖赏。

初战告捷，从此奋斗剧团也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局面。抗日戏剧和救亡歌曲的宣传活动，在祖国边陲的抗日前方，顺利地蓬勃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傅作义将军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展开地区行政工作，适应战时需要，决定成立“绥远省动员委员会”。傅先生自兼主任委员，委员有：袁庆曾、李居义、周北峰、马占山和于纯斋等人；于纯斋任书记长，负实际责任，其他委员基本都是挂名。动委会虽是个战时机构，当时却是个政权性质的机关，相当于省政府（绥远省政府在归绥沦陷前夕，辗转逃到陕西榆林，人员四散，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一九四〇年以后回到陕坝，与动委会合并，才逐渐恢复体制）。有县、区、乡各级动委会组织，各级动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便是县、区、乡长。动委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清查户口、训练民兵、军民合作、军事供应和宣传抗日等等。

于纯斋于是卸去绥远游击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由崔载之代理，他把一小部分从西安召来的干部，包括奋斗剧团，调到动委会作为骨干。并在五原新公中培训了一批知识青年和当地的基层

干部，充实到各级动委会。奋斗剧团改变了隶属，但仍由于纯斋直接领导，人员及任务没有变化。

当年八月间，兰州的第八战区政治部的战地宣传队来到河套，进行慰问演出。其中有些演员是我们在西安的旧相识，曾与肖离、肖凤同和平津学生演剧队，他们在西安、汉中和兰州等地宣传演出，后被吸收到第八战区政治部。此次千里迢迢来到河套，旧友重逢，自然喜出望外。我们和他们合作，在五原、扒子补隆等地一起进行了几场演出，我们当然要尽些地主之谊。奋斗剧团力量单薄，很希望这些老友留下来充实我们的力量，而他们在兰州受国民党的压制，本来非常反感，早想摆脱，又认为在前方工作比在兰州有意义得多，也愿意留下来。经傅先生与兰州联系后，这部分演员便留了下来，加入奋斗剧团，使剧团增添了新生力量，壮大了阵容。这批人里有刘育斋、刘克里、石杰、蔡建宇等人。剧团扩充了力量，根据傅先生的意见改名为绥远动委会流动宣传队。工作性质并没有变，只是强调了“流动”二字，意思是要剧团到各部队驻地和一些乡镇不断的流动演出，进行宣传。我们遵照他的意图，有时到前方，有时到五原、临河及两条公路沿线的村镇，也有时到蒙族聚居的草原上，为军

民作慰问演出。到过最前方的西山咀，为前沿阵地演出过，这里距敌人仅数百公尺远，这当然不能搭台演出，只能演出些活报剧和一些小节目，更多的是教唱救亡歌曲，很受战士们的欢迎。

宣传队在行进时都是步行，我们的服装、道具和布景，都是很简单的，加上我们的行李用具，只有两辆牛拉的“二饼子”车（所谓“二饼子”，就是车轮是用厚木板做成，没有辐条，整个像个园饼子）。牛走得很慢，它总是不慌不忙的踱着，比人走得慢，车上也可挤着坐一两个人，但谁也不愿坐在这原始的交通工具上。偶而女同志走累了坐上一阵，一看大家走在前面，有说有笑的走着，她也坐不住，又跑上来跟上队伍。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乌兰脑包，为宁夏军队马腾蛟的三十五师进行慰问演出。路上经过一个十来米宽的水渠，有些绕路从二棵树干横在水渠上的独木桥过去了；有些则懒得绕路，挤在牛车上过渠。第一辆平安的过去了，第二辆车刚走到渠中心，牛忽然不走了，车倌大声吆喝并抽打着牛，牛只好用力拉，这时发现牛在动，车轮却不转，牛是用尽力气在硬拖，拖了没有两步，车子便倾倒了。我正巧坐在这车上，一看大势不好，说声“糟糕”，飞速地跳在没膝的水中。回头一看，原来坐在行李上的女同志蔡建宇，四脚朝

天躺在水里，活像翻肚的大青蛙。口中直喊“救救我！”这个狼狈的形象引得已到对岸的人拍手大笑。我连忙过去把她拉起来，让她涉水上岸。几个男同志挽起裤子下到渠里和我一起把车扶起来。这时车倌已把牛卸下拉上岸，我们半抬半推，费很大劲把车拖到岸边，又用第一辆车的牛将车拉到岸上。好在太阳很好，把沾水的衣物晾晒起来，临时用幕布围了一个圆圈，让女同志换衣服，足足折腾了两个钟头，才继续上路。大家对这次有惊无险一幕，当成笑料，那位狼狈不堪大呼救命的女同志，成了说笑的对象。

天黑才赶到乌兰脑包，这里距日军的阵地只有十来里。三十五师师长马腾蛟和师部的人，对我们盛情招待。第二天我们上午搭台，下午演出。三十五师除了警戒部队，几乎都来观看演出，还有附近的老乡，熙熙攘攘，很是热闹。在狼山脚下这片荒凉的草滩上，这种盛况，特别是在战时，恐怕是不多见的。我们在乌镇演了两天，便告别当地军民，返回五原。

我们风尘未净，著名的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和美工师韩尚义等一行，从大后方的重庆来到五原，为影片《民族万岁》拍摄素材。我们协助他们深入蒙古牧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方便，以尽地主之谊。郑君里同志非常满

意，并表示感谢。他还将当时大后方的重庆、桂林等地的救亡戏剧的活动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对我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富有创造性的宣传演出，热情的给予称赞和鼓励。他们大约住了十来天，和我们握手告别，到宁夏、青海等地继续拍摄其他少数民族的素材去了。他们拍摄的大抵是最早以河套地区为背景的影片了。在这里，也应该记上一笔。

五原作为战时的军政中心，本来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离前方太近，日寇飞机瞬息可到。当前方哨所发现时，还没来得及发警报，敌机已飞临五原上空。一次，二十八架日寇飞机轰炸五原，傅先生险遭不测，距离他仅仅两米远，躲在单人掩体里的一位随从副官便被炸死了，傅先生也被炸弹掀起的泥土盖得满身满脸，几乎把人埋了起来。敌机下完蛋飞走，大家才把傅先生从掩体里拽出来。敌机飞来飞去，很不安全，于是傅先生决定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迁到陕坝，即现在的杭锦后旗，动委会和我们流动宣传队，也随总部到了陕坝。这个河套西部的小镇，成为绥远军政中心，也成为我们剧团的演出基地。这个小镇居然有一座能容纳四五百人的小剧场，名为“永兴戏园”。平时有个叫三盛班的山西梆子剧团，在这个戏园上演晋剧，以卖票收入维持生计。这

个剧场虽然破旧不堪，但它毕竟是个剧场，比我们经常在露天搭临时舞台条件要好得多，至少不致受刮风下雨的干扰。而且舞台上可以装置简单的布景，由布条子做的软片改用纸糊的硬片；可以装上门窗，汽灯照明也设法能控制明暗，调换色彩；天幕上可以出现日月星辰，显现是夜晚还是白天，区别是室内和室外。这为庆祝节日或举行各种集会，排演些比较大型的话剧，提供了起码的条件。虽然远远比不上大城市里的剧场，但对于经常在野台子上演戏的我们来说，也已经颇为满意了。后来我们竟然在这个又破又小的戏园，上演过许多大型名剧。我们的任务是“流动宣传”，所以，我们还是赶上二饼子车，到各部队、乡镇去，往来奔走为当地军民演出，还是演野台子戏的时候多。只有在庆祝会、欢迎会或者节日，才在这个剧场“隆重”演出。

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秋末，天气已经冷了，塞北已经寒风瑟瑟，飘起小雪花来。我们刚回到陕坝，重庆全国慰劳总会组成的北路慰劳团，成员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们不远千里从重庆来到绥西前方，慰劳军民。我们便在这简陋的小剧场，举行欢迎演出。傅先生和老舍先生都在开幕前讲了话。我们除了演唱几个小节目之外，还演了两个独幕剧：《渡黄河》和《一定要把鬼子打

回去》。过了一天，我和李畏曾到慰劳团的住地——陕坝天主堂去看望老舍先生，他赞扬了我们在遥远的祖国北疆前线，从事救亡演剧的宣传工作和不畏艰苦的奋斗精神。他又深有感触的勉励我们说：“前方空气比后方好得多，后方抗战空气稀薄，而且经常遭受敌机大轰炸，也不见得比前方安全。”他希望我们安心在前方工作。当我们提出希望能供给我们些演出剧本和宣传材料时，老舍先生对我们说：“这要靠你们自己创作！即使后方有些现成材料，具体到你们这里，也不见得适用。你们要深入到部队和民众中去，要创作出反映他们的思想和要求的作品。形式要短小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便可以取得宣传效果”。这些话对我们很有教益，至今仍依稀记得。当我们以崇敬的心情向老舍先生叙述傅作义先生的一些情况时，老舍先生说，他在后方经常与冯玉祥将军来往，冯对傅的印象极好，认为傅先生有勇有谋，治军有方，是个将才；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抗战前便敢于主动发动“绥远抗战”，取得轰动全国的“百灵庙大捷”的战果。那一仗打得好，它的意义不仅是杀伤若干敌寇，也不仅是收复失地，它最大的意义是医治患着“恐日症”的人；告诉人们日本并不可怕，只要有决心，敢拼敢打，就能打败敌人，这一仗打出中国

人的志气。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要求抗日，起了某些催生作用；甚至对蒋委员长能下定决心，发动全面抗战，也恐怕有些强心作用。从老舍先生口中，听到冯玉祥将军对“绥远抗战”的看法和评论，当时对我是前所未闻，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转回去把这些谈话向于纯斋和傅先生作了汇报，于纯斋哈哈笑着说：“冯玉祥是身经百战的老将，站得高，看得远，说得有道理。”傅先生永远是那种笑眯眯地，未置可否，只是问对老舍先生的生活照顾得如何，我想傅先生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总是高兴的。

我们辞别老舍先生时，他赠送我们一本书，书名是《大泽龙蛇》，用黄色的川贡纸印的（当时纸张缺乏，后方都是用这种纸印刷），这是老舍先生自抗战开始写的一些通俗作品，其中有鼓词、歌词、相声、数来宝等。这本书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许不能与老舍先生的那些名著相比，但其中却可看出老舍先生的炽热的抗日激情，废寝忘食的写这类作品，是为了宣传爱国抗日，鼓舞斗志。这本书在纸张紧张时期，大概印得不多，也未见在书店出售，恐怕都散发给前方各地了。而今这本书已鲜为人知，它已尽了历史使命。时过境迁，老舍先生自己也不把他列入所著书中。



然而老舍先生当年花费时间和心血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值得敬慕和怀念的。

前面提到的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和著名作家老舍，都在战时的河套地区留下他们的足迹和事迹，这也是河套地区的宝贵史料。这两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都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人民怀念他们。我所以不惮词费，叙述五十多年前他们来到河套的情况，也是表达我的一点怀念的心情。

十二月的一天，傅先生忽然召见我和刘育斋，他见到我们便说：“新年马上到了，要在五原举行庆祝新年慰劳军民大会，由你们宣传队负责，带上业余京剧团、山西梆子戏班和二人台小班，一起到五原，演上三天，白天晚上演两场，要演得红火热闹。你们马上出发。”同时在座的于纯斋接着指示：“这是临时决定，是突击任务。好在你们早就习惯了，你们回去就出发，车辆已准备好了。我已给五原动委会通了电话，让他们搭戏台和为你们准备食宿，京剧团和山西梆子也已经通知过了。你们明天赶到五原，后天白天开始演出。”我们告辞出来，在路上买了许多烧饼咸菜，赶回剧团，传达了傅先生的指示，命大家一小时内出发。二饼子车随着到了，把简单的服装道具和个人行李卷装上车，实际上没用一

小时，我们就走在路上了。当天住在百川堡，第二天天不黑就到五原了。两天走了二百多里路，除个别人坐坐车外，基本都是徒步。在路上我们商量了剧目，分配角色，彼此互对台词。这种行军生活，我们确实都习惯了，这些男女青年都是二十来岁，走上一天也不觉得累。

在这之前，有几位同志因探亲治病，去了西安，目前剧团只剩下刘育斋、李畏、石杰、蔡建宇、左伦、李佩衡和我等十多个人，所以只能演些独幕剧。人手实在不够时，便请京剧团的人帮忙。

到五原第二天上午，刘育斋带两个人去装台、挂幕和找动委会的人商借汽灯；我则与京剧团、山西梆子班会商剧目的安排以及如何搞得红火热闹。当时商定下午一时准时开戏，开戏前由京剧和山西梆子的武场轮流“打通儿”，先敲锣打鼓，造成声势，招徕观众。首先由“二人台”唱两段滑稽段子；接着我们表演合唱和话剧；随后是山西梆子和京剧。所选剧目都是活泼有趣或紧张热闹能抓住群众的戏，如山西梆子的《打金枝》、《大登殿》，京剧的《四郎探母》、《法门寺》，话剧的《九天宫》、《放下你的鞭子》等。我们商定一天日夜两场，白天是下午一时至五时，晚上是七时至十时。每天中午十二时吃完

饭，到后台集合。

午饭后，我们相继来到后台，化妆的化妆，敲打的敲打。这时观众已来了不少，也有四乡的老乡和做小生意的，很是热闹。台口上的大红横额上写着“五原县军民庆祝新年游艺大会”锣鼓一住，二人台上场。二人台是河套地区的民间曲艺，土生土长，当地人特别喜爱，一上来便吸引住了观众；之后，合唱、话剧、山西梆子和京剧，相继上演，观众也越来越多。晚上，舞台四角挂了四盏大汽灯，整个广场都映照得通明，仍然鼓乐齐奏，继续演出。

就这样连演三天，演得很成功。在这座塞上小县城里，这样热烈欢庆的场景，恐怕是空前的。演到最后一天，我们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傅长官带兵打进包头城，把日本鬼子打懵了。”这消息来得突然，但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正在此时，军部来人通知我们：“包头战役已经打响，前方正在激烈战斗。你们已完成任务，此处不可久留，马上停演要连夜返回陕坝！”他大致说了一下经过，我们才顿开茅塞。

原来，傅将军为配合南方湘桂抗日战线，牵制华北日寇兵力，决定奇袭包头，给敌人以突然打击。而五原一带，地近前方，汉奸敌探，时有出没。为了迷惑和麻痹包头守敌，使敌人产生河

套地区平静无事的错觉，傅作义部采取守势，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以便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袭包头而一举成功。他命令我们到五原，以庆祝新年慰劳军民为名，扩大演出，制造庆祝佳节，歌舞升平的假象欺骗敌人，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战果。看来傅先生是深得“兵不厌诈”的三味的。当我们锣鼓喧天，灯火辉煌之际，他已亲率所部，沿黄河南岸和狼山脚下，分两路星夜行军挺进包头，深夜发动突袭，迅速攻入城内，直捣敌人心脏——驻包头日军司令部。敌人如梦方醒时已遭重创，是役毙伤日伪军一千余人。

我们到五原扩大演出，是包头战役的序曲，也是我们对包头战役作了一点小小贡献。虽然我们在事后才得知，是傅先生略施小计的一步棋。

我们遵命返回陕坝，路过临河时，曾遇敌机轰炸，幸亏我们一行已走出城外，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我们都隐伏在小渠里，只是受了一场虚惊。我们回到陕坝，我马上去见于纯斋，向他汇报这次五原之行的经过。他说已经基本了解了，认为我们完成得很出色。他告诉我们前方的情况说：“我军完成突袭包头，达到牵制敌军兵力的目的后，傅长官已命部队转移。这次把敌人打疼了，估计敌人可能进行报复，进攻绥西。傅

长官决定利用河套的水网地区，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动委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清室空野，组织担架队，救治伤员……，你们休息两天，要配合这项工作。”

这些天，我们就在陕坝与动委会同志一道，动员疏散人口，埋藏粮食、填水井、组织担架队等。这种战时动员工作是相当困难和紧张的。

果然不出傅将军所料，敌人集合华北各地的兵力，向绥西大举进犯。在我军节节阻击，给敌重创后，撤离五原。敌人企图分两路西犯，窥伺临河、陕坝，傅将军命令陕坝非武装人员及所有眷属，克日退往宁夏石咀山。我们剧团偕同动委会女同志当即出发。平时熙熙攘攘的陕坝镇，这时已经人烟稀少，非常冷清了，而路上车马人群反而热闹起来。我们觉得这种情况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敌机扫射，我们只有夜晚行进，白天转到小路有人家的地方休息。从三盛公向西进入沙丘地带，便只有一条蜿蜒小路了，我们的心情也稍微轻松了，才日夜兼程的前进。我们在塞上的冬夜行军已经习惯了，这时正是数九寒天，夜里气温总在零下二三十度，人呼出的气马上变成白霜，眉毛、胡子、帽沿、护耳都挂着像棉花似的白霜，不分男女都变成“圣诞老人”了。在起伏的沙丘里行进相当困难，特别是女同志，穿得又

臃肿，走起来更费劲，车子有时也要连推带拉，所以一天最多走五六十里。过了磴口之后的一天，正是农历的除夕之夜，我们在黄河边上的沙窝里，找了个避风处，燃起几堆篝火，男同志到河里砸冰块，女同志用芨芨草和牛粪烧火。用桶和行军锅化冰烧水，做了一大锅面圪达汤，放些盐和辣面，大家围着篝火，连说带笑把圪达汤喝个精光。肚子吃饱了，连疲乏也驱走了。东方天边泛起鱼肚白，我们又上路了。几百里沙原，只有两处独立小屋，一处叫“马宝店”，一处叫“河拐子”，都是旅人歇脚的小店。屋里只有一盘大炕，别无所有。我们路过时，已先有一些撤退的人坐了半屋子，我们让女同志挤在炕头上睡上一觉，男同志则偎在墙角落打起盹来。后面的人群来了，我们便连忙起身，把仅有的地方让给这些疲惫不堪的人。“河拐子”那个孤零零的沙窝小屋，就是今天有名的矿区——乌海市。而今成为几万人的煤城了。

我们大约走了十来天，才到达宁夏石咀山镇。这里今天也是富饶的产煤区，已建成相当规模的工业城市，然而当年却是一个破败荒凉的小镇。狭窄的街上只有几间小店铺，居民们穿得破破烂烂，满面烟容。街上还有的地方挂着方形纸灯笼，上写“清水鸦片”四个字，这就是宁夏军

阔马鸿逵的“德政”，实行鸦片官卖的怪现象。

我们一到石咀山，谁也顾不上吃饭，都在老乡家倒头便睡，直睡到第二天上午才起来收拾，我们找了一座早已停业的磨房住下。洗罢征尘，歇过疲乏，我们又精神焕发的工作起来。几次在石咀山集市展开宣传和演出。

前方来的消息说，敌人进犯河套两条公路上的城镇，尽被占据。傅作义所部化整为零，编成小部队，利用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处处设伏，以游击战术随时随地打击敌人，使敌人寝食难安，死伤甚众。我军克复临河、陕坝后，敌人回窜五原，企图据守。傅将军利用黄河解冻之际，放水淹没道路，使敌人机械化失去作用，我军一举攻克五原，全歼敌伪数千人。“五原大捷”喜讯传来，我们欢呼雀跃，马上乘运粮木船顺流而下，在园子渠口下船直奔陕坝。我们睽违两月的这座小镇，经过敌寇铁蹄践踏，已经满目疮痍了。这时各机关单位以及居民群众也陆续回来了。于纯斋指示我们配合动委会人员，进行抚慰群众，发放赈济粮款和春耕籽种。傅将军自战场归来，命我们筹备河套慰问军民大会，特别强调五原县奋勇砍杀六名日本鬼子的王大老虎兄弟，百川堡发动妇女抬伤兵的刘老大娘，以及支援前线、运粮草、抬伤兵、报信杀敌的一些有功的英雄人物，

都要请来加以慰劳嘉奖。在开大会那天，我们把王大老虎和刘大娘的事绩，编成活报剧演出来，坐在台下的傅作义将军和戴着大红花的王大老虎、刘大娘，看了都觉得亲切真实，报以热烈鼓掌，我们自然也很感荣幸。

接着，我们又奉命去了五原，从事“复兴五原”的工作。这座塞上的历史名城，经过战争洗礼，到处弹痕累累，面目全非。我们招抚流亡，发放赈济，动员春耕，鼓动宣传群众重建家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这支小小的文艺队伍，奔走于五原、临河、蛮会、黄杨木头、三道桥、郝镜桥、邬家地、折桂乡等有驻军的地方和居民点，演戏宣传，歌唱部队和群众中的英雄人物，往往是随访问随编写随演出或歌唱，因为演唱的都是他们亲自经历的事，所以很受欢迎。这既鼓舞了观众，也锻炼了我们。

到了一九四一年，傅作义将军励精图治，整文经武，医治战争创伤，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畜牧……，河套地区由复苏逐渐兴旺，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这年夏天，我们从西安邀请了一批演员，他们是丁尼、白玲（赵秀蓉、女）、崔超、苏凡（潘炳心）、马心、王雯（女），这些人多半是我原来在西安“中剧救亡演剧队”或西安其他话剧团体的主要演员，也都是我当年的老友。肖离、



肖凤也同他们一道回来。加上我们原在陕北的石杰、左伦、夏平和我。又从暂四军政治部调来舒英（女）、刘宝坤等，一共二十多人，阵容比以前强大多了。这样的阵容，不仅在绥西前线，即使在战时的大西北，也算得上是一支较强的戏剧队伍。也可以说是我们剧团的极盛时期。自一九三九年春，傅将军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后，不再属山西第二战区序列，脱离了阎锡山的羁绊，直接受重庆国民党政府，也就是蒋介石的辖制。一切财政来源，军需供应及补充兵源，都要仰给重庆国民党拨发，当然一切军令政令也就要听蒋介石的了。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下，在绥西工作的共产党员干部，便被傅作义将军礼送回延安。这是傅将军实行保证这些人的安全的诺言，在傅将军说来也确是迫不得已的。这样一来，原来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便日趋淡薄了。绥西战役之后，经过整顿发展，河套地区的经济形势好转，社会也恢复安定，然而政治空气却变化很大，绥远省动员委员会撤销了，与绥远省政府合并。于纯斋改任省政府秘书长。绥远省党部恢复了，绥远省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各处也开张了。我们属于动委会的流动宣传队改名为青年剧社，直属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由傅将军直接领导。

为什么命名为“青年剧社”呢？这背后是三

民主义青年团绥远支团部书记赵仲容搞的鬼。当时三青团正在开始筹建，人手短缺，适值动委会与省政府合并我们剧团的隶属问题尚未决定之时，赵仲容乘机向傅先生要求把剧团隶属于三青团，他的理由是三青团可以有剧团的编制，也有这笔经费。傅先生当时是三青团绥远支部的指导员，虽然名义上是三青团绥远支团部最高领导，实权操在赵仲容手中，然而剧团经费由三青团支付，傅先生还照样指挥剧团，有何不可？便同意了赵仲容的要求。赵当然喜出望外，认为剧团归属三青团，既加强了力量，也能扩大影响。同时他也认为这是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便通知我去办理开支预算和领取经费手续。至此赵仲容背后搞的这些名堂赤裸裸地曝了光。这一来剧团像炸了窝。群情激忿。三青团本来臭名昭著，剧团的成员又大多在西安受过白色恐怖的迫害，才辗转投奔到傅作义这里来，岂能逃出虎口又陷入狼窝？都坚决反对隶属三青团。我把这些情况向赵仲容说了，希望他取消这种想法和做法。赵仲容当然不甘心，我同他吵了起来，最后拉着他去长官部见傅先生。我把大家的意见和情绪说了一遍。我说：“剧团这些人都是仰慕傅长官而来的，愿意在您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的戏剧工作，不愿隶属于什么党团，我们就知道为抗日演戏，不要渲染

任何政治色彩。否则请解散这个剧团。”傅先生对这批青年的心理是完全理解的，他知道这些人有些进步思想，但决不是共产党，但也决不愿受国民党的挟制。如果挤兑急了，剧团很可能散了，有些人也会离开绥西。这些人既对三青团如此反感，一时也勉强不了，便想出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决定青年剧社的名称不改了，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直接领导，经费由长官部副官处按月拨付。

青年剧社正式成立，由丁尼、肖凤和我共同负责，我负责对外联系，肖凤负责对内，丁尼负责总务，崔超担任剧务，马心担任音乐指导。一切走上正轨，便进行排戏，当时只排了五、六个独幕剧和一些独唱、合唱等歌曲，便奉命到距陕坝以南四十余里的八岱——绥远军政干部训练团（简称绥干团）所在地进行演出。在这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到绥干团来演出，有时还住上一段时间。

绥干团是傅先生对所属的部队军官和地方上的行政人员的训练基地。傅先生一向注重干部训练。早在一九二八年，傅任天津警备司令时，便成立军政干部训练所，作为提高军政人员的素质和考核任用的手段。一九三一年任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时，先后在丰镇、归绥举办军官训

练班和乡导员训练班。抗战军兴，转战晋绥，无暇顾及，迨甫到绥西，即在五原新公中办了一期行政人员训练班，接着在百川堡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也是对军政人员学习训练的一种方式。绥干团便是在抗建会基础上成立的一个长期轮训军政人员的一所战时学校。

绥干团训练军政干部傅先生有一套他自己的独特方法。它表面上属于兰州“第八战区西北战时干部训练团”（即西干团），所需经费也是由重庆通过西干团转来。学习科目和教育大纲，有许多是按照国民党的要求做的，例如军事上也是按《步兵操典》和国民党制订的各种条令，由班教练到连教练、团教练，也有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和什么精神讲话等等。但是也掺入一些共产党、八路军的方法，例如持久战的理论，游击战术，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以及部队政工制度等，不过有些要改头换面，避免共产党使用的词句，尽量抹去共产党的色彩，而保存其实质。这一点也是傅作义坚持择善而从的一贯作风。他把共产党的一些好的有用的东西，吸收来为我所用。而国民党那套不适用的东西，则是虚应故事，有名无实，如所谓“总理遗教”、“总裁言行”之类的课程，便大多是讲国际形势，谈对抗日战争的认识等来代替。除了上述的训练内容和方法外，傅先

生办这个训练班，对所有军政人员进行轮训的真正目的，则是要形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牢固的集体，也就是对他绝对忠诚、绝对信赖和绝对服从的一批骨干力量，一个战斗集体。

我们剧团不时到绥干团演出，除了演些活跃学习气氛，宣传抗战必胜的节目外，还分别到各中队去教唱抗日歌曲，辅导学员们自编自演他们自己学习生活中发生的好事或坏事，他们很喜欢这种形式；我们还办壁报、画漫画，多半都是配合傅先生提出的要求去进行。我们到那里，那里就活跃起来，傅先生曾赞扬我们说：“训练是治病，你们可以起到药引子的作用”。傅先生经常就住在绥干团，还几次同我们一起吃饭、座谈。说明他很重视我们这批文艺工作者。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到各部队和城镇进行巡回演出。这时傅将军的部队已经扩充为三个军，除三十五军外，又扩编了暂三军和暂四军（后改为骑四军）。暂三军驻五原、暂四军驻查会，各师分别驻在临河、安北和五原各重要据点，我们差不多都到过。不论走到那里，当地的驻军和居民，都像过节一样，观看我们的演出。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我们正好巡回到拉僧庙。那是一座有名的喇嘛庙，驻军是独立骑兵团和西公旗奇俊峰的骑兵支队，附

近住着不少蒙汉居民。我们在这里和部队共同举行了“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我们进行两天演出，蒙汉居民骑马赶车来看戏。部队官兵也兴高采烈的围坐在台前面盛况空前。

剧团里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到蒙古地，也是第一次瞻仰了喇嘛庙和领略了草原风光。大家兴致勃勃地观赏了富丽壮观的佛殿、庄严肃穆的神像。还到蒙古包去作客，喝着热情的主人送来的奶茶。太阳下山时，放羊的人们回来了，蒙古族少女唱着高亢动听的牧歌，儿童打着响鞭，牧马嘶鸣，好一幅草原风光的美丽图画，令人留连忘返。

我们又回到陕坝。这时陕坝已经兴旺起来，剧团的条件有所改善，我们有了一堂硬片布景，门窗户壁俱全，并可按剧情需要变换，服装也比较多了一些。三大战役后，部队给我们一些战利品，如日本军服、日本旗、马靴之类。演起日本官兵来，也用不着像以前用半个西瓜皮当钢盔了，也无需用红药水涂日本旗了。此外，我们也搜集一些都市和农村的服装，必要时还可以借。灯光照明，虽然仍是汽灯，我们也做了许多改进。剧场除了永兴舞台已略事修理添置坐椅外，在陕坝镇西北角又兴建了一座中山堂，可容纳七八百人，舞台前后也比较宽敞。这样一来，内外条件都大大改

善了，剧社的人们的雄心也大了，敢于排演大型的多幕剧了。

最先排演的是老舍、宋之合编的大型话剧《国家至上》，是以回汉团结抗日为内容的。这次演出轰动了陕坝，比以前所演的简单粗糙的独幕剧要强得多，一新当地人的耳目。这出戏成了剧社保留节目，以后在临河、五原一带上演过。这次演出的成功，极大的鼓舞了剧社的人们。接着我们排演了老舍编剧的《面子问题》、田汉编剧的《名优之死》、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等戏，都得到好评。傅作义将军在每次首演时都去看，他认为我们在演技上和舞台装置上都提高了。每逢从后方来了客人，他都命我们演出。这以后便成了惯例。我们认为他这样做含有两种意思，主要的当然是为了欢迎嘉宾，但另外也含有在这荒僻的北疆，在他领导下，竟然有这样一个艺术团体的自豪心情。

我们演过以上几个大型话剧之后，“家当”更多了，雄心也更大的。我们陆续排演了曹禺名著《北京人》，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改编的《狂欢之夜》，这两个戏是剧社巅峰时期精心排演的。我们人手不足还特邀了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和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的冯玉书、沈珩、李作惠等几个人协助演出，阵

容比较整齐，演员也都下了一定的工夫，演出后博得一片好评，以后剧社陆续上演了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曹禺的《日出》、《蜕变》，周彦编剧的《烽火梵音》等大型戏剧。

为了适应巡回演出，我们也排演了不少小型话剧。除了初期上演过的《三江好》、《夜之歌》、《渡黄河》、《电线杆子》、《九天宫》、《放下你的鞭子》、《何必呢？》、《春耕曲》等之外，还改编演出了《人约黄昏》、《黄莺儿》、《翠翠》、《在旅途中》、《胜利的明天》等独幕剧。除《胜利的明天》是由延安鲁艺王震之编写的《打虎沟》改编的以外，其他都是由苏联剧本移植过来。这些戏在当时的后方，一般是禁演的。这说明在傅作义领导下的河套地区要比后方开明得多，自由得多。我们除了演戏之外，也唱了不少的歌，齐唱、合唱、重唱、独唱都有，而且多半是从延安带来的歌，如《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洗衣歌》、《送寒衣》、《开荒歌》和《风雪太行山》……等。此外也唱苏联歌曲：《喀秋莎》、《伏尔加河船夫曲》、《孤儿曲》，还将苏联歌曲：《游击兵团在前进》改成抗日歌词。

在反共高潮期间，白色恐怖的阴影几乎无处



不在，不要说延安的歌曲不准唱，连苏联的歌曲也在禁唱之列。然而在四十年代的河套地区，都毫无顾忌的演唱和教唱。傅作义将军所属各部队，不论操练还是行军，他们都在唱着《黄河大合唱》中《保卫黄河》的“风在吼，马在啸”，以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西北战歌》等等雄壮的歌曲，充满了军营和操场，震撼着抗日的前方。我们敢于演延安的戏，唱延安的歌，这说明当时在傅作义管辖的地区，还多少保留了一点自由空气，也说明傅作义将军与国民党顽固派有所不同，他不认为这些戏剧和歌曲是宣传“赤化”，他认为这是宣传抗日，没有什么不好。他在绥干团讲话时，经常重复这些话：“抗日是真刀真枪的事，是流血拼命的事，光说不练不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前面是日寇，后面是荒漠，连喝口水的地方也没有，所以只有奋斗，跟日本人拼，别无出路。”这不仅说明他坚决抗日的态度，也说明他对嘴里喊抗日，实际不抗日的人深恶痛绝。只要有利于抗日的他都欢迎，我们演的戏唱的歌，有利于抗日，他当然不反对。然而国民党特务分子，对我们的做法当然侧目而视，但碍于傅将军的容许和庇护的态度，未便发作而已。

然而不幸的是，在傅的管辖范围内，那很少

的一点自由空气，到了一九四三年也荡然无存了。这时小小的陕坝镇，具有国民党特务性质的机关已经林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彝鼎、副主任苏寿余都是重庆派来的；此外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是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他抓了不少青年干部；还有绥远省缉私处，处长是军统特务马汉三；中美合作所陕坝分所负责人是军统特务头子高荣；再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主任赵仲容、书记王明德。这些单位都曾对剧团进行过调查或恐吓，有的对剧团里的人旁敲侧击，有的派人到剧团“闲转”，总想找点麻烦。而最大的麻烦还是三青团。

原来我们青年剧社直接受傅长官领导，经费每月由长官部副官处支給，其实这是傅长官的权宜之计。副司令长官部并没有剧社这个编制，也没有这笔经费。实际上是用的三青团的编制和经费，只不过转了个弯子，改用副长官的名义，以缓和当时剧社不肯隶属三青团的矛盾。这种所谓权宜之计，剧社的人是毫无所知的。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三青团绥远支团部主任赵仲容已由书记升为主任，书记由王明德担任也始终是不甘心的。他认为他出编制和经费成立的青年剧社，都不属于他管辖和掌握，而且还和他采取对立的态度，他是非常恼火的。他不把剧社控

制到自己手中，恐怕到死也不会瞑目的。他派王明德到剧社来作说服工作，把内中情由摊开，真相既白，剧社免不了又一番群情激忿，接着，傅长官亲自出面，劝说剧社归属三青团。他说他是三青团绥远支团部的指导员，三青团仍是由他领导，当然剧社也是由他领导，由谁领导并没有变，只是名义上要“归还建置”，属于三青团，否则编制和经费难以解决。这就是说青年剧社必须隶属于三青团，再无回旋之地了。剧社的人都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再也没有原来那种积极性了。

我和石杰是最早离开青年剧社的，赵仲容和王明德一直认为我是带头反对剧社归属三青团的罪魁祸首，想方设法对我施加压力。所以我在三青团还未接收剧社之前，便同石杰离开青年剧社去教书了。三青团派人强制接收青年剧社之后，崔超离开剧社到青海去了，马心、王雯夫妇到了宁夏，接着丁尼、白玲夫妇回了西安。这样剧社的主要演员几乎走光了，青年剧社已经名存实亡了。肖离、肖凤利用三青团的名义，办了一份绥西最早的文艺刊物，刊名就叫《文艺》，内容是纯粹文艺作品，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这样赵仲容等人当然很不满意，这份当时唯一的一份文艺刊物，只办了几期便夭折了。肖离、肖凤于是去了湖

南。剧社成员中的寇家伦、左伦、冯玉书等也相继离开绥西到西安或兰州去了。至此，青年剧社终于解体了。

从一九三九年初成立“奋斗剧团”，改为绥远运动员委员会“流动宣传队”，再改为“青年剧社”，我都是参加者。这三个阶段名称有变动，人员有变动，但工作性质均是以演剧为手段，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它从最初的三、五个人发展到二、三十人，从最原始、最简陋的方式，在野台子上演些活报剧、独幕剧，到在剧场里用比较富丽的布景，演出《日出》、《北京人》和《狂欢之夜》等著名大型话剧，它的发展壮大的过程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的。它是傅作义将军大力支持和扶植的结果，也是河套地区抗日军民哺育的结果。

斗转星移，岁月如流，五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当年一群怀着火一般抗日热情的年轻戏剧工作者，奔走于长城内外，活跃于塞外草原。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在寒风凛冽的广场，高唱着救亡歌曲，表演着抗日戏剧，那种热烈昂扬的精神，无视困难的气概，确实令人难忘。也曾回想那些围坐在台下的年青而精壮的抗日战士，仰着红扑扑的笑脸，那淳朴而勤劳的河套父老，双手举过头顶的掌声……，战争岁月的那些美好的镜头，在

回忆中一幕幕的闪现在脑际。巍巍乌拉山，滚滚黄河水，茫茫大草原，漫漫黄沙海。美丽富饶的河套，我们如何忘得了？

# 抗战期间三十五军的

## 政治工作忆述

张鸿恩

抗日战争期间，傅部三十五军在诸次战役中，其所以能多次取得胜利，除了傅先生的卓越指挥，所部有一定的军事素质之外，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毛主席为了协助友军，改造旧军队，增强抗战力量，给傅部派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及在部队中建立起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我曾在三十五军，到三十一师充任团连指导员，师团政工干事，军政治部科长，师政工室主任，军政工处处长。兹将个人所知道的部队政治工作概况，忆述如下，因时隔四十多年，难免挂一漏万，不周之处，请知者予以补正。

###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傅先生率部在察绥、平型关、忻口参加了会战。接着奉命固守太原，打击日寇侵华的嚣张气焰。终因敌我装备悬

殊，又系孤军奋战，故在战略上达到迟滞敌人前进，掩护友军撤退，完成任务后，即奉命转移晋西离石县柳林镇，进行休整。此时，傅先生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仍兼第三十五军军长。整补中，将七十三师刘丰滨部，独七旅马廷寿部，二一三旅杨维垣部，统编入三十五军建制；共辖编两个师，计一零一师和七十三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共计四个旅，十一个团。另外还有一个炮兵团，官兵约一万大几千人。这些部队，虽已组建多年，尽管战功卓著，但毕竟是旧军队，无论官兵在思想认识上，战略战术上，以及打仗的方法上，仍沿用旧的一套。“七七”事变前，驻防各旗县和重要城镇时，除剿灭王英、杨猴小等武装匪徒外，一般就是三操两讲堂，点验校阅等旧式练兵方法。形式很紧，实际消磨、浪费时间很大。部队单独一个团、营、连在一个地方驻防，其部队长就成了小皇帝。下级军官，吃喝嫖赌，勤杂人员吸食鸦片者，各部队不同程度均有；各级部队长吃空额，冒名多领，也程度不同的均有。军官统驭士兵方法多靠打骂教育，无理要求，因此官兵关系不够融洽，军民关系，也不够亲密。太原失守后，士气不够旺盛。一般官兵，唯武器观念甚浓，缺乏必胜信心。特别从太原扯出部队整编时，人员杂乱，因

此坚定官兵必胜信念，严明部队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是刻不容缓的。尤其在一九三八年部队驻防晋西北时，与八路军经常接触。傅先生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官兵关系亲如手足；他们生活艰苦，但大家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打仗时牺牲少，收获大。而自己的装备和待遇比八路军好，部队素质却不如八路军强，主要是八路军有强有力的部队政治工作。加上一九三八年初，中共中央曾派程子华、曾三两同志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先生，商谈在晋西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以及发动群众，并介绍八路军部队政治工作的作用，建议傅先生在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后来三十五军转战河曲、保德、偏关时，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负责人给傅部拨补新兵时，又对部队建立政治工作，提出许多建议和帮助。这就使傅先生认识到对部队不仅要建立政治工作，而且更需要加强。另外抗战以来，蒋介石、阎锡山也分别在部队建立政工组织，傅先生为防止蒋、阎派政工人员打入部队，必须抢先一步建立政工组织，以便能以他的意志为中心，保持他的部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抗战到底。

基于上述情况，傅先生形成了在他的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的设想。他首先在北路军成立政治委员会，自兼主任；周北峰为委员兼秘书长，主



持会务行政工作；而代行主任职务，周钧为委员，兼民工组组长，筹备地方民运工作；于纯斋为委员，兼军工组组长，筹备军队政治工作。其干部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派周北峰到延安谒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请求酌派政工干部。承蒙允准后，派来优秀共产党员和经过延安各种军事政治学校培训过的进步青年二、三十人，充任了傅部的政工骨干。

第二，派于纯斋、崔载之等到西安，招收由平、津、冀、鲁、豫等省市流动到西安的青年学生七十多人。途经革命圣地延安时，毛主席接见了这些人并讲了话，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使这些学生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第三，还派袁庆和、阎世泰赴晋南运城招收青年学生，分两批到达柳林镇：第一批五十多人，乘火车到临汾，改坐汽车到灵石，再乘驮骡到柳林；第二批二百多人，因临汾已沦陷，由运城乘火车到西安，经陕北到山西柳林镇。

此外，还吸收了流散在各地的原绥远的行政干部，有省府议员、乡导员、青年学生等十多人。通过各方面的吸收和招请，准备培养的政工干部总数达三百多人，统一在三十五军干部训练所编队学习。

该所所长苏开元，中共地下党员。全所共四个队，第一、二队是军事，第三、四队是政工队。三队学员大部份是由西安招来的学生、延安派来的政工干部和绥远省流亡到柳林的行政干部以及从运城招来的高中生经过挑选后录取的。我同雷轰等就是从运城招来的学生中被选取的。第四队为学生队，大部份是从运城招来的学生和少量临时招收的社会青年。

训练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我们这些人当时都脱掉学生服装，换上灰色军装，过上士兵生活，每人发给一支步枪，二百粒子弹，三天干粮，还有水壶、挎包和个人简单行李等。一天行军七八十里，经常搞夜间紧急集合，每天爬山越岭，持枪教练，投弹射击。除学习素养教育等简单军事课目外，主要学习政治。讲课者除周北峰、周钧、于纯斋等外，还有共产党员苏开元、潘纪文和从陕北来的学员。课程内容：毛主席《论持久战》、“新阶段论”、“统一战线”，罗瑞卿的“论部队政治工作”等。除正式课程外，还教唱革命歌曲，开晚会、演话剧、出墙报，上大课，小组讨论，一天十几个小时。生活很紧张，却精神振奋，心情十分愉快。此外，我们在柳林学习期间，傅先生在百忙中，曾莅临给全体学员讲话，介绍抗战形

势、晋西形势，前方战斗情况，抗战必胜道理，部队现状以及建立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方法。每次讲话，总看见傅先生红光满面，精神饱满；身穿士兵服，腰扎小皮带，下裹布绑腿，脚穿布棉鞋；从外表看和士兵没有两样，给人以仰慕的感觉。不久，傅先生率部到晋西的汾阳、离石、交城、大武镇打仗去了。为了使我们的安心，让全所同学转移到陕北绥德义和镇继续学习。此地系解放区，无论地方干部和群众，一举一动都给我们以艰苦朴素、热忱积极的感觉。约又学习了一个多月，全所奉命由义和镇出发，爬山越岭，每天行程七八十里，经葭县渡河，到山西临县。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我们三队学员全部毕业并分配工作。我们当时的待遇是每人每月生活费二十元，不分级别。我们的符号均是红边白心上印有北路军总司令部政委会和写有自己的姓名。远远看去，好似来了这么多的将官。第四队学生队，仍在继续学习，他们的待遇是每人每月生活费为十二元。

第三队学员毕业后，分了两个组，一为军工组，由于纯斋负责，到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参加军工组的学员，约五十多人。由于纯斋和崔载之等五六人组成领导机构，相当于军政治部。各师设政治部，每师设主任一人，干事三五人。一〇一

师主任康保安，七十三师主任彭光祖，二一一旅主任鲁志浩。九个团加一个炮兵团，共十个团，各团设政治处，每团设主任一人，干事二至三人。主要搞新闻宣传，鼓励士气，协助部队采购粮草，维持部队纪律，搞好军民关系，教唱革命歌曲。协助军医处，动员群众抬运伤兵等。

另一组为民工组，由周钧任组长，干事三至五人。配合动训司令部工作，相当于动训司令部的政工机关。七十三师抽调副师长杨维垣，一〇一师抽调副师长吉文玉为动训司令，各师均抽有下级军官，和干训所的第一队学员（军官队）编为大队、中队和分队。到晋西北方山县、静乐县、荷兰县、兰县、兴县、临县等六个县组织自卫队。每县根据人口多少，地方大小，派一至两个大队，每大队设三个中队，每中队设三个分队，大队长相当营长，中队长相当连长，分队长相当排长。每大队设政工主任一人，干事二人，每中队设政工员一人。我当时被分配在方山县，我们的大队长是韩万紫，大队政工主任是冉志恒。和我一块工作的政工员还有苗瑞凤、侯建吉。各中队还配有地方干部，县政府派的干部在大队和中队，乡长在分队。当时的任务是协助地方政府组织自卫队，帮助军训、保卫家乡，群众参加的颇为活跃。不足一个月，各中队按计划人数全都集中起

来，正要准备训练，就被过路的七十三师部队全部带走，补充了部队。我们这些军政干部，连夜返回临县，到司令部报到。其余各县的自卫队，也同我们县一样，均被带走，补充到部队里。此项工作结束后，所有随周钧组织自卫队的政工干部，全部到河曲、偏关，由于纯斋接收，分到三十五军部队，从事部队政工。我被分配到二一一旅四二一团政工处任干事，我们团政工主任为徐秀泉，其他干事姓名已回忆不起来了。这样，三十五军的政工人员，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对部队有了初步了解，也摸索到在部队工作一些经验；认识到政工在部队应该作些什么？部队军官也对政工人员初步有些正确认识，消除了种种顾虑，军政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

一九三八年秋，傅先生命令，把所有政工干部，连同在干训所学习的第四队学生，一同集中到河曲县大营盘，召开了政工会议。经过几天讨论，对政工任务、机构和干部的配备基本确定后，又到唐家岭，与军官训练团受训的军官一同对政工五项任务和实施方案，进行了讨论，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不少军官对部队建立政治工作有些糊涂认识：把政工人员看成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了政工人员会增强上下级的矛盾，用说服、讲民主兵不好带了，部队对老乡太

软，同老乡办事更困难了等等。傅先生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耐心反复的批评教育，强调部队有了政工人员，不仅不能减低他们的威信，而且更能增加部队的战斗力，改进官兵关系，提高他们的威信。另外军民关系也能得到改善，与群众联系办事更好办了。部队建立政治工作，是提高部队官兵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需要，只有建立部队政治工作，才能保证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军政干部讨论下，确定了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五项任务：第一，巩固部队，提高士气；第二，监督部队经济公开；第三，军民合作；第四严明部队纪律；第五，瓦解敌军。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增添了不少的工作。并对每项任务，均讨论制订了实施细则，由军政治部编印成活页小册子，发到各部队，公布执行。并在这次会议上，每半年召开政工会议一次，傅先生总要在百忙中亲临指导，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每次会议，各师均派代表参加，共同讨论在部队贯彻执行的办法，使这几项任务不断的改进与发展。逐步深入，更加完善。

三十五军政治工作机构：军设有政治部，由周钧任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四科。另外还有政工部，话剧团，总人数约四五十人。各师设政治部，除主任外，还有科长和科

员。各团设政治处，主任一人，干事二人。每连设政工员一人，助理员一至二人。此时全军政工人员达三百多人。团以上各级领导人，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或进步青年。如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由中共党员潘纪文担任。二一一旅主任由鲁志浩担任。全旅三个团主任为：王中、李忠、杨文斌等。其他各师也一样，他们均是艰苦朴素，工作积极，热诚负责，勤劳勇敢，作风正派，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此时可谓三十五军政治工作的黄金时代。

## (二)

一九三九年末，蒋介石怕傅部“赤化”，曾派张彝鼎、苏寿余等来绥西组成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张为中将主任，苏当少将副主任，各科长均为上校。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原准备由苏寿余接任，经傅先生多方周旋，仍由周钧担任。各师团主任均作了调整。但不久军政治部撤销，周到战区政治部担任主任秘书。各师主任由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委任，经傅先生与国民党中央商定，他们派主任，傅派副主任；傅派主任，他们派副主任。如新三十一师（原二一一旅），他们派师政治部主任卢盖军（副师长）后又换为李忠，黄埔四期学生，傅派副主任张沧；

如新三十二师，他们派阎家屿(副师长)为主任，傅派张守仁为副主任；再如一〇一师，傅派李思温(副师长)为主任，他们派周时俊为副主任。团以下仍由原来政工人员担任。因为张彝鼎等要清查共产党，所以大部份共产党员表示不能在傅部工作了，要求离开。在国民党压力下，傅先生只好送走了大部公开的共产党员(如：潘纪文等)，均派人护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有的发给路费，提供交通工具，指定安全路线，送回延安；或跟上接兵部队到西安转赴延安。也有些同志如杨志明等，则由傅先生甘担风险，认为没有问题为由，一直保留任用到北平和平解放。张、苏等政工头子到三十五军以后，政工人员有了军衔，一般师主任为少将，团政治指导员为少(中)校；军以下各级科长为中(少)校，干事为少校及上尉，连指导员为上(中)尉。从此各级政工人员的生活费，均改为按级别发的薪金制了。

尽管三十五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大部返回延安，或继续读书深造，但他们那种艰苦朴素、认真负责的楷模行为，给我们继续在傅部工作的政工人员，留下了仰慕和学习的榜样，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如我自己，烟不抽，酒不喝，嫖赌之事绝无，始终认为政工人员在部



队要起模范作用，才能让人敬仰信赖，说话才有作用。国团在三十五军从事政治工作达十一年，直到北平和平解放，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第七招待所主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解放初期，曾出任安北县人民政府县长，现在是内蒙政协委员，将近四十年的工作中，始终保持了优良的作风。

总的说，虽然国民党中央政治部派来张、苏等大员来傅部参与政治工作，并担任主要领导，但由于傅先生亲自过问，团以上的各级政工人员，仍然是傅先生一手培训出来的政工人员，人人遵循五项政工任务和他的亲切教导，张、苏等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左右部队的作用。故三十五军部队政治工作，始终是傅作义的中心思想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起着作用的。

### (三)

三十五军的政治工作，分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以做好平时工作为主：

第一，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鼓舞部队士气，增强战斗力。

抗战初期，部队官兵与日寇经过多次战斗，每次都是防御战，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

虽是取得胜利，损失却很惨重。无论消灭敌人多少，最后总要撤退，因此官兵就认为是败仗，说泄气话。我们政工人员，针对这些思想，进行政治教育，让官兵认识到日本侵略我国，是非正义性的战争，抗日是反侵略正义性的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当时的宣传教育材料，是政治部编发的政治课教材，宣传敌人的暴戾，亡国亡民不如丧家之狗，如果不能取得抗战胜利，每个中国人，都要在敌人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要求官兵战斗时不怕牺牲，奋勇前进，经常灌输傅先生的手令：打敌必胜，怕敌必死；胆大沾光，胆小遭殃；汽车好打，坦克更好打；枪炮好夺，鬼子好打。勉励官兵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苦练杀敌本领，争取最后胜利。另外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严明纪律等有关方面的道理，也是政治教育的内容。宣传内容和形式还有：傅长官部的《奋斗日报》，军师政治部的《陈中日报》，抗战英雄事迹，政治问答，识字课本等。此外抗战初期通过地下党员李健生的新生活书店，可以看到解放区的进步书刊，如《解放三日刊》等。

教育方式有政治课和识字课，每日一小时。士兵以连为单位，由连指导员讲述，军官以团为单位，由团指导员讲述。总理纪念周，以团为单

位每周一次，讲述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教和蒋介石的言行。有时公布竞赛成绩和临时官兵应知道的事情。根据上级要求，有一个时期，军官每天学习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由师团政工负责人讲述。此外每天有升旗讲话，还教唱革命歌曲，开晚会，出墙报。军政治部的话剧团，一〇一师成立的国光秦腔剧团，新三十一师的放映皮影，后来也成立了晋剧团，经常深入到部队基层，巡回演出。各连均有奋斗室，放些抗战小丛书，供士兵借阅。小组讨论，每月四次，两次政治讨论，一般上级发题目，也有团政工室临时布置讨论题；两次生活会，以班排为小组，傅先生要求过小组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士兵作的比较好。连排长以营为单位；营团级干部，以团为单位组成小组，上级抓的紧时，应付一下，写个记录，准备上级检查。早晨升旗，每天均要进行，一般晨操后，多以团为单位，举行升旗仪式，由营长以上领导干部和各连队推选的士兵代表轮流讲话。早晚点名时，让官兵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口号。刺枪教练时，在草人上面写上“日寇”二字，每天官兵均以愤怒之杀声，对准草人刺杀数十下，练习射击时，靶子上面画有日本鬼子人头，进行瞄准射击；举行各种攻防战斗演习时，完全以日寇为假

设敌，进行演习。

第二，保证经费公开。过去部队经费（粮秣、被服、薪金等）都由师团军需（大多数都是部队的亲信人员）掌握，连队由连长掌握，往往不能如数发到士兵手中，甚至个别连长赌博输钱了钱，干脆不给士兵发或少发，也没人敢说话。至于结余下的办公费，马干（草料费）等自然归连长所有了。它是包干性质，能不花，就不花，能少花，尽量少花，剩下就是部队长自己的。自从有了政工监督后，领款、领粮及一切物品，均要同级政工负责人盖章领回后，及时发到士兵手中；机炮连队，马干由政工监督；购买群众的物品，该付多少款，一般也能付给，备有马干账，伙食账，及被服物品账，准备上级检查。连长能拿的，多是逃兵未报的薪饷及被服和办公费。连队由司务长和庶务上士管此项工作。师团以上经费专有军事处掌握领发，同级政工负责人也签名盖章。因为帐目复杂，同时怕得罪部队长，实际签名盖章只是个形式。特别遇到部队行军，打仗，军需人员全在后方留守，虽盖章，实际未起到监督作用。团以上部队长，吃、穿、用，甚至个别买房买地，也是从军需处借的。总的说实行政工监督后，部队里的弊端，减少了很多。

第三，改善士兵生活，让士兵穿好吃饱。我

们刚到部队，发现有些下级干部对士兵生活不够关心。伙食帐目不公布，连营长单独吃小灶，士兵吃不饱，有时还吃生饭，操练回来，经常喝不上开水，对病号不加照顾，重病不去慰问，自连队有了政工人员后，首先抓了伙食管理，帮助炊事员做饭，我当时是机炮连政工员，由我担任伙委主任，司务长白俊义当副主任，各班选一名士兵为委员，写出伙委会章程，张贴在奋斗室内；师团粮秣，由委员二人外出采购，用自己部队的骡马驮运，每月只花四五元钱就吃得很饱了。并按月公布帐目。特别在一九四一年以后，除上级按定量供应原粮外，傅先生部队自己生产，每连均种几亩菜地，还种点烟草（给抽烟人发点烟叶）、养猪，自己买毛驴磨面，调剂粮食，研究做菜花样，大大改善了伙食。不仅能吃饱吃好，而且逢年过节还能吃上肉，伙食节余部分随薪饷发到士兵手中。连级干部多数能与士兵同吃，不另立小灶，对士兵伙食关心多了。

穿的方面：当时每个官兵，每年发给单、棉、衬衣各一套，皮大衣一件（三至四年换一次），还发夹鞋、棉鞋、军毯、水壶、挎包、毛巾等，均能按时发到士兵手中。但由于鞋袜、手套毛衣、毛裤不够，均由傅先生责令军需单位，发给羊毛，组织士兵捻毛线，打毛衣、毛裤、毛

手套，夏天打草鞋。为了推动以上工作，各营、连、排、班开展竞赛检查，均能基本完成。每人均备有针线包，在发到棉衣时，总动员士兵拆洗缝补旧棉衣，先穿旧的，到最冷时再换新的。官兵的穿戴，完全一样，看不出谁是官谁是兵。

住的方面：一九三九年部队在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等地时，每到一地，都占住民房，不但对老乡干扰，而且住的分散，管理教育诸多不便。到绥西后，大部份住召庙，比住老乡家方便多了；一九四二年部队长会议后，傅先生要求部队自建营房，我当时在新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任指导员，我们团住郭家地，以我们二营一个营的兵力，两个月时间，（五月开工，七月完工）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完全用土坯砌成的窑洞，全团共建成三百五十孔窑，十分整齐，门窗用红柳和芨芨草编成，用草帘子铺做炕席，地下砌了泥桌凳子，上级只发了四百元营建费。在修建过程中，我们政工人员均积极参加此项工程，副团长郭静斋为营建主任，我和二营营长张百应为副主任，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期保质保量的完成此项工程。八月初全部搬进营房。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方便了整训和教育工作。特别在建营房时，每连多建一孔窑洞，专供轻病号或临时客人居住。在团部不远地方，专门盖了小医院，设有养

病室，还能吃上病号饭。营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代表，经常去慰问病号，其他部队也有类似的建筑。傅先生到部队讲话时，还要到这样的营房看一看，口头上给我们不少赞许。此外，不少连政工员还轮流到班里和士兵同住，我在机炮连任政工员时，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四个排，八个班，每天轮一个班，士兵是很欢迎的。了解到士兵的困难，及时进行个别谈话，夜间给士兵盖被子，督促洗衣服，晒行李，消灭虱子，还帮战友写家信，通过军邮寄出，战友不花钱。由于官兵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大大改善了官兵关系。

第四，废除打骂教育，实行说服教育。旧军队不能发扬民主，一切都是要求绝对服从。士兵犯了错误，一贯实行打骂、体罚、打军棍，讽刺谩骂。当官的动不动发脾气，瞪眼睛，尤其出操训练或内务检查等，没有达标，受到上级训斥时，就在士兵身上出气。对逃兵抓回来，轻的重打，第九十一团，一九四三年在伊盟驻防时，竟在准格尔召庙和陈塔两地，先后枪毙过四个携械潜逃的士兵。师长安春山，在部队移防向河西开拔时，在途中老乡家碰见一伙夫吸大烟，当即命令手下人枪毙，还把该兵连长，重重训斥一顿。所以士兵在部队，如同蹲监狱，加上他们想家，或家里的困难得不到解决，逃兵甚多。因此傅先

生要求各级军官，必须废除打骂教育，实行说服，让士兵过小组生活会，有说心里话机会。我在机炮连任政工员时，士兵小组会我必参加，静听士兵的反映。特别部队驻防偏关马梁村时，军政治部科长潘纪文检查工作时，来我连看小组会，士兵发言热烈，还得到潘的好评。

此外，傅先生对通讯很重视，每信必答，好的还要在“贯启”书刊上选登。我们连战友杜谨，山西绛沟人，当时年仅十七岁，初中文化程度，给傅先生写信，说他在门外打水，被当时从太原退出路过的部队抓了兵，现在他的姨夫，在西安经商，来信让他到西安继续上学，要求让准，而且他离部队，到西安入军官学校。傅先生回信不仅批还让团里给五十元路费，结果那孩子就这样离开了部队到西安入了军官学校，抗战中我们还有联系。

傅先生这种通讯的方法，是专设有信箱，专人管理。写信人可直接向他反映部队情况。有些部队长对这种通讯方法，很注意，防止有不正之处，下级可以反映给傅先生。

其次，在防逃兵方面，还采取过互相联系的办法，三个人为一小组，也是战斗小组，小组内若逃跑一人，另外两人要受到连长的斥责。因此各个组内如有人稍不安心，其余二人就向连长指导



员汇报，事先防范，多作思想工作，也起过一些作用。另外住营房有营门，士兵不能随便外出，与外界不能接触，也是减少了逃兵的方法之一。换岗放哨时，由班长带上去换班，避免士兵途中逃跑；出外执勤，总是考虑派有把握的士兵去执行；还规定了逃兵的处罚条例，一般发现逃兵，要通知当地师管区；向逃兵家里要人；此外，团长还规定发生逃兵后，让连长带上排长到团部汇报，往往受到团长的斥责，所以有些连队，逃兵走了，不敢上报，因而常有三、五名空额，当上级点验时，临时找人顶替。

自从傅先生提倡说服教育，加上政工人员的帮助，一般无理要求，乱打乱骂现象，基本克服。在对待老年士兵，多分配做杂活、种菜、磨面、清扫卫生，有在本班不能呆下去的战友，要求调班时，也给予调班。对连内生活不合理的地方也能提些意见，通过政工人员，与连长商议。

第五，严明部队纪律。三十五军部队纪律在严格要求下是比较好的，着装必须按素养教育（傅作义先生对部队着装有具体规定，如绑腿怎样打，符号怎样钉等等，全军一个样），室内虽然行李简单，但也是非常整洁的，各种枪械弹药等物品，都放置有条不紊，室内外卫生特别干净。在对群众态度上，傅先生有十条纪律要求，大意

是：说话和平，态度谦虚，借物速还，损物赔偿，买卖公道，不强占民房，不打骂老百姓，不擅入民宅，不调戏妇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另外还要求不嫖不赌，不吸大烟，这主要是对勤杂兵和少数军官规定的。无论平时战时，团里均有纠查队、稽查处巡回检查，发现有违纪事件，均能及时解决。纠查队或稽查处均有政工人员参加。

此外，我们刚到部队时，不少军官有打麻将掏宝的赌博恶习，营长、军需官与少校以上的部队长，经常赌博，严重影响整体。自从部队有了政工人员以后，各团主任和连队政工人员，向部队长进行说服工作，赌风是有所减少。特别我们四二一团的团主任当中，经常向团长刘景新做工作，使团长下了决心，在楼子营村一次集合连长以上部队长，烧了麻将牌二十四付，并正式宣布：为了抗战的胜利，要训练，要打仗，不能在赌场再消磨时间了；主任给我多说了，我带头再不赌了。各部队长一般也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怕领导随时找，加上连以下干部，出操上课均要随队参加。打牌、逛女人的现象基本克服。尤其在部队中最肯犯纪律的勤杂兵，吸烟聚赌的也很少了。

第六，加强军民合作，搞好军民关系。傅先

生常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很注意部队纪律，不仅不扰民，而且尽可能帮助人民。当我们政工人员到部队时，就觉得这个部队纪律是比较好的。但是，一九三九年初，部队由晋西北开往绥西时，由于有些杂牌队伍，曾在该地住过，他们纪律不好，为非作歹，竟有枪掠行为；他们所到之处，群众逃避一空。我们部队到了，群众见军队来了，又准备要跑。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各部队均以团为单位，派有英人员，加派政工干部，先与地方政府（乡、保、甲长）取得联系，介绍部队情况，说明傅主席的部队回来了，吃素斋给钱，用物品归还，不刁、不抢、不扰民，让群众放心。果然部队来了后，都是先整装坐在村外，等房子腾好后，才由营人员领上，按班次进住，真正作到了秋毫无犯。一下群众就不让走了，怕再来了部队又不好了。我们政工人员给群众解释，都是傅先生的部队，和我们一样，让老乡放心。由于部队都是一个作法，日久天长后，三十五军所到之处，群众都是放心的，军民之间亲若家人。真正作到不拿老乡东西，不损害老乡利益。并在驻防后，不仅自己占住的房子要粉刷清洗干净，有时连老乡的房子也帮助维修，每天院子打扫得十分干净，帮助老乡挑水，在驻地较远的地方挖

厕所；自己盖临时简易食堂；特别在行军打仗中，部队所到之处，老乡家中无人时，我们政工人员把箱柜上贴上封条，吃了菜，烧了火，也要把钱留下，写上条子放在一个地方。

每年春耕时，部队要协助老乡挖渠、打堰、兴修水利；机炮连抽出骡马，协助老乡耕地，秋天帮助收割；遇有洪水泛滥时，多次全师、全军出动，防洪抢险。

此外，还帮助地方政府训练自卫队，与地方政府商议，解决战友家中的困难问题。召开军民联欢会、座谈会，演剧时请群众看；给老乡拜年，请房东会餐；后来部队驻在干召庙、准格尔庙、张家庙、兰家巴庙，我们均要拜会喇嘛，并献给哈达。

教青年学生唱抗战歌曲，如军民合作，青年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

每团都组织有纠查队。每连抽一人，平日在连内协助连政工人员维持纪律。部队出发时，全团集中，由团政工干事率领，协助设营人员打前站，与保甲长接头，筹备一切宿营事宜。部队走后，检查纪律，看有无拿群众东西。损坏东西赔偿没有，院子房子打扫干净没有，并把结果，在部队长集合时公布。我在九十一团时，就是这样作的，对维护队伍纪律很有成效。

部队驻召庙时，对蒙古民族我们严格尊重其生活习惯，不犯老乡忌讳。遇年节日，会同地方政府，开展庆祝活动，宣传抗战意义，张贴散发标语传单，在墙壁上书写标语，组织高跷、旱船，演出话剧等。

另外在部队出操战斗演习时，均要预先看好场地，严防损坏群众庄稼。

第七，消除部队长之间的矛盾，加强团结。旧部队干部之间不团结现象很严重，平时貌合神离，战时不能互相支援，甚至看笑话。我们四二一团后来改为九十一团，从太原退出后，是由几部分编成的，团营长之间有些矛盾。主要是团长脾气坏，遇事着急，有点军阀作风，第一营营长和部分官兵是六十八师李服膺部（杨维垣先生带过来的），团长有排除异己思想，经常给该营营长小鞋穿，有艰巨任务总是先给他，搞好了应该，办坏了受气。所以那个营的官兵认为，他们是外来的，再好也不吃香，升级当官，轮不上他们。而营长又是山东人，是旅长的老乡，旅长很器重，平时能带兵，战时能打仗，团长虽有点排外，但也不敢怎么样？第二营营长是傅先生的老部下，聪明能干，遇事有见解，外号小诸葛，平时带兵，战时打仗，均有一套，处事比较有办法，全营官兵和睦相处。但因他是袁庆荣的四一

九团改编的，对团长有意见当面不说，背地乱议，团长对他有意见也没什么办法。第三营营长是个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不用脑子的旧军人。平时不抓训练，战时要小聪明，但系团长老部下，听团长话，团长很宠爱，处处照顾，因此别的营连长认为，团长待人不公平。少校机炮连长是老油条，只管自己吃好，穿好，嫖好，赌好，连内事情除了钱掌握紧以外，什么也靠排长。我到连内后，不少事也靠我。带部队只注意外表，能瞒过去就算了。团长碰上骂上一气，他却在背地也骂团长；中校团副个性耿直，为人正派，看不惯这些，但有职无权，知道装不知道。团里这么几个主要干部关系是如此，严重影响战斗力。所以团政工主任王中知道这些情况后，首先让团长很信任他、尊重他，能听他的话。经常帮助团长改脾气，遇到些具体事，耐心说服，调解他们之间的隔阂，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团长遇事着急发脾气，跺脚、骂人，甚至打人的现象好的多了。我当时在团政工处担任干事，听到营连长们有什么反映，回来后及时向主任汇报。主任每每能针对大事，向他们之间进行调解或解决具体问题。

绥包战役前，上级也知道这类问题，把二营营长调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任副团长；战役后，团

长因受到处分，再未回团。一营长负伤，伤愈后，调十七师一团任团长。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总的说，我们政工人员在加强部队团结方面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第八。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在部队经常官兵讲，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日军侵略中国，必然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因此，沦陷区的伪政权官兵和伪军官兵多数是被迫的，他们多数是不甘心当亡国奴，不甘心受敌人压迫的，我们进入敌战区，他们会积极帮助我们的。

日本军队士兵，绝大部分是贫苦人民，也是被迫替天皇，财阀，军阀卖命，只要给他们讲清道理，也是能争取过来的。

平时我们政工人员教士兵学喊话，如“由他伊势鲁”、“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等日语口号，但有不少士兵对优待俘虏的意义认识不足，每每提到这方面的政策时，多数人总是说：“只要抓住他，还让他活呢”？

我们瓦解敌军的方式是用传单说明战场情况，揭露他们家中的困难和日军对士兵非打即骂的军国主义行径，以瓦解其战斗意志。向他们宣传要为父母妻子而活，不要为军国主义送死，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发给通行证和路费，送他们回去，

不搜俘虏腰包。对伪军则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为日本人送死”，“不要替日本鬼子压迫中国人”。对抓俘虏多的官兵，要给予奖励，争取多抓俘虏，绝不杀害俘虏。在战场上对伪军来不及安置时，也可发给路费和印妥的通行证。对了解到的敌情，及时通知参谋处，供制定作战计划时参考。并常以红格尔图、百灵庙等战役中，伪军反正的六个师为例，说明敌伪军是可以争取的。

不过在瓦解敌军方面，因会日语的人很少，语言障碍大，故这方面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

#### (四)

一九三八年夏初，部队由晋西向绥南进发时，我们政工队学员，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被分配到部队，从事战时政治工作。在部队政工机构正式建立，人员充实、任务明确之后，傅先生对战时政治工作十分重视，因此，在八岱训练团战斗演习时，师、团、营、连攻防教案上，均有团级政工人员参加演习。实践中，政工大体要做如下一些工作：鼓舞将士士气，维护部队纪律，加强军民合作，协助军医，动员群众，运送伤员，审讯并安置俘虏，搜集情报，战后总结经验，调查作战官兵功过，编写英雄事迹等等。总的说政工人员



战时与部队长同进退，但只负责政治宣传方面的工作，不参与军队打仗、命令部署等军事。既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军政关系密切。只要是对打仗有利，在部队长领导下，全力以赴，共同进行。

三十五军，每次在部队行动以前，总要进行政治动员。在时间允许情况下，傅先生往往到各部队给全体官兵讲话，并检查部队实力，人员精神面貌。时间不许可时，也要召开团长以上部队长会议，讲清部队行动意图和作战计划。我们政工人员都要根据这方面的精神，传达到团连，以进行战前动员，严明行军纪律，进行战场鼓励。如一九三九年春，我们第四二一团在偏关整训时，奉命到偏关南老营马扎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行至离偏关八十多里的郑家上岭一带时，接着又奉命速返偏关。一天多赶到黄河岸边，次日拂晓全团渡过黄河，官兵对此很有意见。事后才知傅先生为了声东击西，避免日寇追击，才采取此项行动。当时旅长孙兰峰、政工主任鲁志浩给官兵讲明了这个意图，虽然跑了许多“冤枉路”，全军安全渡过了黄河，并将开赴河套，讲清傅先生就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战区的任务在河套。河套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大有发展前途，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今后我们归属

中央补给，一定比山西要好。将来部队扩大，我们的战斗力会更强大。眼前我们要行军六、七百里，中间有大段沙漠区，人烟稀少，喝水都很困难。好在傅先生已给我们备好了干粮。并要求注意途中行军纪律，特别注意“防逃”。果然在大沙漠里走上一天，只能碰一两个村子。当时虽有干粮，饮水却很困难。战友们背的装备多，行李重，行军艰难。每天有不少政工人员领战友找水。我当时是机炮连政工员，领战友设营时，事先也打听好有水地方，在沙漠里找烧柴，与连干部轮流放哨，行军途中动员身强力壮的为老弱人背行李，终于到达了河套。这里村庄、人口比较多，但因过去杂牌队伍百般骚扰，百姓见部队来了，不少人就跑了。因此我们政工人员，特别注意部队纪律。在部队未到之前，以营为单位，出一名连政工人员打前站。沿途宣传傅主席的队伍回来了，你们不要害怕，不要跑。部队吃东西给钱，住不下就露营，临走时挨家挨户检查，绝不让群众有损失。这样先头部队一过后，后来的部队老乡也就不怕了。群众还给部队烧水、做饭，表示欢迎。并说你们就不要走了，就住我们这里吧！

一九三九年冬，我们九十一团，驻五原县画匠圪堵整训，忽奉命开往西山咀一带，与敌对

时。上级宣讲，日军今冬企图进攻绥西，我们必须构筑防御工事，日夜锹镐并举，人喧马叫。我们师的九十二团，九十三团，却仍在原地驻防。军政治部话剧团还给他们演出，锣鼓喧天，灯火通明；安北县还组织慰问团，到我们部队慰问，送来不少的猪羊肉，我们连还分到十个猪、三只羊。当时上级指示，动员战士做好防御工作，准备痛击来犯之敌。这期间我是团政工室干事，并参与此项工作。不料当月中旬，竟看见不少部队路过我们团驻地，开赴西山咀，扬言打包头。接着，我们团也奉命从西山咀过河，沿乌拉山公路向包头挺进。走了约两天，团长才讲明，我们此举是为了策应南线抗日，牵制日寇调兵南下；我们攻打包头，在西山咀、乌梁素海畔构筑工事，是为了迷惑敌人。并给战友们分析了敌军虽武器比我军强，但我们兵力比他们雄厚，地形熟悉，城内群众对敌恨之入骨，除少数汉奸卖国贼，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爱国的；他们日日夜夜盼望我军反攻，一旦战斗开始，必然会帮助我军。我们已派友军骑七师沿黄河南岸运动，配合我们主攻包头，破坏铁路，阻击敌人增援，所以我们这场战争必须打好、打胜。为了奇袭成功，我们必须秘密行动，所以要求我军行动敏捷，机动灵活，途中保证部队肃静。我们的连队政工人员，向战友们多

次宣传，部队确实做到昼伏夜行。为了不让敌人发觉，行军中不点火，不抽烟；不说话，一切器具都做到不发声音；路过沟渠障碍物时，快快跟上，防止掉队；途中宿营，尽量都住在老乡场面，封锁村子，不让老乡外出，均用部队代号，免走露消息。当宿营时，也是由设营人员先接头，一切准备好了，部队再进村。总之由于部队能注意保密，所以二百里行军兵临城下，敌人还未发觉，进城后敌人从睡梦中仓惶应战。敌占区以往有不少杂牌队伍，纪律败坏，老乡十分反感的。我们一切行动都要给老乡们一个好印象，使他们欢迎我军到来。当攻城开始前，我们政工人员首先与部队长同进退，把握时机，适时鼓励战友，与敌拼杀；多缴枪炮，多抓俘虏；轻伤不退，重伤不喊；要人在武器在；忍饥受寒，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

距包头还有两天时，因友军破坏铁路早了一天，傅先生惟恐敌人发现，要求我新三十一师必须提前一天发起攻城，故两天路程必须一天赶到。我们政工人员和部队长，向战友讲明情况后，大家不计较行军中的疲劳，日夜兼程并进，终于按计划攻进包头。九十一团，第一、二两营，在营长张进修、甄日高率领下，于拂晓时，攻进城内。当营长甄日高负重伤后，二营三个连

长：令狐狸、崔新建、穆连璧，能发挥各自奋战，主动配合精神，形成犬牙交错，与敌逐院逐巷英勇搏击，战斗十分激烈。当四连缺弹药时，其他两连均能迅速帮助解决。

还有五名战友，为了追捕敌人，深入敌院，由于战场形势变化，他们与部队失掉联系，形成孤军固守娘娘庙。最后全部都壮烈牺牲，被誉为娘娘庙五战士。

次日凌晨，敌调其外围据点主力全面援包时，有日寇五十余名，在一辆坦克掩护下，向我第四连猛烈射击。此时，二营机枪连自动以猛烈火力向敌猛烈射击；中尉排长陈岐山等，抱着大量手榴弹，向敌坦克中的步兵猛烈投弹，把该敌全部歼灭。此战中，我动员群众抬运伤员时看到：一连长王纯刚，三营副营长王玉科，均因伤势太重，在送团指挥所卫生队途中壮烈牺牲。

当我军进城后，伪军准备插白旗投降，奈因我们处理不及时，未能争取过来。第九十三团一营进城时，有两名敌蒙古兵发现是国军后，用汉语说：你们是中国人的吧！这里好上。我官兵当即放上云梯，爬上城墙，使全营很顺利地进了城。这个守兵还告知我军，刚开来日军几十人，正在城门洞架枪休息，然后，他领我军偷扑敌人，当敌人问口令时，他作了答复，在敌人毫无防备的

情况下，我军一举全部歼灭了这伙敌寇。后来这两个蒙古青年自动加入了我军行列，随我们返回绥西。由于他两人的介绍，我军还占领了敌人的武器仓库，利用敌人的枪械弹药，消灭了敌人。

我军进城后，由于官兵有较好的政治素养，主动向群众宣传：我们是傅主席的军队，来解救你们的，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他们给部队做饭，烧水，带路，介绍城内情况。他们以为从此再不受敌人的欺凌了。不料三天后，敌人增援部队源源而来，我军消耗敌人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便有计划的向绥西转进。此役共歼敌两个团，日伪军约三千余人。俘伪军团长一人，伪军约百名。战斗中毙敌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和小原一明大佐以下军官二十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坦克三辆，炸毁军火库缴获各种武器、军需用品甚多。

在向绥西转移时，我和我团军医班长动员老乡，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兵十几名，运至马营县地，交军野战医院。在运送伤员途中，当远远发现敌汽车追击时，我们把伤员藏在草坑中，用草盖上，待敌汽车过去后，我们再走。后因敌汽车不断出现，我们只好昼伏夜行，直到把伤员送到后，我们才回到部队。

包头战役结束后，部队分驻各地进行整训。

利用空隙时间召开会议，总结战役经验教训。并调查编写英雄事迹，经代团长王雷震修改后，找政工人员油印成小册子，除呈报上级外，还发到部队。

此时根据调查了解，有些官兵和当地老乡认为，奇袭包头没有久驻，转进时又有些乱且伤亡很重，因而产生惧敌思想。这时政工方面除向部队官兵和驻地老乡讲清袭击包头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有计划转进是胜仗，不是败仗；并讲明：敌人如果再犯河套，我们的战略是，避不利找有利，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有利就打，不利就走，不与敌打阵地战。上级划分了游击区，我们政工人员除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外，并在游击区内，向当地群众宣传空室清野，分散埋藏粮食，把公家集中的粮食，配合当地乡政府，连夜运往山里；枪械弹药也按计划分别埋在一空的地方，到处埋地雷；破坏交通和通讯设备。安排老乡，如发现敌人，主动给部队通风报信，我们团的游击区，先在万和县一带，乌加河南北，后又到德顺和，黄河南北。我们做了充分的备战工作，以便迎击敌人。还让老乡以村为单位，编组进行演习，使敌人来后能及时藏起来。一月三十一日，果然日寇分三路向绥西进犯。我团驻地是敌人中路主力路过的地方，由黑田重德亲自率领其

二十六师团，经固阳、大余太，从乌不浪口进犯五原。我九十一团第二营，奉命前往增援守乌不浪口友军，当该营到达目的地时，友军已经撤退，当他们正在侦察地形之际，敌军扑了过来，我军当即迎头痛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敌人损失残重。我二营营长吕恒洲，连长崔新建，指导员李荣庆，均受重伤。三个排长二人阵亡，一人受伤。全连包括连长令狐狸在内，只剩下九人。六连三个排长二人受伤，一人阵亡。机枪连一个排长受伤。当时六连是百十人的连，回来时只剩下二十九人。我军虽损失严重，但确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掩护其他部队按计划转进他处。此后，我团部队均隐蔽到山里和黄河西沙丘中，使敌人来到绥西后，一直未找到三十五军主力，不得已只好返回五原、临河、陕坝等据点，准备长期占领。但我部队昼夜扰袭，这伙敌人不得不龟缩到五原城内及附近六十里以内的各据点，企图长期固守。

日寇进套以后，部队经常来往于乌加河以北山里和黄河以西沙漠里。吃不好，住不好，不少人抱有悲观情绪；干部产生想到后方修整补充，希望中央调别的部队接防等想法。此时，我们政工人员，根据傅先生指示精神，宣传讲述了只有收复失地，打走鬼子，才是唯一生路，别的想



法，均是幻想。另外积极协助部队，筹集草料，有粮站地方，凭证领取；没有粮站地方，给老乡开条子相借，并讲明收复失地后，凭条结补。通过这些工作，安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在我们政工人员深入工作下，老乡们随时给部队通风报信，如在邬家地、南茅庵、德顺和一带打仗时，就是老乡报告说：敌一百多人全是骑兵，正在村里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吸大烟、喝酒。部队闻讯后，当即愤怒出发，歼灭来犯之敌。因该敌全是伪军，一击即溃，大部就歼。

当部队在山里或沙丘里露营时，我们连政工人员，与连干部密切配合，设法让战友吃好，吃饱，并夜间多次叫战友起来跑一跑，防止冻伤。

此外，根据傅先生指示，全军各师团，抽调政工人员半数，化装成老乡，深入民间，宣传群众，收揽人心；同时协助乡干部，恢复乡政权；配合部队，征购粮草；进而组织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与敌长期斗争，进行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敌人。在陕坝，日本鬼子的几十辆汽车、坦克，因找不见老乡，找不见井，发动不着汽车。后来陕坝镇天主教堂的比国神甫供给了水，敌车才行动开了。

五原战役结束后，进行政权恢复，安定社会秩序。三十五军各部队，大部分驻在五原、临

河一带，进行整训。我们第九十一团驻在五原城南德顺和屯垦营房。我们各部队政工干部，均奉上级指示，抽调干部协助地方政府，清理战场，掩埋阵亡战友。我奉派到五原城内，协助地方政府动员群众，掩埋战友。我们团因是攻城的主力，在五原战役中担任最后攻打平市管钱局、屯垦办事处任务，因攻坚战中伤亡牺牲较大，经我们小组共掩埋了尸体一百多具。均装了棺木，埋五原新城的一角。并立了小石碑，碑上记载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籍贯、职级、阵亡年月日等。另外还派了军政干部，到乌镇把我团二营牺牲的官兵，也装了棺木，进行了掩埋。后来五原县政府，把这两地均辟为烈士陵园。

部队政治工作在接兵中也起到积极作用。三十五军因为经过包头、绥西、五原等战役，部队损失严重，加上部队扩编，兵源极感缺乏，大部分是靠陕、甘、豫西地区各师管区动员的新兵来补充。计先后从后方接来的兵约达五万人以上。傅先生对此很重视，每次经后方接兵时，都是从各师团抽调优秀军政干部，编战师团去执行任务。还特地成立了动训司令部，由师级干部杨维垣任司令，长期驻甘肃平凉，专门负责接兵工作。因此接兵成绩是比较好的，卖兵、受贿、逃兵、病故等事情也较少。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

曾参加过三十五军野战补充团到甘肃接兵，我任团指导员，每营有两个营指导员，都是有经验的老同志。接兵地点在甘肃静乐县、平凉县及陕西乾县，接兵总数一千七百一十五人。为了防范出现卖兵、受贿和长时间接不齐等现象，特以营为单位，组成接兵验收小组，由营长指导员，营部军医等组成。各连只负责接收管理，接够一连便送回团部所在地平凉。一般住有钱人的大院子里，防止了逃兵受贿卖兵的弊端发生，按正规部队作息整训，并每天上政治课，教识字，唱歌，游戏，搞文娱活动。团政工室，特编印政治教材，供指导员讲述。另外还访贫问苦，代士兵写家信，通知士兵当地县政府帮助解决具体问题；遇到家属来访时，也热情招待，多方安慰，使他们放心。生活上因当时铺盖很缺，便买了大量麦秸作铺垫，每周晾晒一次，每两周灭虱一次。有病及时治疗，重者送病院，抽出军医，由团军医处组成医院，专门治疗；自己治不了时，还请当地医院治疗。

伙食方面组织伙委会，以连为单位起伙，并严禁连队干部另立小灶。总的说三十五军在傅作义先生领导下，能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特别在包头，绥西，五原一百多天的三大战役，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塞上荒漠里奔驰，而官兵不但不

畏艰险，不畏强敌，反而斗志愈战愈强，斗技愈战愈精；以劣势装备之军，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取得伟大胜利，这与部队建立了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 (五)

三十五军的政治工作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首先是傅作义先生的重视，其次是各级部队长的支持，各级政工人员的努力，和全体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此，虽遭不少阻挠和干扰，但基本保持了带有延安政工传统的优良作风。扼要说来，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排除干扰，保持部队优良传统。蒋介石派姚大海到绥西调查，密报三十五军共产党很多，有赤化危险。国民党中央政治部特派以张彝鼎为首的战区政治部来到绥西，清理部队共产党人，并指出部分人的姓名，要傅把这些人调离部队。傅先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不少优秀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方式送回延安；对一些尚未引起注意的人，仍留在部队继续工作。并答应了师以上政工主任蒋派正职，傅派副职；或傅派正职，蒋派副职。如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傅派他多年的老干部周钧任主任，蒋调派吴芬（黄埔学生）为副主任。新三十一师政治部蒋派卢盖军、李忠（黄埔学生）先后为副师长兼主任，傅派张沧为副主任。一〇一师政治部傅派他多年的老干

部李思温为副师长兼主任，蒋派周时俊为副主任。新三十二师蒋派阎家屿为副师长兼主任，傅派张守仁为副主任。其他各部队，也多是这样安排的。团以下政工干部仍由傅安排，中央不放心，曾先后将所有政工人员，调中训团、西训团、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进行考查。认为没有共产党嫌疑的，均先后放回，仍回原部队工作；认为有问题的即行扣留，如七十三师的政工主任彭光祖被扣留后，再未回部队。还有些虽未调去受训但认为有问题，即着傅将其调离部队，由党训机关监督管训。如新三十一师政工主任王中，第九十二团政工主任杨文斌等。在离开部队后，傅为了保护这些人，曾组织调查会，让他们作些调查工作，归傅直接管理。即使这样，傅的政工力量仍用他多年培养起来的干部，保持了他多年要求的艰苦朴素，勤劳勇敢的优良作风，后来撤销了各级政治部，政工机构，均变为部队的一个处室，级别比原来低了。如军为政工处，处长为上校；师改为政工室，主任为中校。此时傅把蒋派的少将级主任，一律编为部附。所有军师团政工负责人，一律换成他多年培养起来的政工干部。傅为了贯彻他的主张，和他对部队组织性、纪律性的要求，在副长官部成立了人事室和《贯彻》社，统由王克俊先生负责。从傅长官部和原军政

治部抽调优秀军政干部，充任督导员。按他的意图，把对部队军政方面的一切要求，在“军事贯彻”上刊登。如他的讲话、手令、政策、法规、制度等；不定期地印发到部队，连长以上人手一册；要求军政干部，对必读的文件必须熟记并执行。有些重要文件，当时人人均能熟背，如干部条件，干部戒条等。并写成条幅，张贴在办公室，作为座右铭。政工干部，将此作为政治教材，向官兵讲述。此外，还规定有督导制度，考核干部办法，福利条例，阵亡抚恤条例和子女入奋斗学校办法等规章制度。

还要求干部每月向傅直接通讯一次，汇报工作，提出建议，反映部队不合理事情等等，并将答复好的通讯，刊印在《贯彻》上，让大家学习。这方面的许多工作靠政工方面去推动。

第二，召开抗建会，树立政治工作的良好基础。改变三十五军旧军队、旧作风最突出、最关键的是一九三九年，部队由晋西北到绥西后，召开了四次抗战建国讨论会。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树立了延安作风，为改造部队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从制度上规定了政工权限，体现了军政合一。傅先生对部队政工十分重视，每次召开部队长会议，总要同级政工主任参加，并规定各

师团召开部队长会议，也要各级政工人员参加。这样部队的各项工作，就能使与会的军政干部，密切配合，共同贯彻执行。

另外，还规定互阅文件，军事方面的文件，送同级政工主任传阅，同样，政工方面的文件，亦送同级部队长传阅。这样互相了解上级对部队工作的要求，便于配合，共同开展工作。

傅先生很注意对政工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师以上政工干部的调配安排全由他决定，不仅能选贤任能，还能考虑与军事干部的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第四，加强政工职能，在部队开展竞赛活动。为了加强部队政训，开展竞赛活动，傅先生要求部队政工干部，协助军事方面，组织开展竞赛活动。所有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和学习课，如各种射击，投弹，劈刺，二百米近距离战斗，战斗演习，熟背傅长官手令，通讯联络，内务卫生，经理、统驭、政治课问答，士兵识字等二十多项，均列入竞赛。每两周抽一个星期天，比赛一次。成绩以一个人为单位登记，以连为单位统计。全团成绩按营连排排列先后次序，当众公布。胜者发给巡回锦旗，或其他奖品，并出刊突击小油印报每周一张，公布各项成绩，反映竞赛中的情况，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些工作的组织领

导、计划安排、成绩计算和公布，均由各级政工干部会同主管训练的军事干部负责办理。我在新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工作时，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这些比赛，我亲眼看到有不少士兵看着很笨，但无论射击，超越障碍，到识字、政治问答，均能达到要求。因此，我常与外人谈，当兵的除了不能生孩子，什么都能办到。与士兵同吃，一般说，士兵该吃的均能吃到。我记得有一个李连长因另开小灶，被团长张进修查出后，当时关了半个月禁闭。

在接齐兵返回绥西时，为了防止逃兵多，便把有些思想顾虑的，或卖过兵的老油子集中起来，加强管理。护送到宁夏吴忠堡后，一律改乘木船到绥西黄羊木头下船，按计划到达目的地。对认为问题小的，一律步行，就这样安全返回绥西。这次接兵，除死、逃二十多名外，百分之九十七接回来了。我与团长张进修，到八岱干训团去见傅作义先生，汇报接兵情况，傅先生高兴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这次接兵成绩最好。并在干训团早晨升旗讲话中表扬了我们。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军官的努力之外，我们几个政工干部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各级政工人员，受傅作义先生爱国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



的感召，能忠于抗战，忠于国家；处处苦在人前，乐在人后；坚苦朴素，与士兵同甘共苦。能以谦逊和蔼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团结官兵。而且不争权，不夺利；不贪污，不腐化；不出风头，不尚空谈；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学习努力。在官兵中，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所以开展日常工作，还是比较好的。一般连政工人员，不少轮流到班里吃饭，轮流到班里睡觉，随兵出操，与士兵经常在一起，有说有笑，与官兵打成一片。战时也能与官兵同进退，协同作战，英勇杀敌，因此政工人员阵亡负伤的均有。如一〇一师团政工主任李炳泉，在高台梁战役中阵亡；连政工人员梁德纯在包头战役中阵亡。新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政工主任杨凯南负伤，团干事任宏远，连政工员李荣庆，师政治部科员张沧等负重伤。总的说三十五军政工人员，基本上都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处处能起模范作用。三十五军在抗日战争中能克敌制胜，政治工作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 抗战初期傅将军培训军 政干部开展敌后工作的忆述

董然韬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国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傅作义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命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带着他的第三十五军，离开他作为省主席的绥远，沿着平绥铁路线东去，负责指挥驻在铁路沿线的部队抵抗日寇西犯。以后又转进山西，参加了平型关、忻口、太原等战役。在太原战役后，傅因部队连续作战数日，损失严重，在共产党的协助下，于柳林地区进行短期补充整训。1938年初，阎锡山又任命傅为北路军总司令，命他由柳林北上，驻防晋西北河曲一带。这时才使傅有机会继续过问绥远的事情。

在抗日初期，傅部移防后，绥远只留有地方部队——绥远国民兵担负保卫任务。在日寇进攻绥远时，绥远国民兵虽曾表现了绥远人民传统的英勇精神，坚决予以抵抗，但终因日寇依靠其装

备优势，来势凶猛，致使绥远东自丰镇，西至包头的大部地区，于1937年10月被日寇先后占领。傅在到达河曲后，出于不甘心日寇长期占领绥远，很快在河曲建立了第二战区军政干部学校第二分校。派人分赴各地动员招收知识青年积极培训干部，为扩大抗日力量，收复失地做准备。接着利用日寇正欲大举南下攻打徐州，全国各地为配合徐州作战，纷纷出击日寇，在此形势下，傅部于1938年4月，发动了绥南战役，试图一举攻克绥远省会归绥。战事开始很顺利，曾打到距归绥城约30里的一间房村。最后因日寇调遣大批援军，迫使傅带部队仍退回河曲。傅部此举虽未达到预期收复归绥目的，但对配合徐州战役起了一定作用，并对绥远人民抵抗日寇的精神起到了鼓舞作用。

傅培训干部的来源，除派人赴后方各地招收人员外，同时也曾派人回绥远日寇占领区动员知识青年出来参加抗战。开始派往土默川日寇占领区的工作人员，有原绥远某小学教师郭映宽。当时，绥远地区情况是：敌我双方以黄河为界，河南为抗日军队占领，河北为日伪军占领。在日寇占领区的知识青年，除一部分跟绥远国民兵已退往绥西河套外，大部分仍留在日寇占领区，欲求报国，苦无门路。有一些人参加由绥远一些地方士

绅组织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有些人还不愿参加，正在闻鸡起舞，等待时机，傅作义主席派人员回敌占领区做动员工作。所以不到几日，仅土默川平原就串连了不少青年学生赴河曲傅部参加抗战。第一批走的有梁玉、刘岱、董然韬、李生敏、杜连、武克经、武克纶、白正全等共几十人。

正当这批知识青年到达河曲之时，适逢在原绥远乡建会系统工作过的张沧等部分人，奉傅电招，由绥西河套到了河曲。当时傅和这批人久别重逢，谈到绥远抗日开始的情况，表现颇多的感慨。傅曾说：他在1937年阎锡山命他带部队到山西时，如果他自己回绥远不走，依靠绥远一千多个乡，每个乡都有经过训练的自卫队很多，且枪马齐全，若集中起来，至少有五到十万人，就用这些人和日寇打游击战，绥远形势绝对要好的多。傅还说：他有个想法，准备要筹备建立一所绥蒙政治大学或叫其它什么名称的训练机构，专门招收训练绥蒙地区和志愿到绥蒙地区工作的青年学生，经训练后派到绥蒙各地工作。宣传组织人民，实行全民抗战。并问过大家有什么意见。

时隔几天，傅即宣布在第二战区军政干部学校二分校，除原有军事队、政工队外，新成立一个绥蒙队。让原绥远乡建会系统的一部分人和由

绥远日寇占领区出来的一批学生共一百多人，共同集中在该绥蒙队进行学习。该队队长叫化卜之（傅部军官），政治指导员叫王志一（又名王国璋、延安抗大毕业）。开设课程有《新三民主义》（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等内容）、《哲学》（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论持久战》、《抗战必胜》、《游击战术》、《军队统计》、《学运工作》、《民运工作》、及《抗战歌曲》等。教官大部由延安请来和去延安抗大学习归来的同志担任。记得的有潘纪文、相里矩、黄克、高映明、马名华等。上课形式，一般是每人拿一个小木凳子，去学校周围树林或山沟中进行。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进行狂轰滥炸，一天之内几次，甚至几十次的出动，有时一顿饭的时间内几次地跑警报。在这样紧张危急的气氛中，大家怀着抗日救国的坚定志愿，始终热情洋溢专心致志地学习着各门课程。

这期学习，根据形势需要，只一个月，于1938年结业。学员一小部分充实了军队政工，有张沧、康耀、梁玉、刘岱、陈绍、樊国璋、杨向春等，其余大部学员分配在北路军总司令部新建立的绥蒙工作团、以开展敌后工作。这部分人经过组织学习，于1939年二、三月间结业，共学习三个月。

绥蒙工作团团部就设在北路军总指挥部。团长由傅作义将军兼任，政治部主任是相里矩，下设有宣传、组织及总务等办事机构。基层组织是敌后工作队，按当时绥蒙辖区，分为东五县（丰镇、集宁、兴和、凉城、清水河）工作队，包头、固阳、武川工作队，萨县、托县、归绥县工作队。工作队设队长一人、政治主任一人。有的队长、政治主任或队员兼任一个游击县的指导员，负责省与县的联络工作。如萨县、托县、归绥工作队，队长是郭振华，联络点是托县祝亲庆村；政治主任兼武川县指导员是董然韬，联络点在萨县董家营村。队员十余入，有董然正、冯文琏、苏裕、韩熊等。至于还有那些工作队，或怎样组织，有那些人参加，都不得而知。因为当时为避免株连，组织原则，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互不了解，队长、主任只知本队队员。

工作队于1939年2月间。分别化装进入各工作地区。当时由于日伪政权建立开始，还未巩固，所以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尤其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有时在一个村庄里，同时有伪政权、民众抗日武装、大青山根据地工作队以及傅部的绥蒙工作队进行工作。都互不干涉，互相协助。在这种环境中，绥蒙工作队进入工作地点后，一经串联，宣传动员，许多青年就

活跃起来了。在有绥蒙工作队队员的地方，《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军民要合作》、《东北流亡曲》、《游击队歌》、《保卫武汉》等抗日歌曲，到处可以听见。在很短的时间内，许多知识青年从敌占区一批批地送往当时傅作义部队驻地——山西河曲，经过短期训练，充实军政基层干部或送往大后方学校学习深造。

1939年秋季，傅部转进绥西河套，绥蒙工作团隶属于傅部的动训司令部。驻地五原南牛惧，司令为杨维垣。敌后动员出来的青年，均归动训司令部接收。这些青年，除一部分受短期军政训练，充实基层军政干部外，还建立了国立绥远中学，进入该校接受正规教育。这部学生如郝泉甫、曲瀛楨、刘承汉、张希林、邱明义、黄璇等，都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先后在后方高等院校毕业。建国前后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绥蒙工作团在日占领区工作活动中，不但动员了不少男女青年参加抗日或到后方继续求学。且在1939年冬季傅部围攻包头时，策动当时在归绥铁帽村驻防的敌伪军反正。反正时，把当时修筑归托公路的四个日本工程师里泽善三郎等俘获。在绥蒙工作团的宣传活动过程中，也使敌占区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压迫，奸淫烧

杀，更有了深刻的认识，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由于敌占区工作进一步开展，范围扩大，敌人对于这些活动，也有所觉察，随之加强了戒备。有些护送青年的联系点，敌人封锁很严，如萨县、托县、归绥区工作队的联系点高隆渡口（萨拉齐南），最后几批学员护送，都是在敌伪军机枪扫射下渡过黄河的。工作人员的来往，也都遭到严密检查。一般都得待机渡河，藉两岸跑青种地的来往，或两岸互相串亲伙同掩护，才能安然渡过。有的队员已载入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如董然韬、董然正的联系点董家营村，曾遭日本十几辆军车围捕。本人捉不到，就把家人捉去，严刑烤打，让交出本人，最后得到地方有关人士担保营救，才被释放。

1939年冬傅部出击包头以后，绥蒙工作队奉命撤回河套，归属于第八战区傅副长官政治部。不久日伪军大举进犯河套，傅部转移黄河南岸及狼山等山地或沙漠，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同时傅部也伤亡很大，于是在宁夏磴口县（老磴口）建立了后方医院。绥蒙工作队队员，组成后方医院政治工作队（主任王志一、张守仁），从事医院伤病员政治工作。1940年春，傅部五原大捷，医院工作队撤销，第八战区傅副长



官部政治部，复回陕坝。同时，由国民党中央派张彝鼎接替政治部主任。张对担任过敌占区工作的人员很不放心，无休止地谈话、审查。大部分队员转入地方工作或考入后方学校读书深造。

# 抗战时期在河套的片断回忆

高映明

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震醒了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国人民和抗日将士们，虽经历了千征百战，遭受了万般苦难，但血汗都没白流，总算胜利了。同时，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对侵略者，只有抵抗，才能有出路；退让是没有前途的。

“在此八年抗日战争中，除我随傅作义部在原绥远省河套地区待了七年外，在胜利后，我还在临河待了三年。因此，对河套的社会情况，体会较深。就当时全国战区讲，河套可说是西北战区的抗日最前线。东边和敌人只有一水之隔。冬天结冰，敌人机械化兵团，可以自由活动。我们在河套七年，在军事上两次攻战过包头城，歼灭了进犯河套的日伪军，尤其在五原大捷击毙了日酋水川中将。胜利震动了全国。国民党中央政府曾授予傅作义将军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在政治上改革了县制，使乡民居住由疏散而集中；整理了土地，使“耕者有其田”；整修了渠

道，使水利趋向合理化；修筑了公路，便利了交通等等。这些大的军政事绩，多以见诸文史篇章，我不再作赘述，只就一些片断的旧情旧事，回顾叙述于下：

## 一、随军队转移到绥远河套

我初到傅作义部，开始是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官。1939年初，随部队由山西河曲经准格尔旗、东胜县，最后经元宝湾、丁红湾，从马七渡口过黄河到达河套五原县。当时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就设在这里。真正的五原县城，还在偏西北方三、四里处。这里叫“隆兴长”，是商业聚集点，居民较多，市面较繁华。以后县政府才迁到这里，“隆兴长”的名称，也就渐渐被人们忘却了。

傅作义部队由河曲经伊盟转移到河套，这样部队大调动，曾惊动了日寇。三月上旬傅初到五原，日寇即派了二十八架飞机轰炸五原县城，当时傅正在总部召开会议。飞机骤然出现在县城上空，大家遂即到院外单人掩体防空洞内躲藏。傅是最后出门，他先跳到一个防空洞，不知为啥出来又进入另一个洞内。腾出来的防空洞，由他的副官侯玉山跳入。警报解除大家又回到总部，打

算继续开会。傅作义先生很关心的说：“点名！点名人数！”结果，缺少了侯副官。大家马上出去寻找，发现他被炸弹炸起的土埋在防空洞里。经抢救无效，侯副官牺牲了。此事发生后，曾在群众中引起了一段“神话”，说傅作义“命大”，神鬼不让他停在那个防空洞里，侯副官代替他死了，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当然，若是身为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被炸弹掩埋在那个防空洞里，不用说他的卫士和部下们都会不顾生死地去抢救他，决不会等到敌机离开后检点人头时才发现少了“侯副官”。被土掩埋，时间短是不会死亡的，侯玉山替傅作义死，当时在河套曾一度传为佳话。

我们到河套不久，原来的“军政干部学校”就结束了。学员们都陆续分配到各有关军政部门工作。各教职员也都作了相应的安排。只有我们几个人被安排在副司令长官部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当委员。我被指派兼任书记，办理一切内外事务。这个会内，开始约有十来八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且都被认为是与共产党有牵连的人。在当时，这些委员们有的并没有到职，有的以后就逐渐离开了。不多久，文化工作委员会又改名为“设计委员会”。内容未变，委员总数减少了，却增加了一位给傅作义当过秘书的高云山委员，

负责“西北通讯社”工作。曾任内蒙古政府财政厅长的吕林，原名吕相周，他就是当时西北通讯社的一位干事。文化工作委员会或设计委员会，时间都不长，工作也不多，但委员们都是有较高文化的知识分子。因而，当时一些善于说话的人说我们是傅作义的“食客”，或者“鸡肋”。意思是说放走了可惜，使用又碍于国民党说是“异己分子”当食客，工作少责任小，在当时到是个消闲自在的岗位。

傅作义的副司令长官部，在五原待了约半年多，因离前线较近，遂迁移到陕坝南边十五里处的乌兰淖村。傅因当时前线军事较紧，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当时我们还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乌兰淖开过多次时事座谈会，以我为主要发言人，专门讨论研究过“日本问题”。因当时我在军政干部学校讲的课程是“抗战必胜”，课程内有“日本问题”这一章，因而，我就成了重点发言者。记得当时还复印出详细的发言提纲，供大家参考。

## 二、河套的社会状况

河套平原东西约300里，南北百余里。南临黄河，东靠近百万亩水面的乌梁素海。套内渠道纵横，水草丰茂，是“塞外江南”，也是绥远的粮仓。这块土地肥沃，宜农宜牧，气候温暖的宝

地，在“七·七”事变前，阎锡山统治晋绥时期就开始在这里作文章。1931年他在包头成立“屯垦督办公署”，自己任督办，傅作义和王靖国等人任会办。主要是王靖国负责，抽调部队到河套开渠屯垦。

当时河套的土地主权多属于杭锦、达拉特旗所有。因而，要开垦土地首先必须要与有关旗政府协商决定；其次就是修渠灌溉。后套圈子内，约有可耕地1,000多万亩，只要有水都可以种田。当时套内只有临河、五原两个县和半个安北设治局（改县前的名称），居民稀少，总共不过20来万人。土地多农民少，除军队能开垦一部分土地外，主要还要农耕。因此屯垦督办处负有两重任务：一是军垦，一是放垦。这样就把许多土地由各盟旗政府转移成为私人产业，出现了许多大地主。同时，部队屯垦的地区以营为单位，以各营长的名字命名，如折桂乡，良辰乡等。为了纪念阎锡山，就把部队团部所在地定名为百川堡（现新华乡。百川是阎锡山的别号）。

1939年我们初到河套时，只见大片芦苇、遍地芨芨和红柳（圣柳或称观音柳），经常可以看到狐狸、野鸡等出没其间。如陕坝到临河六十里的路程，中间要经过二、三十里的芦苇滩，行走其间，真有“天苍苍、野茫茫”，芦苇滩内道路

长之感。庄禾多零散种在草滩内，农民也多随着耕地而散居各处，并在各自的耕地上建起房舍。这些有房舍的耕地，河套农民叫做“牛犊”。有的大户人家，一家就可能有几处“牛犊”。但土地权并不完全归他个人所有，有的是直接租自蒙旗政府，有的是租自其他大地主。

当时农民在河套种地，还有一种“游耕”方式，土话叫做“跑青牛犊”。多是“梁外”（指黄河以南）的，或远在陕北神木、府谷等地的一些穷苦农民。他们都是在春耕前来到河套，租用地主的土地，有的连种子和牛犊（指农具）都是租用的。到秋收后，交清地租、卖掉余粮、还清债务、留下口粮，就用牛车拉着粮食和妻子，再返回原籍。为此“候鸟”般的春来秋归，老乡们就把这些人叫做“跑青牛犊者”。

人民的居住条件，除少数县、镇外，都很简陋。许多农民在哪里种地，就在哪里居住。那些跑青牛犊的外地农民，几乎是年年住新房。春来盖起的房子，秋起后即拆掉，木料寄放在人家或仍拉回原籍，到次年再拉出来，重新建住房。有的住房为了保暖省工，把土挖下二、三尺，再用土坯垒墙留个小窗口，八根椽子，即能盖起一间住房。当时河套的树林少，木材缺，有的树林子不是地主的树园子，就是渠道上的护渠林。无地

权的农民们多不愿意种树，因树不能搬走。树大了不归自己用，谁还愿意种树呢！“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的这句话在这里是有一定的道理。

当时河套农村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是很原始的、落后的。在这种形势下，农业生产是不会发展起来的。但河套是抗日最前线，官兵要吃饭，战马要草料，这必须要由地方供给。因而政府在五原战役结束、地方秩序恢复后，首先成立了“战地复兴委员会”和“土地整理委员会”，以后又成立“地政局”等组织。随后又接管了以前所设的“放垦局”，并宣布停止放垦。对已放垦的土地，进行了清理整顿。将清理出多余的耕地，授给有劳力而缺乏土地的农民。每户百亩，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也划出了乡镇地基，让民众们能聚住在一起，发挥其“守望相助”和发展农村经济的作用。由于这一个政策的实施，就使河套社会的旧面貌大大的改变了。另外，又配合着县政改革和乡村的保甲编制，使农村逐渐走上了有严密组织、良好秩序的定型社会。土地清楚，地权确定了，以前地主的“跑马地”（指跑马找地界，言其多也）和渠修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土地的情况，自然就受到了限制。

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以往随水而耕的“游



耕”习惯，也逐渐固定了下来。以往“跑青牛犊”春来秋归的外地农民也不来了，来了的因分了地，也不再回去了。河套农村由散漫的无定型的社会形式，很快就变成了有组织，能安然生产的农村。这都和傅作义省主席的施政分不开的。

河套的农业税，1939年还是采取以往的“丈青”办法，经丈量测定农民实际种田的亩数后，按亩征收实物。这是一种不仅工作麻烦，且易发生扰民和出现循情枉法，不公平的事情。地权确定了，安定了民心，农业生产也就容易发展了。傅作义将军抗战期间在河套待了七年，军粮民食仍能自给自足，这和整理土地；确定地权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

河套的地名除极少数外，都是随着环境条件而叫起来的。山东圪旦，河曲圪旦，不用问，那是山东人和河曲人聚居的地方；其他，如世成西，隆兴长，都是由商号叫起来的地名；杨柜、李柜，原来是指地主家所住的地方，后来也就成了地名；有的如“黄芥壕”，据传说是以前有一位农民偶然发现一大片被水淤澄出的土地，他找了几具牛犊把那堆地全部种成了黄芥后，就离开再没管，等到黄芥成熟时，他来了一看，庄禾长的非常好，他高兴的收获了黄芥，发了一大笔财，因而那个地方，也得到了黄芥壕的名称。同时，

这也说明当时河套社会和农民种地的情景。

被正式命名的乡镇，除几个县的地名和前面提到的屯垦军定名的百川堡、折桂等乡外，其他多是在县制改革时，由绥远省政府正式命名的，如米仓、狼山、晏江三个县名。其中晏江县是为纪念五原抗日战役牺牲的团长贾晏如和营长赵寿江而定的名称。同时把河套的临河和五原两个旧县改为五个县，即临河、五原，米仓，狼山，晏江。安北县本是原安北设治局的西半部，东半部在乌梁素海东边，被日伪占据，因此安北辖境未动，只正式改为县制。对各县的建制，都撤销了原有的“区政府”，下边直接设乡政府。乡的名称也都是由省政府统一命名，统一编制。如临河的乡都是“永”字；安北的乡都是“太”字，一提永乐，永灵等就知道是临河；太庆，太恒等它必然是安北。其他各县也都各有各的牌号。这样，不仅听起来明确，在行政业务指导上也比较方便。以前不明方位和地名、重复混乱的现象，随着也逐渐被纠正了。

另外，我们初到河套时，看农民的衣着住房方面，确实不敢相信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那个“套”。但很快发现农民在粮食、吃饭等方面那样的慷慨大方，使我大吃一惊。如我在百川堡一个普通人家借居时，看到其

粮仓（一个小房间）门口，满地是麦子和豌豆，任其践踏损失，主人们毫不在意。我还替他整理收拾过，也许是主人客气，说：“这里粮食不算啥，糟践点没关系。”另一件事是我与另一位同志前去陕坝，中途没有卖饭的，我们二人随便到一个小村里找了一个人家，请给我们做点饭吃。人家很客气，马上就给我们烙饼，还作了菜，吃后不收分文钱。我当时很奇怪，吃饭不要钱是不是老百姓怕我们？因为我二人都穿的是军装，“丘八”的名声不好，有“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的害怕情理呢。以后我才知道河套地多、人少，且都是水浇地，粮食多，人大方。就连乞丐也都是骑着毛驴，驮着口袋。当然过往走路的人吃一两顿饭就无所谓了。但“好景不长，盛筵难再”，不久绥远省政府和傅作义将军的抗日兵马以及许多有关机构，都陆续在河套建立，人马加了好几万，一切军粮民食，都要靠河套不到二十万农民种地供给，问题就出来了。整整七年，绝大部分军队和人员才因日寇投降而东移。在此期间，河套农民们为了支援抗日，自己节衣缩食而交纳军粮，为国家、人民立了功。以前那些慷慨大方的待人习惯，也就慢慢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河套是以黄河而得名。水利条件好，且陆续修有永济、黄济、长济等八大干渠。因而土地肥

沃，粮草丰茂，得有“塞外江南”之美名。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若利用不好，水利也可以变成水害。当时身为军政首长的傅作义先生，他很明白这个道理。尤以要抗日打仗，兵要粮，马要草，缺粮少草是会不战自溃的。因此他一到河套就提出：“治军与治水并重”的口号。他在河套期间，除每年要动用兵工疏浚各旧渠道外，还在1943年军民配合新修了“复兴渠”。西起临河、东至五原，除有十四条支渠外，干渠全长96华里，能增加灌域四千余顷。这条渠道不仅扩大灌域，增加了农田收益，还拨正了以往河套渠道的方向和减少了水害。因以往渠道多以狼山脚下乌加河为退水，且地方多不愿意跨越县境修渠，以致渠的坡度多不太好。复兴渠与黄河走向差度不大，坡度好，水流畅，渠背也可作拦水坝利用，减低河水进套的泛滥。这在河套开渠历史上，是一个大改革。因而，国民党政府的水利部长薛笃弼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都先后来此视察访问过。

这也说明傅作义先生能以十多万军政人员，在河套一隅之地与敌伪整整斗争了七年，能攻能守，而粮秣无匮（包括驻伊盟部队的供应），民食无缺，这除与上边说过的“整理土地”、确定地权政策有关外，发展水利也是其中的最主要的

因原之一。当然，人是决定的因素，傅作义与干部为抗日而团结苦干，这点更是不能低估的。

### 三、陕坝概况与傅先生的生活片断

1937年秋冬间，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被日伪占领后，次年，傅作义主席派财政厅长李居义，在陕北榆林成立了“绥远省政府驻榆林办事处”。1939年初，傅作义部队由山西河曲转移到河套后，也随着迁回河套陕坝，正式恢复了原绥远省政府的建制，因而，陕坝也就成了绥远省的“临时省会”。这样，不仅使河套被日伪蹂躏后的创伤有组织的逐渐恢复，且着重的发展了地方贸易、农业水利、公路交通等战时急务。尤其是陕坝镇，是当时战区司令部和省政府所在地，在地位上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河套是傅作义的抗日根据地，而陕坝镇就成了根据地内的军政指挥中心，也是国民党的省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在地。只是一个绥远省政府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虽都是战时的简单组织，但局、处、科室也不下好几十个。若再加上干部训练团，奋斗中学和其他有关办事处、联络处、医院、剧团等文化、卫生团体及军政干部的家属，一个小小的陕坝镇也确实无法容纳。为了应付社会的需要，接着陕坝镇就成立了“市政筹备处”，扩大了城市范围，使陕坝镇在战争中能

够发展成为市的规模。

我们1939年初到陕坝时，它还是一个小土城堡，居民约有数百户，有些小商店。行政组织是属临河县的一个镇公所，但社会权力都操在天主教堂手里。镇里居民很多全是天主教徒，据说不信教，就不能进入镇内居住。教堂的外国神父都是瑞典人，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辛丑条约划归瑞典传教的自由教区。

1941年初，侵犯河套的日伪军被消灭后，形势比较稳定了，陕坝也就随着逐渐变化，其行政权由临河县的镇上升为县级市，同时也配合河套乡村的整理建设扩大了境界，规划了街区，整理了市容，并划出基地鼓励私人建设。公家也建起了“中山堂”，以供文艺演出及聚会之用；修起“塞上新舍”，以便招待来宾。这虽都是战争时期极简陋的建筑物，但在抗战时期财物紧缺的环境下，尤以河套是新开发地区建筑材料极缺，能把陕坝扩建成为一个市的规模已是难能可贵了。当时群众对缺少“风”无“景”的陕坝筹各市还凑成了几句朴实的“五景”素描顺口溜，说什么“园子渠口穿天杨，塞上新舍西沙梁，补加一个中山堂”。园子渠口是每年都要唱戏，群众集市的地方；穿天杨是指天主教堂门口高大整齐的一排罗马杨树；塞上新舍是公家建设的招待所；西

沙梁是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中山堂是新建的集会礼堂。其实都没有什么风景可言，而竟然凑出陕坝五景，可见抗日战争时期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悠然稳健！

陕坝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是巴盟杭锦后旗政府所在地。人民给这个原来绥远省的战时临时省会、傅作义的抗日指挥中心——陕坝，披上了红装，扩大了建设，更增加了其光荣与伟大。

在陕坝时期，傅作义是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还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指导员。用当时的话说是“党政军团一元化”。只有法院因三权分立，他没有指挥权。在这样多的事务机构中，傅先生如何进行工作和指挥，尤其在战时军事事务，那就更繁重紧张了。1941年到1944年，我给傅先生当过三年秘书，经常在他身边，关于他的工作、生活活动，略知道一些。现就我的了解与体会，分别叙述于下：

1、工作概况：傅经常住在司令长官部（简称长官部），寝室和办公室同在一起，只有两间上房。我们秘书、秘书长和参谋长十来个人都共同住在一个大院内，院内还有几间会议室以及警卫员、勤务兵的宿舍和厨房。当时所说的“长官

部”，主要就是指的这个大院；其他如副官处、参谋处和警卫连等都安排在这个大院的周围。要进入长官部必须通过两道岗哨，第一道是站在外大门的，这里就是副官处和参谋处；第二道就是我上边说的那个大院的门岗。要进入这个大院不像进入第一个大门那么容易。到长官部院内要见傅作义，还必须告诉负责副官，请示傅同意后才能进去。当然还有些内部高级人员和我们的秘书们不必经过请示、报告，可以直接进入傅的办公室。因傅住的那两间房在东北角，还另有个小天地，不是整个敞开的。虽然没有正式岗哨，但傅常有警卫副官们在周围，这就是当时傅作义长官部的外形布局。

傅先生的工作方式，除直接指挥有关单位外，据我体会，他还很重视横的联系。他曾告诉我说：“经纬线相结合，才能织成布，才能发挥力量”。因此，长官部管人事的单位，不叫人事处而叫“编组处”。其工作方法主要表现在每日的“工作汇报”会上。方式是每日早晨长官部各处、室集中参加升旗后（升旗是国民党的制度，各单位自行举行，且都有人讲话），即在长官部会议室进行汇报会议，参加人员固定的是党政军团各单位负责人。有时，其他单位因有必要联系事情，也可以主动参加。由傅



亲自主持，他若外出，就由一位参谋长代替。汇报会很像现在的碰头会，但不研究问题，只是起相互联系、协商工作的作用，除星期日和有特殊情况外天天如此。我当时是负责宣传的秘书，汇报会我经常参加，并负责记录有关问题和傅先生的指示。在相当时间后，我还要在会上回头问一下事情办的情况。因此，有些负责人常常先向我打招呼，告诉对事情处理的情况，以免我在会上提出质问。这个汇报会没有什么秘密，苏联顾问和美国顾问都先后参加过。对这种汇报会，我深深体会到：不仅加强了各机构横的关系，也确实能减少许多不应该有的扯皮事，并可以促进工作。

傅作义还有一个特点是每日上午电务处要送来中共新华社发出的文字新闻广播稿，都是先交我或另一位秘书阎又文，但傅先生并不看，都是由我们念给他听；还有些不需要他签字的文件也一样是以耳代目。使我惊讶的是，他常常能在我们念读中指出问题，甚至一个字用的如何他也会提出。起初，我认为这是“官大了摆架子”，以后我明白了他是在锻炼听力，以便能细致的听到你讲话的内容。无怪乎他在会议上，对许多人谈话，能明确的提出问题的所在，并指出纠正。这只是我的体会，傅先生是什么意思？或许不是这样。

当时在河套有长官部秘书头衔的有好几位，但在傅作义周围受到直接领导的只有我们三个人：一位是随从秘书阎又文；一位负责私人函件的陶仲康；我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此外，还有秘书长和秘书主任。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直接受命于傅作义，没有什么横的领导问题。故一遇傅先生外出我们就“放了羊”，谁也不管谁，过着自由自在的神仙生活了。

2、傅作义先生的生活也很朴素，他不吸烟，不喝酒。我给他当了三年秘书，同在一个桌上吃了二年多饭，都是上午糜米饭，下午馒头；我们共六个人，每饭四个菜，是两盘荤加素，两盘纯素菜，从来没吃过鸡和鱼，可是河套是盛产鲤鱼的地方啊。记得有一次，桌上送来蟹黄炒鸡蛋，傅吃了一口惊讶的问道：“这是哪里来的！”可巧副官处长温永栋在旁边很自然的笑了笑。这是我们几位秘书和一位参谋同傅先生一桌吃饭以来唯一的一次佳肴。在粮食紧张时，士兵们曾吃过豌豆，同时，在战区副司令官的饭桌上也以马料（豌豆）当饭餐。在其他生活方面，如傅先生的办公室除比我们多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用毛口袋布作的木制躺椅外，别无不同。他穿的是黄绿色军服，腰系一条小皮带，和我们以及士兵们没有两样。床上盖的是多

年战时用的兰色棉布被褥，较我们的花被褥还要寒酸。而我们的办公室只有用土坯垒起的小墙上那块桌面是木板，其他睡的坐的都是土炕、土凳子。这种生活情况，一直到1941年我离开傅先生周围时还没有改变。这固然是战时形势使然，但也与傅先生的朴素作风是分不开的。

讲到傅先生的个人生活，我再补充一些琐事。1941年前，因战事不允许干部带家眷，也不同意在地方上结婚，尤其对军事干部限制较严。他把家属们编入“眷属团”，派专人在后方负责照料。五原战役后，有些干部逐渐把家属接来河套，以后傅先生也把家眷由后方移到陕坝。从此，除战斗部队自动成立眷属团外，对地方行政机关再没提出过这个规定。对许多事都是这样，他绝不在自己不能履行的情况下而要求部下遵守规章制度。

他的家被安排在长官部北面后街，他只是在星期六回家度周末。陕坝仍是抗日前线，这在警卫工作上就给副官处出了难题。处长温永栋知道傅先生的性格，若给他门上站个岗哨，一定要受到批评。温处长很巧妙的在长官部的后墙上安了个门，设了警卫岗，这岗哨对过就是傅先生的家门。表面上看岗哨是警卫连的，实际就是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警卫的。另外傅在光复五原后赴重

庆接受国民党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衣着还是战地与士兵相同的军装。到重庆后始知办事处长王则鼎，早行通过傅夫人刘芸生要来服装尺寸，替傅先生作好了一身新衣，这才没有使他把“土气”在重庆显出。傅作义先生不讲形式、不讲排场，故他经常外出或返回都不许惊动他人欢送或迎接，因而，傅先生的行止除少数人外，其他许多人是不知道的。

# 抗日时期的绥远省政府

李福祺

## 绥远省政府迁陕坝的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华战火燃起后，当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七团军总司令的傅作义将军，因南口战局吃紧，奉命驰援汤恩伯部并奇袭张北县城。由于南口失守，战局吃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放弃绥远和雁北，退保山西，并令傅作义率部转进平型关一线。傅考虑到身为绥远省主席守土有责，曾电请阎锡山，要求回师绥远，未获批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遂将阎锡山的意图密电绥远省政府民政厅长袁庆曾，并示意他“必要时可将绥远省的军政人员撤到山西河曲待命”。当时绥远省政府主要组成人员，除了傅先生和袁庆曾以外，尚有财政厅长李居义、建设厅长冯曦、教育厅长阎伟、秘书长曾厚载。是年9月战火已延烧到绥远，他们按照傅的指示，分作三批把军政人员撤到山西。省政府公务员在河曲稍事停留，除部分自愿返回原籍外，其余部分，一是随着袁庆曾进入太原，参加了太原守城之役；一是随着李居义暂住临汾待

命。太原失守后，李居义根据傅的指示又转移到西安。1933年夏季，傅将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移驻河曲，后又由西安迁移到榆林，并组成“绥远省政府临时办事处”。1938年底，傅参加了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武功会议，会上任命傅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副长官部驻河套地区。1939年春傅部从河曲进入河套地区的同时，并命令李居义率领绥远省政府驻在榆林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迁到河套，先在五原恢复了省政府建制，同年四月又迁到陕坝。

#### 机构设置和人事情况

绥远省政府恢复建制，开始首先恢复的是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和秘书处，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又逐渐成立起地政局、合作事业管理处、公路管理处、物资管理处、粮政局（负责收购农民余粮）、田赋处（负责田赋征实工作。1942年以后又将两个局、处合并为田赋粮食管理处）、会计处、绥西水利管理局等单位。这些单位负责人的情况是：秘书长先后由曾厚载、阎伟、于纯斋担任；民政厅长先后由袁庆曾、陈炳谦、于纯斋担任；财政厅长由李居义担任；建设厅长先后由王国英、曾厚载、张彝鼎（发表后未到职视事，后改任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分署署长）担任；教育厅长先后由阎伟、潘秀仁担任；

地政局局长周北峰，副局长由狼山县 长 赵国鼎调任；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张遐民、副处长高映明，高调任临河县长后，由孟璧接任；公路管理处处长刘建勋、副处长许世昌；物资管理处处长王国英、副处长陈善教；粮政局局长俞杰；田赋处长由财政厅 长李居义兼任，副处长王映荣；会计处长俞杰；绥西水利管理局长王文景。

此外，省政府还设有人事室、视察室、统计室、蒙务组等直属单位。它们既不属于厅、局一级单位，也不同于厅下面的科室。有的是在傅直接领导下工作，如人事室、视察室、蒙务组（与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合署办公，办公地点在长官部）；有的是属于独立的业务单位，如统计室。省政府人事室与长官部人事室合署办公，主任先是樊涤青，后是王克俊，副主任仇曾武；蒙务组长王任之；视察室主任由省政府委员阎伟兼任；统计室主任贾英毅（1947年升格为统计处）。省政府还设有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参事等，记得当时总工程师是苏纪忍，副总工程师是高子良；秦丰川、杜澗（秦川）等都是以参事的名义，而在长官部工作。后套虽是农业区，但当时没有成立农林处，而仅设有一个农业研究机构——绥远省农业研究所，所长张立范，属于建设厅领导。在陕坝东北郊区世成西设有试验基地。

上述机关的干部来源。因为河套地区文化不发达，单靠地方难以满足对于干部的需求，除开始从地方招考了一部分，其余，有的是从大后方招收来的；有的是动委会撤销以后转到厅、局工作的；有的来自日本统治下，沦陷区；有一小部分是从事商业的青年。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阶段以后，国际上胜负日趋明朗，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傅先生为了储备干部，准备胜利后东进接收，1942年以后，曾经通过秘书长李纯斋以河北人的关系，从沦陷区北平、河北两地引进一批知识分子，共有三千来名，其中有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小学校教师、失业青年。这批人来到绥西陕坝以后都分配在直属单位和《奋斗日报社》、绥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以下简称绥干团）工作。仅秘书处就安排了五人，梁容若先生就是这时来到后套的。梁容若字子美，河北行唐人，北平女师大历史学教授，先在《奋斗日报社》工作，日本投降后，曾一度任过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主任，后来转到《平明日报》工作，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府干部任免，同副长官部一样，都是在人事室统一掌管下，按照傅部“整体干部”要求任用的。荐任级干部，必须由傅先生亲自核准；委任级干部，则由任用单位报请省政府核准加



委。不论荐任级或委任级干部都必须经过绥干团受训，对“干部条件”、“干部戒条”有了统一认识后，才准予任用。有的是先受训，后任职；有的是先任职，后受训。绥干团是军事战地干部训练团的简称。军事团是培训军事干部的；行政团是培训地方行政干部的。它的宗旨是：一、培养三民主义信徒；二、训练奉行命令的战士；三、增强工作和领导办事能力。但行政干部受训的内容主要是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项业务性知识，由各有关业务厅、局派人讲授；政治课程由国民党省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派人担任，主讲三民主义和“新生活运动”等项内容。政治课程占得比重很小，主要是行政课程。绥干团只负责生活管理。绥干团主任傅作义兼，副主任陈炳谦，教育长李世杰、副教育长康保安，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工作，主要由康保安负责。受训时间一个半月，毕业时发给结业证书。省政府录用的雇员不在此例。

省政府的编制，和副长官部情况相同。由行政院批给编制总额，人事室按照傅的意图，对军政两方面统筹兼顾，进行安排。所以地方行政编制，并不都是用在行政方面，因为傅部由于部队编制限制，有的军事干部，不都是中央直接任命，是傅为了实际工作需要和调整各方面关系，而安排

的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省政府向上报的编制，要比实有人数多。到1945年，秘书处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共有工作人员一百多名。根据我所看到的上报材料，仅秘书处就已超过这个数字。

### 机关工作概况

傅先生到河套以后，为了加强一元化领导，身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绥远省政府主席、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三要职，在这三者之间，他主要侧重于军事和政府的工作，而在军政两者之间，因为战时原因，他又把主要精力放在长官部的工作方面。对于省政府的工作，除了大政方针和人事、经济两方面的工作，他亲自过问之外，一般日常行政业务工作，都要委托代理主席负责处理。在河套阶段，前后代理过省主席职务的李居义、袁庆普、陈炳谦三人。他们都是傅部军政两界的元老，深为傅所倚重。李居义，山西安邑人，早年任过汉中、长安县长，颇有政声，并追随徐永昌工作多年，后为阎锡山赏识，任绥远善后局总办。1933年原绥远省政府财政厅长苏体仁去职，阎向傅推举李接任财政厅长职务，傅素知李为人老诚稳练，遂表示同意。李接任后在绥远掌管财政长达十二年之久，为傅所器重。解放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首席参事、内蒙古人民政

府参事室副主任等职务。袁庆曾，河北河间人，与傅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一直跟随傅工作。守涿州时任团长；在傅天津警备司令部内，担任宪兵司令；傅1931年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后，又推荐袁担任民政厅长兼省会警察局长。为傅之左膀右臂。袁因病1941年赴重庆疗养，再未回绥远。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员。陈炳谦，山西晋城人，任过三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绥干团团副主任、民政厅长，有见识，傅甚为尊重。董其武接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后，傅曾一度把陈留在绥远，为董参赞省政，董对陈必恭必敬，言听计从，称他为“陈老师”。解放后，历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首席参事，内蒙古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内蒙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代理主席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诸如，省政府发文稿件划行、主持省政府委员会议以及一些重要工作的决定等。省政府发文稿件，属于各厅业务范围的，由有关厅拟稿，再送秘书长审核，最后由代理主席划行（即签发）。如事关重大需要傅本人亲自审核时，则由秘书长亲自送傅划行。省政府每星期召开一次委员会议，委员会议有两种名称，一是委员例会，一是委员谈话会。委员参加会议人数超过半数的，称作委员例会，不够半数的，称为委员谈话会。委员会讨论一般议

案，由代理主席主持，重要议案，傅亲自参加。秘书长和各厅长一般都是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局、处长中只有物资管理处处长王国英是委员（因为他曾任过建设厅长，所以委员还保留着）；不兼任厅长职务的委员，据笔者所知，只有阎伟和鄂齐尔呼雅克图，鄂齐尔呼雅克图远在伊克昭盟，委员会会议他从不参加。提交委员会讨论的议案，都事先草拟出提案，发给各委员审议，会议通过后方可颁发实行，与议案有关的局、处长，可列席委员会会议。

此外，副长官部每天早晨组织有汇报会（系碰头会议形式），在陕坝的党、政、军、团机关领导都参加。会议由傅先生亲自主持，有些需要研究或请示的工作，都提到这个会上讨论决定。这种会议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

省政府规定有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制度，分年度和季度。工作计划，当时称之为施政方针或施政纲领。每年初由秘书处根据各厅提供的材料负责草拟，定稿后除上报行政院外，并下发省直属机关和专、县、市贯彻执行。施政方针是提纲形式的，分条罗列着在这一年中所要做的工作。虽然要求上是“普遍、继续、深入、贯彻”，但实际上已成官样文章，每年的施政方针，没有什么新的道道，基本上是上一年度的翻版。省政府

定期向行政院做工作报告，专、县、市定期向省政府做工作报告。省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因当时限于条件，是油印成册的，除报送行政院，并分赠给各省、市政府。

旧政府公文处理手续是繁琐的，战后，行政院为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公文格式（即抬头或低头格式），行文多改用代电和公函，个别的用报告或签呈。即使如此，在办文手续上仍然是繁琐的。凡是省政府的收文，先经总收发室登记后送到厅，厅收发登记再分发到科，科长再批给承办人；承办人拟稿后，经过科长、秘书、秘书主任、厅长层层审核后，再送秘书处秘书、秘书主任、秘书长审核，最后主席划行。这套手续完成以后，厅里缮写后，再送秘书处校对、盖印，然后送交总收发室发出。总之，一件公文从收到发，要经过十几道手续。

### 省政府办事机构——秘书处

秘书处是省政府的办事机构，它在省政府各部门之间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左右的纽带作用。它虽然不象各厅都有着专管业务，凡是不属于各厅分管业务范围的工作，它都得承揽起来，所以又称它为“不管部”。秘书处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承担着省政府的政务和事务两方面的工作。秘书处在抗战时期，虽然编制上有设计

室、法制室、秘书室、一二三四科，但实际上机构比较简单，人员也不多。处下设有秘书室和总务科，1944年并曾一度设立过法制室（日本投降后即又撤销，却增设了交际科和译电科），主任由解宝武担任。秘书室设秘书主任一人，先后由王一然（中共地下党员）、曾广麟担任（职务高于科长、秘书，协助秘书长负责秘书处的工作，实际上历任秘书主任只管秘书室本身的工作，对其它科的工作不多过问），秘书三人，人事管理员一人，收发员一人，档案管理员一人，负责省政府文稿草拟、审核以及会议组织和办理秘书处本身人事任免手续等工作。总务科设科长一人，由潘仁斋担任，负责省政府的经费管理和行政事务工作。科下设总收发室、监印室、会议室、书记室、庶务室、图书室、传达室等，均在科长领导下工作。省政府还有警卫队，亦由总务科领导。警卫队（亦称勤务队），负责省政府机关的警卫工作，并兼管喂养省政府的马匹。警卫队队长李清潭，副队长李学明。警卫队是连的编制，实有人数仅三个班；待遇与地方警察相同，身穿黑色制服，佩带“绥远省政府警卫队”符号。秘书处定有处务会议，不定期召开，由秘书长主持。在于纯斋任秘书长期间，会议开得比较经常、认真，每次会上，除检查工作、布置工

作以外，于还经常介绍省政府的全盘工作情况，传达傅先生对省政府有关工作指示等。并组织有读书会，目的在于督促青年人读书学习，读书内容根据个人兴趣自由选择。于在每次会上都认真听，并有所评论。

### 公务员的生活与待遇

省政府在河套阶段，对公务员生活管理是比较严的。每天早晨上班前集合跑步，参加朝会已成定例。朝会在省政府大门前操场举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和秘书处职员均得准时参加。朝会由秘书长主持升旗仪式，有时并由厅长们（或秘书主任）轮流讲话，内容主要是介绍本厅业务工作开展情况或有关时事政策。秘书长对各厅、处参加人数经常检点。各局、处因驻地分散，朝会分别在住地举行。每隔一周，副长官部举行一次扩大朝会，各机关、团体均带队前往参加，在会上一般由傅先生出面讲话，讲工作和形势时居多。抗战期间，国难当头，公务人员星期日只放假半天，上午照常工作。要求每一公务员必须严守岗位，不得无故擅离职守，例如省政府监印××，在一个休假日未打招呼即离开陕坝探亲，正赶上这天有个急件没有盖成印，代理主席陈炳谦大为恼火，批示交由侦察总队（傅部的宪兵队）把他禁闭了几天。公务员工作上失职，按

照规定，一般是记过、降职、直至开除公职，押禁闭这在全国来说也是不多的。

省政府地点偏居陕坝东北隅，据说这里原是一家商号的地址，有南北两排土木结构房屋30来间。开始四厅和秘书处都在这个院内，后因机构扩充，人员增加，容纳不下，于是民政厅、建设厅、教育厅都分别在附近另找了小院搬出，剩下的秘书处住在前院，财政厅住在后院。因办公桌凳短缺，都是用土坯砌成土台泥光，代替桌凳。因办公室都是好多人拥挤在一个办公室办公，一个土台往往是三面坐人。秘书长办公室占着一间小屋，并兼做处务会议室。河套地区工业非常落后，城镇中只有一些小手工业，如铁匠、毛毛匠等。占据包头的日军对这一地区进行经济封锁，严禁工业用品西运，所需工业用品主要依赖后方西安，西安到河套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即使来一些商品，也是非常不易。所以后套农副产品较为丰富，工业用品是比较缺乏的。当时办公所用的笔墨纸张质量都是低劣的。

抗日战争中期，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在全国范围内，依靠工资为生活来源的公务员、教职员、工人的生活情况逐渐下降，携有家口的，每月所拿到的工资，难以买回所必需的生活用品，甚至有的糊口都成了问题。为此，毛泽东



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善公教人员和工人的生活待遇。国民党为了安抚职工生活、解决燃眉之急，采取了一个补救的办法，给公教人员实行“米贴”，就是除工资照发外，另外每人每月发一定数量的大米。为了领发方便，每月按照市场大米的价格，折合成现金，随着工资一并发给。河套地区因盛产糜米，绥远的公务人员变通为发给糜米实物。具体规定是，不分级别，不分职务，一律按年龄分作三等：三十岁以上的为一等，发给糜米一石；二十五岁以上的为二等，发给糜米六斗；二十五岁以下的为三等，发给糜米三斗。每月发工资时发给米条，米条可以到指定的粮店领米，也可以变价要钱。河套粮食不缺，所值无几。中央住在陕坝的中央银行、邮政局、直接税务等单位，按照行政院规定发的，同住一地，生活上较之地方行政人员为好。省政府的公务人员，除了上述待遇外，还每三年发给一套黑色棉制服，每隔一年发给一套米黄色的单制服。布料都是西安生产的，与我国沿海城市生产的布相比较，既薄又粗。虽然如此，在当时物资缺乏的情况下，能够穿上这样一套新衣服，也是心满意足了。

### **主要施政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的绥远省政府偏居绥西一隅，

政令所能达到的范围，只是河套地区和住在伊克昭盟第三专署所管辖下的东胜县、桃力民绥远省政府办事处（简称为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旗战时民众组训处（简称为达拉特旗组训处）。河套是指西起三盛公（与宁夏接界），东至西山咀，南临黄河，北到狼山这一地区而言。1925年，冯玉祥将军担任西北边防督办时，河套仅设有五原一个县，因地区辽阔，行政工作很是不便，遂将五原的西面划出了一部分，设立了临河设置局；五原东面划出了一部分，设立了安北设置局，这就是临河和安北两县的由来。1939年春，省政府进入河套时，这里设有绥西专员公署，专员为陈应道，是傅先生在山西临汾时任命的。绥西专署所管辖的是五原县、临河县和安北县。五原下设四个区，临河下设四个区，安北原有两个区，第一区公所所在地太余太为日军占据后，仅剩下二区，所以称为半个县。当时行政建制，县下设区，区下设乡；区设区公所，区公所设区长一人，由省府委任，助理员一人，区警四人，乡设乡公所，乡公所设乡长一人，书记一人，乡警二人。

河套地区地势平坦辽阔，沃野千里，是冲积平原。渠道纵横，阡陌交通。拥有黄河灌溉之利，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抗战初期，约有军民二十

八万多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约为十七万多。已经开垦的土地农作物生长茁壮，尚未开垦的土地生长着茂密的芨芨草，一望无际，可谓塞上的鱼米之乡。“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就是指的前套宁夏和后套地区。抗战期间，由于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区劳动人民，为了寻求生路，冲破日军种种封锁，不断奔来这一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使河套人口逐年增加。1944年6月，绥远省政府公布的绥西人口数字，十个县、市、处共有70,482户，391,308人，其中蒙民7,648人，壮丁55,402人。

第三专署所管辖的东胜县、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旗组训处，都地处于伊克昭盟境内，除东胜县外，其它两个处都是战后建立起来的，处的地位虽然与县相同。但在我记忆里，省政府的发文，只是直接发给河套的五原、临河、安北、米仓、狼山、晏江六县、陕坝市政筹备管理处和第三专署，对三专署管辖的三县、处，一般不直接发文。记得1945年日本投降后，省政府各厅、局大部分职员东进，我随秘书长于纯斋留在陕坝处理省政府机关善后工作，大约在9月间，收到了达拉特旗办事处给省政府的一个呈呈，写的是“谨呈主席袁”，我很惊异，送于秘书长阅时他也笑了。袁庆曾代理主席职务是1942年前的事，

已经事隔三年，他们还是写袁，这也说明他们和省政府直接联系太少了。此外，建立动委会、推行新县制等工作，也只是在河套地区进行的，在第三专署管辖下的三县、处并未开展，可能是避免引起蒙旗的反对。

省政府进到河套以后，撤销了绥西行政专员公署，成立了第三行政专员公署，任陈应道为专员，办公地点设在东胜县城；组织行政人员参加百川堡“抗日建国讨论会”；成立起绥远省、县、区、乡四级战时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战争。至此，河套地区并存着两套行政机构，一是省、县、区、乡四级政府，一是省、县、区、乡四级动委会。省动委会主任由傅兼任，副主任由省政府民政厅长袁庚曾兼任，委员由省一级的党、政、军、团的领导担任，省政府的各厅长都兼任着动委会委员。委员会下设书记长，由于纯斋担任，负责动委会的具体领导工作。各县县长兼县动委会主任委员；区动委会主任委员兼任区公所区长；各乡长都是民选的，多是由当地大户担任着，规定乡动委会对乡公所负有指导监督责任。因此，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工作，基本上掌握在动委会的手里。

1941年，傅先生鉴于在行政上存在两套人

马，两套机构，各行其事，工作上有很多掣肘，遂在河套范围内推行“新县制”。撤销各级动委会，撤销区公所，从原有四级政权机构，改为省、县、乡三级；缩小县的管辖范围，扩大乡一级政权职能。增设米仓县、狼山县、晏江县。米仓建制为县政府，狼山、晏江建制为设治局（后又改为县政府）。具体行政区划是，将安北二区划为安北县，县政府设在执子补隆；五原县原来的二区和三区划为晏江县，县政府设在塔儿湖；临河县原来的二区和三区，划为狼山县，县政府设在永安堡；临河县原来的三区的一部分和整个四区划为米仓县，县政府设在三道桥；五原县新辖区为原有的一区和四区；临河县新管区是黄土拉亥河以东和庆东乡以南地区。并把很多大乡划为小乡。原有的陕坝为省会所在地，人口已增至三万多人，故升格为市，市政机关定名为“陕坝市政筹备管理所”，其地位与县相同，市长一直由常佩三担任。县政府原设县长一人，秘书一人，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科，各设科长一人；会计室、田粮室各设主任一人；此外还设有警察局和司法处。新县制实行后，由原来的四科二室改为五科三室，增加了田粮科、合作指导室和警佐室（即司法科），编制20余人。乡公所设乡长一人，乡长是由省办的“新县制干部训练班”中选

拔的，大多是由原动委会区、乡干部担任。乡长由政府委任，副乡长一人，由当地选举产生，配合乡长进行工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股，分别管理有关业务工作，各股由干事一人充任。编制大乡八、九人，小乡六、七人不等。

新县制的主要内容是“管、教、养、卫”四大部分，它是以管字为中心的行政管理办法，诸如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征兵入伍、配合军事作战等等。实行新县制以后，减少了行政层次，减少了人员，出现了上下一致，指挥灵活，行动迅速的局。

省政府对下面布置工作，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每年初制定年度施政方针，发到专、县、市贯彻执行；二是每年省里召开一次行政会议，研究工作，布署工作，省级机关科长以上以及县、市长都参加；三是通过发文件指挥工作，这是大量的和经常的。对下了解情况，采取两种办法：一是规定下级定期向省政府做工作报告；二是省政府经常派视察员到基层，了解施政情况，考察干部作风，回来后并得向省政府提出书面报告。有些县长奉视察员为上宾，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但有的视察员就不为所动，据说视察员许作霖，每次下去视察工作，不先到县，而是直接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据实反映。

因此有些人视他为不识时务，讥他为“许疯子”。其实他只是秉公办事而已。

1938年底傅主席参加武功会议以后，投靠了蒋介石，摆脱了阎锡山对他多年的控制，自认为如鱼得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一展身手。所以，他一进到河套，立即在百川堡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统一军政人员思想，提高军政干部素质，坚定抗战信心；学习解放区的做法，成立动委会，动员河套地区群众参加抗日战争；对河套地区存在的不合理土地制度进行整理等等。他希图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因而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陆续派来特工人员对他进行监视，并大肆逮捕革命人士，除了一部分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和革命青年，为傅先生陆续“礼送”回延安外，没有走的纷纷被捕，仅动委会被捕的就有一百多人。从此以后，傅先生在绥远行政工作方面，完全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照抄照转。所以，在河套阶段绥远省政府工作值得回忆的是：一、成立动委会；二、进行土地整理；三、兴修河套水利；四、组训民众等工作。

# 游击军抗日和五原大捷回忆

刘万春

1939年初，傅作义将军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场，统一指挥绥远省境内各游击部队，加强协同作战，打击日寇。在包头县以北、固阳县以西、安北县大余太以东的高台梁地区，成立包（包头）、固（固阳）、安（安北）游击区司令部。调我任包、固、安游击区中将司令。

游击区司令部下属三个骑兵纵队，三个县政府的步骑保安大队。第一游击纵队司令赵炽昌，下属三个骑兵团；第二游击纵队司令武俊峰，下属三个骑兵团；第三游击纵队司令史钦芳，下属两个骑兵团（一个团多数是蒙古族）。另外包头县政府有两个骑兵团保安大队，一个步兵保安大队；固阳县政府有两个骑兵团保安大队；安北县大余太区有一个骑兵团保安大队，一个步兵保安大队。抗战前安北县政府设在大余太，以后安北县改设在扒子卜隆镇。包、固、安区游击司令部有两个警卫骑兵团、无线电排、参谋处、副官处以及医务所等。

高台梁地区地面广阔，沟壑纵横，乌拉山横



贯东西，长约三百里，南北宽约二百三十余里。南至包头黄河渡口，北至五原县万和长、乌加河南岸，草场茂盛，居民分散居住。包、固、安游击区司令部驻在高台梁中心“文昌庙”内。

各游击纵队官兵多属包头、固阳、安北等县居户，又多系各县在抗日前的县乡保安队、警察队、县政府人员。地形熟悉，情报灵通，军民同仇敌忾。

我游击区建立后，各纵队不断有计划、有组织地互相协作袭击包、固、安日伪军。1939年4月5日，我第二、五纵队协力，将驻包头县前口子村的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营击溃。毙敌一百四十余人，俘虏日伪军十八名。获轻机枪四挺，步手枪六十九支，子弹百余发。1939年6月20日，我第二纵队第一团岳升团长（原安北县保安大队长），袭击大余太伪安北县政府，击毙伪军骑兵一个连，伪警察局官兵四十余人；获步手枪五十九支，子弹一万八千发；俘伪县政府人员及官兵二十七人（后由司令部释放）；获供销社布匹四十三匹，手电池两箱，商品货物万余斤。岳团仅伤亡十人。

1939年8、9两月，驻包头日军三千余名，大炮十余门，乘汽车二百余辆，三次向高台梁中心文昌庙地区扫荡。经我第二纵队、第五纵队以

及各县保安大队分路截击，经激战被我军击退。歼敌官兵二百数十名，击毁敌汽车十二辆，获枪支六十二支。我军伤亡九十二名，被敌军炸死炸伤马匹一百四十余匹。

1939年12月19日，配合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新编第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等部，攻入包头县城时，我第一纵队赵炽昌部，在前山包头县城以东，破坏了平绥铁路（现京包铁路）包头至萨县段铁路八公里，炸毁水塔三座。阻击了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增援的日军，支援了我新编第三十一师进击包头县城。在后山后口子村余大召庙山麓，阻击了由固阳县大余太区增援包头城的日伪军。

### 日寇集重兵侵犯我绥西河套

1939年12月，我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一师袭击包头之战，虽未能全歼包头城内之敌，但我军之行动完全出乎日寇意外，日寇万万没有想到。我军主力部队能从数百里之外的河套出发，行军数日，夜袭进入包头城。毙敌联队长小原一明大佐和小林一男大佐及以下军官二十余名；毁敌汽车百数十辆，坦克两辆，小炮四门；获步枪、手枪、轻重机枪等等胜利品数百件（当时在陕坝展览过）。因此次袭击包头城，侵华大本营认为傅作义部队在河套的存在，对他们是最大的威

胁。为确保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两个军事战略要地，乃于1940年1月16日，将驻张家口、大同、太原、临汾等地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重德师团调来包头；并配以步兵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各联队及第二十六骑兵联队、第十一炮兵联队等共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我河套地区大举侵犯，拟于短期内全歼我军，以解失败之恨。

### **我军周密部署，严阵以待**

傅作义将军根据形势分析，认为日寇集结重兵大举侵犯河套，其目的拟以优势兵力歼灭我军，侵占河套这块粮食宝地（当时民谣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就是指的这个地区，它盛产春小麦）。但是，日寇兵力是从平绥线、同蒲线各地区临时抽调而来，只能与我军短时间作战，难以持久，故在战术上，力求速战速决，企图短时间歼灭我军，占据河套。

傅将军的策略是：我军避日寇主力，既不对敌打阻击战，也不打阵地战，而是诱敌深入河套，用消耗战、游击战歼灭敌人。在战略上，我军避不利找胜利，不失机、不吃亏；在战术上，运用以少胜多，以多打少，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的战术。消耗敌人兵力，打击日寇有生力量。

## 日军分路进犯，我军迎头痛击

1940年1月31日，集结包头之日军分兵两路向我河套侵犯，一路沿乌拉山前山山麓、包五公路侵犯。行经麻池镇、宿亥滩、公庙子，遭我军步骑部队严重阻击，激战一日，入夜，我军沿乌拉山西山咀退水渠转移。2月1日午，日军进犯至西山咀退水渠，遭我守军迎头痛击，苦战终日，日寇伤亡惨重。我军阻击任务完成，夜间放弃西山咀阵地，分路撤回五原县附近。

另一路日军，经包头后山店口子村，沿包头、乌镇、五原公路，向我乌镇、乌不浪口阵地发动进攻。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我阵地猛攻，多次被我军击退。我军为避免重大牺牲，决定午夜撤离阵地，沿狼山向西转移。

1940年2月3日午，日军侵占我五原县后，即分兵两路向临河县、百川堡、陕坝侵犯，并派飞机向五原以西各地区侦察。我军各师、旅步骑部队，各自与日军保持适当距离，严密监视敌人。同时，我各部队在有利地形条件下，不断袭击敌人，或截击敌人。敌飞机经常侦察轰炸，我骑兵部队两次被发现，日寇飞机跟踪轰炸。我骑兵门炳岳部在黄河南岸、东胜县境内，于1940年2月5日被轰炸，官兵伤亡百余人，马匹三百余匹。我骑兵第三师井得泉部，于2月7日在五原

县黄河北岸遭敌机轰炸，官兵伤亡六十余人，马匹伤亡近百匹。

1940年2月4日，日军一部，由五原县城乘汽车经郭家地向临河县城进犯。车队行至临河县城东的十余里张家庙附近沙梁地区，遭我第三十五军一〇一师部郭景云团伏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死敌百数十人，击毁汽车二十余辆，缴获各种武器百余件，俘日士兵八名。我军伤亡四十余人。是日午后，日军大部乘车到达时，我军部队已向张家庙南沙梁地区转移。次日，日军占领临河县城。另一部继续西犯黄羊木头、头道桥。

1940年2月4日，北路日军向百川堡、陕坝乘汽车西进。我机动部队，待日军车辆行至百川堡时，我伏击部队放过先头车队后，突然向敌车队冲击，将敌车队分割两段，向敌猛力冲杀，予敌以沉重打击。歼敌三百余人，毁汽车四十余辆，缴获轻重机枪十一挺，步、手枪九十八支。敌我对峙于黄昏后，我军撤离百川堡，放弃陕坝，转移北山里。次日（2月5日）日军侵入陕坝，我主动放弃陕坝。我军空室清野做的比较彻底，使敌一无所得。

日军侵占临河县、黄羊木头、陕坝等地后，我军日夜不断袭扰，因此，日军深感兵力不足，战线过长；加之我实行空室清野，敌粮食供给困

难，乃于1940年2月10日撤离黄羊木头村到临河县城；又从临河县城撤至鄂家地，2月17日撤回五原县城。同时北路陕坝镇日军撤回百川堡，于2月11日也撤回五原县附近。后又撤到盐海滩扒子卜隆（今乌前旗政府北端）、西山咀退水渠；另有一部日军，撤至乌镇、乌不浪口一带。五原县城为日寇指挥中心。日寇为确保五原县城，将日军精锐部队大桥大佐联队长、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部、宪兵队，另有五原行营主任乌古庭、伪蒙古军骑兵第三师师长郭某（名字忘记）和绥西联军总司令王英等部，共万余人驻守五原城。

1940年3月初，日本天皇派日本警察总监水川伊夫中将（皇族）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慰问日本侵略军。3月14日由归绥市来包头代表天皇慰问日军。在包头慰问后，水川伊夫中将于3月18日午到达五原县城内慰问。

### 我军发起总攻，收复五原

1940年3月，傅作义将军根据河套实际情况和敌我现实形势，做了全面的分析，认为：日寇主力军已东撤，黄河及各渠冰冻已到溶化季节，应利用公路泥泞，汽车通过困难，敌增援缓慢的大好有利时机，以速战速决的战术，集中全力歼灭五原县城的日伪军；同时以一部分袭击五原县

四周的伪蒙古军和伪绥西联军王英部等各据点，并必要时放水阻援，以全歼日军。

河套平原地区，南邻黄河北依乌加河，东迄乌梁素海退水渠，西至乌兰布和沙漠区；东西长约三百华里，南北宽约百华里；八大干渠，遍布其间，支渠纵横为网。隆冬季节，渠水结硬冰，各种车辆任意通行；春暖三月冰溶解冻，前山包（包头）五（五原）公路泛浆，遍地泥泞。特别是包五公路西段，公庙子至西山咀退水段泛浆严重，周期长十一、二天，人马困乏行走艰难，汽车、坦克更难通行。在后山包（包头）、乌（乌镇）、五（五原）公路，利用春水上涨灌溉农田之际，以乌加河与乌梁素海之间为重点，放水阻止敌军增援，并使乌镇一带伪军断绝退路，以达全歼目的。

傅将军令各部队，于1940年3月18日午夜，开始秘密向五原方向推进，限3月19日一律到达进攻位置；3月20日午夜，开始对五原县新、旧城及周围各据点同时发动进攻。

1、我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兼）新编第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为进攻五原县旧城的指挥官，指挥新编第三十一师、五临警备旅、附炮兵第二十五团第一营，由五原城西向五原旧城及义和渠桥东西地区之敌，发起进攻。

2、我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指挥新编第三十二师、附炮兵第二十五团第二营，由五原西北向五原县城、前后补红和广盛西地区之敌进攻。

3、我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由师长董其武指挥，附炮兵第二十五团（欠两个营）为总预备队，另派一部歼灭距五原县北约二十里的梅令庙之敌。

4、骑兵第四军第七师，由师长门炳岳（兼军长）指挥，向五原西新公中伪军进攻，阻止敌军返回五原增援。

5、新编第六旅由旅长王子修指挥，进攻五原县北万和长伪蒙古军第四师，必要时放乌加河河水阻其增援之敌。

6、绥远游击司令马秉仁，指挥新编第五旅安华亭部、骑兵新编第三师井得泉部、骑兵新编第四师石玉山部及包（包头）固（固阳）安（安北）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赵炽昌部，挺进扒子补隆、盐海子、西山咀、公庙子、马七渡口一带，歼灭伪绥西联军司令王英部第三、第四军，并在包五公路沿线选择有利地势，伏击由包头前来增援之敌。

1940年3月20日夜，我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一师孙兰峰部的先头部队冲进五原县旧城义和渠以



西。当时，日军聚集在义和渠地区，主力部队及指挥部驻在官钱局地方银行、屯垦办事处和五原县小学校。日寇将各院打通筑成碉堡群，并外架铁丝网。

我军占领义和渠桥后，继续向敌猛烈进攻，经激烈战斗三小时，日军指挥部所驻扎的官钱局地方银行、五原县小学校附近一些据点，先后被我军占领，仅有屯垦办事处及其附近据点日军坚守顽抗。我军多次猛攻未克，后形成对峙局面。

1940年3月21日晨，我军集中炮兵火力，猛烈袭击。此时日寇飞机数架对我军轮流轰炸扫射，掩护日军向我军反攻，战争十分激烈。我五临警备旅第二团团长贾晏如，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傅作义将军得知情况后，决心在敌增援部队未到达之前，必须一举歼灭五原县城之敌。遂增派我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一个团、炮兵第25团一个营增援孙兰峰师，全力猛攻盘据屯垦办事处及附近之敌。五临警备旅、第一〇一师一个团在我炮兵猛烈轰击掩护下，勇猛进攻，经激战，我军攻入屯垦办事处。同日寇进行白刃战，将顽抗日军击溃。五原县旧城日寇，除一部分残敌突围逃窜，少数被俘虏外，其余均被歼灭，我军收复五原县旧城。

我军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部，3月20日由五原城西向五原县新城及前后补红的日伪军进攻。新旧城之间地形开阔，在没有什么建筑物可做掩护的情况下，向凭借城堡和坚固工事守敌进行强攻，战斗非常激烈。我新编第三十二师第九十五团第一营营长赵寿江，率全营向五原县新城日伪军猛烈冲杀四次之多。我军伤亡惨重，营长赵寿江身中敌弹五处，为国牺牲，全营官兵奋勇杀敌，最后全营生还官兵仅一百数十名。

新编第三十二师第九十五团团长张世珍，率所部（缺赵寿江营）进攻新城西侧广盛西之敌，双方战斗十分激烈。3月21日晨，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第三〇三团和炮兵团增援，新编第三十二师在炮兵团炮火的掩护下，五原县新城附近的前后补红和广盛西各据点被攻克。守敌一部被歼灭，一部向东逃去。五原县新城日伪军，经我军猛烈强攻守军大部被歼灭，残敌一部向东窜逃。在收复五原战役中，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负伤。

### 击毙日本警察总监水川伊夫中将

1940年3月18日奉傅作义将军电令，命我包（包头）固（固阳）安（安北）游击区各纵队，全力配合我军主力部队，进攻五原县；并命我游

击区各队，在乌拉山前后山，五原包头公路，包头、乌镇、五原公路，沿公路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增援日伪军及其溃逃之敌。

我游击区指挥部，由高台梁中心文昌庙推进至包头经乌镇、五原公路至余太庙附近高山下；命令第二纵队（司令武俊峰部）第一、第三两团，推进至后山包、乌、五公路西山沿线，以伏击从后山增援之敌。

第二纵队第二团团长乔占海，秘密潜伏安北县大余太区南乡二驴子湾、武家圪旦、三喇嘛圪旦、二分子等村庄（乔占海官兵多是大余太保安大队，又是大余太南乡各村居户）。当我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一师、五临警备旅，3月20日夜攻入五原县旧城与日军激战之时，日本天皇慰问团特使、警察总监水川伊夫中将（皇族），在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保护下，率日军一个小中队，出五原县旧城东门，逃窜到乌加河（河水至乌梁素海入口）。越过泥泞的乌加河，3月21日晨到达四柜村对岸义坑补隆村宿营。日军到达义坑补隆，村民陈某向驻在二驴子湾村的乔占海团第二连连长张汉三报告说：“3月21日晨五时多，从五原县城里逃来日本军官，骑着三头毛驴到村里来”。连长张汉三一方面派人报告乔团长，另一方面派排长石玉屏（名字记得不清），冒充大余

太区警察局巡官，去义坑补隆催要粮草。日寇军官见后很高兴，问石排长去大余太大路好走不好走，有没有游击队？并要石排长给他们带路。石排长对他们说：我从大余太来催粮草就没有敢走大路，我听说，东山高台梁上的游击队时常下来扰乱老百姓，路不好走，我是沿着乌梁素海芦苇滩的小路来各村催要粮草的。两个日本军官听了石排长的话，打开地图研究后，就要石排长给他们带路，沿着芦苇滩小路走。石排长回答说：我还有两村没有去，告诉他们赶紧向大余太送粮草，我去告诉他们大概要两个小时就能回来。太军们（对日军的称呼）吃了早饭，稍休息休息，为安全计，你们吃了早饭后，最好到前面五里地那里有个大圪旦，又靠芦苇滩不远，在那里等我，我叫那里人带你们去。

石排长回连后向张汉三连长报告，又向乔占海团长报告。乔团长命令张汉三负责歼灭从五原逃来的日寇，并派第三连拨归张连长指挥。3月21日午时半，张连长率部跟随石排长，猛烈向大圪旦后面的日寇攻击，日寇顿时惊慌四散，一部日寇被迫投入乌梁素海淹死，大部日寇向东北逃窜到十分子村，被我张汉三连包围。经激战后，歼敌三十四名，伤十七名，俘虏四名。死亡中有特务机关桑原中佐以下军官四名。有日本警察总

监水川伊夫中将和侍卫官治浅一郎中尉二名。是役获各种枪支四十八支，子弹近万发，照像机一架，战刀两把。将四名战俘、战刀两把送交第八战区副长官司令部。以后受到上级奖励。

# 回族劲旅乌镇阻击战亲历记

白 震

## 一、形势

1939年秋、冬之际，日本侵略军趁德国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集结兵力曾先后陷长沙、进湘北，攻占南宁，血洗昆仑关，并唆使汪精卫走向降敌叛国，在南京袍笏登场，搞傀儡政权的把戏。这时，国内呈现了一派乌云滚滚之势。

## 二、请缨

重庆国民党当局，迫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强大舆论的压力，是年冬发动了所谓“冬季攻势”。为了牵制华北自军不能南调，以减轻对我南战场的压力，遂命绥西驻防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率部向包头市以西安北县和固阳县之间的高台梁出击。傅将军以为攻占区区之高台梁据点无军事价值，遂主动请缨，要求反攻日军华北战略要地包头市，以吸引日军兵力，对配合湘北之战将起到大的作用，1939年12月，傅部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动，出敌不意，远程攻占了包头城，将敌压缩

于城西南一隅，取得了歼灭其兵力3000余人、击毙联队长小林一男、小原一明，俘获伪军团长于振瀛等20余人的重大胜利，同时达到牵制华北日军不能南下的战略目的。

日军侵略者不甘心包头的这一失败，妄图侵占绥西，摧毁傅部河套抗日根据地，于1940年1月28日，由日军驻伪蒙疆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纠集26师团长黑田重德、骑兵集团长小岛吉藏所部及伪蒙军六个师约四五万人，汽车千辆，配以飞机、坦克等三路向绥西分进合击。一路沿包五公路西进；一路由马七渡口西渡黄河迂回包剿。重点是由黑田师团长亲率汽车千辆、坦克百辆共约万余人，由包头经后山乌不浪口西犯五原，其汹汹之势，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焰。

### 三、迎击

具有远见卓识的傅作义将军，包头之役后，对当时局势的发展，早有清醒的估计，一个全民动员的空室清野和秘密藏匿粮食，储备弹药的工作在乌拉山、黄河南的沙漠、芨芨林中展开。决心以避不利、找胜利、节节阻击、分区游击，叫敌人来不得好来，走不得好走，以消耗其兵力，最后一举而歼灭的战略部署，已早在其锦囊之中。

塞上“三九”，正是积雪没胫，战马踟蹰、

缙纡无温，堕指裂肤的酷寒季节，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0度。乌卜浪口、乌镇地区，处在阴山支脉的乌拉山下一片平滩之中，南俯芟芟滩，东襟德令山下，为后山通向五原城的必经之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役，奉傅将军之命守此扼路的是宁夏省绥绥之回族兄弟部队马鸿宾之81军中的劲旅、以马腾蛟为师长的35师第205、206、208三个团及其直属特务连、骑兵连、通讯连等小部队，大约不足3000人。武器装备陈旧，士兵穿着灰色粗布棉衣，主食是地产糜米、豌豆和少量的白面，每日定量为十二两（合375克）。副食也仅是盐水煮黄萝卜、黑豆，可真是衣单被薄，食不饱腹。但大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纪律较好，军民关系不错，抗日情绪极佳。他们是1938年自宁夏调来，归傅部战斗序列，曾长期驻扎此地。在乌镇、乌兰脑包，乌不浪口、四义堂之线，修筑了较好的防御工事，蛇形交通沟，隐形地堡、梅花坑、掩蔽部、掩体、陷井，纵横交织。在指挥部所在地乌镇周围，筑有宽两米、深五市尺之战壕及突出之瞭望哨，简直像一座古老的土城堡。望之，不禁令人赞叹。

#### 四、恶战

依据傅将军绥西战役之布署，101师董其武部埋伏于乌镇以东地区，新31师孙兰峰部布防乌镇



西之万和，长以马腾蛟之35师正面纵深布防于乌不浪口、乌镇地区，以诱敌深入，准备南北夹击、一举歼灭日军于乌镇地区。但事与愿违。1940年2月1日（旧历腊月二十三）凌晨四时许，日军之装甲车、坦克、大批步骑兵数千人集中兵力，并以重炮猛轰35师阵地。天微亮，又以飞机数架俯冲扫射、轰炸。35师阵地前开阔地带之大群牛、羊，敌以为是我散兵群活动，几乎全部炸毙，我阵地官兵虽以机枪交叉火力对空扫射，但均无奏效。只见血肉模糊、尸体横陈的我部战士及部分在战地服务的群众尸体和伤员，被快如穿梭的担架队运出阵地。坚强的战士们仍镇静的注视前方，以猛烈的炮火还击向我阵地继续猛扑的敌人。攻击顿挫的日军竟向我阵地施放催泪性、喷嚏性毒瓦斯。由于我军没有任何防毒面具，只能用尿冲湿毛巾蒙着口鼻，继续战斗。这时，敌人趁机向我阵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简直像战斗演习那样，以散兵群在数辆坦克掩护下拼命向我阵地扑来。已经伤亡惨重的马腾蛟师208团官兵，遂展开一场拼刺刀的战斗，敌我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其增援乌镇的马师206团部分官兵亦受重创。为避不利，找胜利，以备再战，我军立令全部撤出阵地。日军亦不敢冒险深入，没有立即追击。据后来清扫战场者目睹，我牺牲之战

士，有口中咬掉敌人一片耳朵的；有与敌人紧抱、以手掷弹拉火而死亡的；有怒目而视、死不瞑目的；无抵抗能力的伤员有被敌人刺中数刀而死的，真是死亦为鬼雄的中华儿女啊！

我35师在乌不浪口之阻击部队208团马团长所部及增援部队均全部退入乌镇。在四义堂附近之35师206团张海禄部官兵坚守阵地，待敌进至200米有效射程内，枪弹猛发，有的冲出战壕，以手掷弹杀伤敌人，使敌人死尸狼籍，受阻者再。终以敌人炮火炽盛，我阵地被摧，爱国官兵们不约而同地冲出阵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和乌不浪口一样，我战士死伤之惨，真是碧血横飞，浩气四溢，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啊！35师马彦率领骑兵，因其性能不宜阵地战、主要起追击、包围、迂回之作用，因而与31师孙兰峰部在乌不浪口西三女店布防、准备接应乌镇与乌不浪口之守军，虽与敌有接触，其损失较小。

当此乌镇危急时刻，董其武之101师301团王建业团长奉命增援。大部政工人员、在政治主任、共产党员冉志恒率领下转入敌后战斗。笔者和杨承孝政治干事奉命随军增援乌镇北垣，并在阵地上与35师205团一位副团长交谈敌情，尽管四义堂失守，正面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以散兵群向北垣猛攻，但乌镇群众，其中尚有小脚妇女者，

以背、扶、抬诸方式在炮火下络绎不绝地抢运伤员。有的老乡还担着热饭向阵地运送，我眼含热泪紧握着那位副团长的双手说：“看，多么旺盛的士气，中国不会亡，我们一定能胜利！”

在乌不浪口、四义堂等军事要点相继被敌占领后，待我们增援到乌镇北垣迅速布防时，已是暮色苍茫。前沿阵地一时出现恶战前的可怕沉寂。只有远村犬吠，战马长嘶，灯火明灭，天上星稀，一派悲壮的战地夜景。狡猾的敌人，这时只以少数兵力在正面对我军引诱牵制，妄图稳住我军，其主力汽车部队却从乌镇西绕道我军后方，以汽车布成半环形阵地，妄图全歼我军。约夜七时许、正面敌人突以炮火猛轰，步骑兵亦蜂拥攻来。西垣35师从阵地被迫后撤，经王建业团长急以电话与董其武师长联系，奉命要310团立即全部撤出乌镇，经乌镇以南开阔之芨芨草滩向同义隆之线歼击被31师包围之敌，并通报了35师乌镇守军。据悉，他们在向西撤退中与敌遭遇，在激烈的近战中，再次受到严重损失，部分官兵没突出，终于在巷战中血洒乌镇。经查，除增援乌镇的101师董其武部阵亡官兵不计外，仅马腾蛟师三个团就有500余官兵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他们的鲜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抗日史诗。

## 五、突围

奉命向乌镇南部撤退的101师董其武部，至乌镇南不远处，发现了布成半环形之日军汽车部队，已无法通过。在芨芨丛中，董其武师长下马与301团王建业团长、卫景林副团长商定，立即组织了手掷弹阻击手，如异军突起，在一片爆炸声和震耳欲聋的杀声中，敌人汽车队成了火海，我全部官兵突围成功。笔者当年仅21岁，无实战经验，在通讯员赵鹏（现任五原新公中中学教员）携引下，也安全突出。惟少校军医岳嵩山所率之担架队员50来人及部分担架民工全部遇难，共产党员周洪峰率领之101师200余伤员撤至同义隆西北乌加河畔，被敌人发现，全部牺牲，无一生还。

在乌镇突围中，301团炮兵连因杀声突起，驮骡被惊散，待我们冲出敌之包围圈，驮骡仍杳无下落。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没有预料到，数十匹无言战士——骡子，驮着完整无缺的大炮，竟在无人引导下，也冲出敌之包围圈，自动成行地沿着步兵突围的路线归队了。包括董师长在内的官兵们，面对这一奇迹，无不喜极泪流。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芨芨草滩中，董其武师长等以手电光查看地图和前进方向，并派快骑联络到郭景云之302团、王赞臣之303团，命郭景云

团为掩护，全师向通往狼山湾的折桂乡堡转移。马腾蛟之35师由于牺牲严重，经五原西北向狼山湾西撤，后奉命至磴口县境休整。但人们不以胜败论英雄，35师全部官兵以低劣之装备，数量不多之官兵，又守此重要之扼口，抵抗骄横一时之强大日军黑田部队，卒能以血肉之躯杀伤千余敌人，配合友军，滞敌人于乌镇地区，以鲜血写下抗战史中之光荣一页，这是国人永远所不能忘怀的。

## 六、雪耻

二月二日凌晨一时，在日军汽车部队的追击下，董其武师长率部以急行军向西挺进。至天微明到达折桂乡堡，决心以空间换取时间，叫敌人来不得好来。遂在折桂乡依堡与敌人作殊死周旋，以掩护大军转进，并消耗其兵力。该师303团王赞臣部依城作战；302团郭景云部外线袭扰并伺机集中力量歼敌之一部；301团王建业部以一营王大治，连长武跃国、刘玉橹、郝宝瑞部埋伏北城外待命；团部及王遇民等两个营作预备队布防于堡北沙窝内，以成犄角之势。在敌人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及连续施放喷嚏性、催泪性毒瓦斯，反复猛攻下，黑田部队始终未能越我雷池一步，反而我军凭借沙丘、城壕、地碉以扇面形对敌近战反击，给敌以严重杀伤。至夜色浓重，风淅淅，云幕幕，天气一片墨黑，敌人不敢

轻举妄动，只好两阵相持。我滞敌一天一夜，战略目的已达，除以小部队掩护外，立即转移伤员，整顿部队，马衔勒、人无声，按预定序列，撤向狼山湾之石板箱圪旦一带待命。是役比乌镇之战尤烈，团长王赞臣受伤，连长高炳让及排长、士兵等200多人牺牲。傅将军曾以北平发生过一个矮个子拳手与一个大力士拳王比武，最后聪明的矮个子却从大个子腿裆下把拳王顶倒而获得胜利的故事为例，来奖誉折桂乡战斗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这和同时发生在乌加河北岸黑石虎、三女店，我31师孙兰峰部在芨芨草滩中伏击黑田部一个联队，焚毁其汽车，歼灭其一部的胜利，都是乌镇之役后截击、伏击、侧击，狠狠打击侵略者的战史中的姐妹篇，给乌镇之战中把热血献给祖国的战士们也雪了耻，报了仇。

## 七、结束语

194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强大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趁日军入侵绥西河套地区，后方空虚的时候，曾攻占毕克齐、拿下乌兰花、袭扰高台梁地区等战斗，有力牵制了敌人，支持了傅部。誓死不屈的河套军民在傅作义将军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指挥下，自1939年11月首攻包头，中经1940年1月绥西之战，至1940

年3月27日光复五原等三大战役，在塞上荒原连续115天，作战57次，尤其五原之战三失三得，卒能粉碎强敌，克竟全功，已光荣地载入史册。无疑，这是和35师、101师官兵和乌镇人民群众的首战抗敌分不开的。

1940年5月，光复后的乌镇春光明媚。重返旧战场的35师官兵和当地爱国群众怀着沉痛的心情，以民族礼仪在乌不浪口西侧山坡下，安葬了牺牲的战士忠骸，并立了简略的铭碑。他们的坟头上，至今已51次生长过碧绿的青草，开放了血红的山花。文天祥正气歌上说：“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气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他们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抗战功绩，将永远与青山并寿，活在世世代代子孙的心里。

1982年内蒙政协委员参观团刁可成等同志曾亲往凭吊。1987年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参事工作会议后，我们曾应邀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参观访问时，笔者曾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马近老同志作过汇报，巴盟政协也一再关心搜集、整理乌镇的抗日史料。1939年5月我303王赞臣团曾苦战乌不浪口北，中校团政治主任李冰泉等官兵血洒高台梁地区。1942年5月，我303宋海潮团等部队，再次截击了日军汽车部队，经乌兰脑包沙漠直攻乌镇的战斗，我连长一名牺牲，指导员

马凤彰代连长曾冒死还击，官兵同仇敌忾，使日军狼狈而逃，从而再没越我雷池一步。这不平凡的乌镇地区抗战史，受到乌镇人民和有关部门及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关注。长眠在乌拉山下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的抗日忠魂，可以含笑九泉了。

无名氏曾作凭吊乌镇抗战牺牲的烈士诗两首，现录于后，以作本文的结束语。

(一)

铁马萧萧辞银川，  
不歼倭寇哪肯还。  
记取阴山喋血史，  
化作今朝大同天。

(二)

边城冰封战正酣，  
拼得热血补裂天。  
五百壮士正气在，  
赢得春色遍九原。

附：部分烈士名录：

据查五原烈士墓烈士名录中，缺乌镇战役烈士名录。经各方查对，由于1940年1月乌镇之战至1940年3月21日五原大捷后的4月间，才开始搜



寻，经乌镇爱国人民在天寒地冻中就地虚掩的烈士遗体，中经百余日，部分遗体已不好找寻，或有野兽食者，全部名单已无法搜集，只能在乌不浪口经51年风吹雨打的残碣断碑中模糊辨认出长眠地下的148名烈士中的83人，愿借呼和浩特公主府南傅作义将军为长城抗战牺牲的烈士墓碑碑文中的一句名言，以志其不朽。

“他们把他们的热血，已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是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怎样去报答烈士们的血”。

计：

王世勋、×明山、何元龙、王根银、张仲义、曹××、林汗忠、杨文来、汪长和、韩华保、亢天保、贺（贾）天保、杨进文、孟根祥、吕定功、王长命、李应龙、龚中、李保山、赵××、马万彪、杨战和、杨战彪、毛生财、孔学道、孔学青、×林茂、×士林、王××、吴长清、何学如、冯科、×之楚、孔不光，万根树、杨长禄、马享昌、×林福、吴得地（占魁）、乔生盛、白亮棋、高虎成、刘占荣、××昌、胡××、××美、×春延、××仁、袁炳系、杨春天、车佐明、李如虎、张三礼、吕学清、陈良栋、包子荣、王佐才、张百发、张华廷、席正发、××辉、姬天华、马秉仁、王××、赵公勇、常永泰、

岳××、×云红、常茂林、李生祥、李福兴、何  
发财、王和生、白定来、刘××、范居利、张玉  
珍、××候、荣纪候、李成玉、汪明玉、王元  
明、马清。

# 骑七师在河套

丁子敬忆述，丁源盛整理

骑七师于1937年组建，属北方骑兵六军序列的主力。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为加强军事实力用欧洲进口武器装备组建的一支骑兵部队。

1937年春夏之交骑七师调至绥远。抗战开始后，在河套五原城乡驻扎了较长时间。1938年春天，骑七师在河套主动进攻，发动了攻克大余太土城的战役，收复了被日伪军占领的安北设置局一带国土，取得了河套地区抗击日伪军的第一个胜利。笔者曾在骑七师任职，仅就此师的组织、编制、装备及几次政治、军事行动忆述如下。

骑七师师长叫门炳岳，河北省车光县人，保定军校一期学生，后入北平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师直机关号称六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医处、特务连、兽医处、军需处）辖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每团四个骑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炮兵连。全师官兵近四千人，战马四千匹。

骑七师的十九团原来番号为十一旅。此旅是由张力生（张北县人，旧国会议员）的骑二师在三十年代初期，经整编加的番号。骑二师是张力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于察哈尔北部招兵买

马，后又西进绥远沿路收集了一些人，组成二千人的骑兵队伍。当他把队伍调至蚌埠时，南京政府任他为骑二师师长。后缩编改称为中央骑兵十一旅，调至陕西省黄陵县驻扎。1937年春编为骑七师十九团，开到潼关集结。

1934年南京政府调一批学员，在南京市组建了一个骑兵教导队。由几个欧洲军事教官进行军事训练，同时传授军事知识。学员毕业后编为南京骑兵教导团，也开至蚌埠，后于1937年春调至潼关编为骑七师二十团。

河南省归德县驻有冯玉祥的骑十三旅，后冯在河南的军队归了南京指挥，南京国民党军委会便把河南归德的十三旅调至潼关，编为骑七师二十一团。

骑七师在潼关组建后，即北渡黄河到山西省风陵渡上火车行至晋中原平下车，急行军五天后到达了绥东凉城县。

1936年五月，日军向华北大量增兵，还在古北口修筑炮台，平绥铁路沿线驻重兵。这年11月，日帝继“华北特殊化”之后，紧锣密鼓加快其侵华步骤。一面扶植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积极在绥北百灵庙，囤粮食、武器弹药和成立新的日伪部队，一面由特务机关头目指挥汉奸李守信、王英部伪军，由察北、商都县向陶林县运动。当时傅作义在

平地泉指挥着七十三师的两个旅在陶林县的红格尔图连续激战七昼夜，击溃日伪大量部队，捣毁了日寇田中隆吉及匪首王英的指挥部，俘敌三百余人。几天后傅作义部队取得攻克百灵庙的胜利。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随着事件的解决，全国抗日呼声愈来愈高涨。“七·七”事变后，经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多次通电全国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沟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5日结束。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于是全国军民抗击日寇的战斗在长城内外普遍展开。

1937年秋，日伪李守信部盘踞察北商都县城，伺机出动烧杀、抢掠。此时，我骑七师奉命由凉城向陶林县急进。到陶林整休后，又向商都县方向行军。到商都县城外围，配合傅军董其武部，经十几小时激战，击溃日伪军近万人，收复并占领商都县城。

商都战役后，傅作义部奉阎锡山电令，向山西大同开进，准备在大同地区与西犯日军进行会战。因日酋榎垣征四郎的第四师团直奔平型关西

犯，使阎锡山放弃原拟在大同地区进行会战的计划，电令傅作义率所部三十五军，由雁门关撤退。傅作义以自己任绥远省主席返回绥远守土抗日为由，几经交涉阎仍不允准。傅作义只好作罢后，先是配合八路军在平型关与日军作战，后又参加了忻口战役、太原战役等，战毕退至晋西北整训。

1937年秋至1939年春，河套五原一带主要由骑七师防守。37年10月14日和16日归绥、包头相继被日伪军侵占，不久固阳、中滩、西公旗、大余太也成了日伪军西犯的据点。门炳岳指挥当地傀儡，与五原的抗日军民，以乌梁素海隔水相持，五原县东南沿乌加河西岸成为绥西军民抗击日伪军西犯的前沿。五原城则成了绥西抗日前线的政治、军事重镇。

而骑七师近4千多人马，正奉命驻守在乌加河沿岸、西山咀一带及五原县城，作为抗击日伪侵略军的主力。门炳岳师长（兼绥西警备司令），既需维持当地治安，又肩负抵御日伪向河套中部及宁夏一带腹地进犯的使命，还相机计划收复东部失地。

自骑七师驻守五原城乡后，从上到下很注意军纪。师部下令每驻一地不论公、私房屋，早晚必须清扫，有空要帮老乡担水。队伍走前，借东

西要还清，把住过的房子整理好。全师4千多匹马，每天消耗不少草料，（一般每天每匹马准备10斤干草和6斤料）。师部经常指示官兵，用了老乡的草料要按市价付钱，因此，老乡们很愿与骑七师做买卖。当时，五原城乡大多数百姓对骑七师有好感，有的青年竟自备马匹，自报奋勇到师部找主事人，要求加入军队与日本人打仗。

乌加河以东敌占区，日伪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法西斯式的烧杀、抢掠。富庶的中滩一带、前套平原、乌拉特草原的善良勤劳的汉蒙各族农牧民，遭到空前灾难与浩劫，河套东部居民大量逃入五原城乡。日伪军除了烧杀抢掠外，还暗地派特务混杂在难民中，潜入套中各地进行颠覆活动。故骑七师驻防五原初期，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在此情况下，门炳岳首先在五原东部防线一带，加强军纪，整肃治安。同时管理其他地方部队，加强城周围各交通要道、城门、路口、桥梁的岗哨，着重加强了西山咀与乌加河、乌梁素海以西一带的警戒。有时也派出特务连在城乡巡逻，在警戒与巡逻过程中常发生战斗，如夺回卧羊台日伪军的碉堡，消灭抢劫老乡牲畜马匹的小股土匪等。还布署十九团在西山咀驻防，严阵以待，以阻击日伪军由包头向河套进犯。乌加河以东日伪军，探知绥西驻有重兵、防守严密，也不

敢冒然西侵。后来门师长又在师部驻防的五原县城组织了纠察队，日夜巡逻，严防日特、汉奸渗入。更注意防范抗日阵营内的投降变节行为。自包头被日军侵占后，五原县城虽人心不稳，但大多数军民鉴于全国抗日兴起，耳闻目睹了日伪侵略军对同胞的抢掠与残杀。河套地下党为动员人民抗日，做了大量军运、民运、宣传等工作。军民早已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决心与日伪军决一雌雄，誓与河套共存亡。

然而，也有少数利令智昏者，甘心充当日伪军的走狗与奴才。如五原县商会会长唐盘书（又名唐兆铭，日升盐店经理）、康三元（隆兴长镇镇长）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五原县城内纠结了几个人秘密组织维持会。还连夜赶印户口册，以备献给日军做见面礼。还在居民中散布说：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坦克、汽车，武器厉害，不好惹，中国人打不过，越打越灰等。唐、康二人还联名给日伪军写密信，派人混出县城，送交驻在中滩的日伪军，然后再转送至日军的领导机构。送信人通过好几道岗哨，行至西山咀附近的乌加河桥头，被骑七师防守部队的哨兵截获，从毡帽里搜出唐、康亲交日伪首领李根车的原笔信（信上主要意思说：你们要来快点来，别等到门炳岳的军队布置好，人家有了防备，你们就来不了啦！



……。)哨兵截获上述人、信后，立即用汽车送回五原县城经军法处审讯、调查、核对笔迹，证实其投敌罪行。第二天门师长召开五原县各界大小头目紧急会议，宣布唐盘书、康三元投敌，人证、物证俱在。当众以汉奸罪逮捕，并就地处以极刑。当时县城文华斋印刷局经理李景芳，曾答应给康三元印户口本以献日军，得知唐、康处死，竟惊恐成疾，不久亡命，临河县李干臣（大地主）、县保卫团总李三毛旦等人，以临河商会为据点，也积极准备投降日伪军。并联系了一些地主、富商、官宦的代表人物，在临河天主教堂设宴会餐，还请来了当时临河县的白县长。在宴会上原定商谈降日之事，酒过一巡，白县长起身接门师长从五原给他的电话，通知白县长处死汉奸唐、康一事。席未完，人皆做鸟兽散。由此可知，此事在河套响影之大，震慑之强。

自此以后，五原城乡秩序井然，社会上各个投降派的活动基本转入暗中。全县军民抗战决心倍增。无论骑七师的官兵、友军及各界民众，决心与敢于西犯的日伪军拼个你死我活。

骑七师驻扎五原3个多月后，十九团奉命攻取西公旗旁的大余太土城。此城虽说不大却是军事要冲，向西可监视或搜集后套军情；向南可威胁袭击西山咀我骑七师守军；向北可配合日伪

军从乌兰脑包攻入五原城，成为我绥西抗战前沿阵地的一个眼中钉。我骑七师十九团接受任务后，立即向战场开进，于腊月29日晚间上灯时分，到达大余太外围。

大余太土城，在清朝末年设置为五原厅民国初年改为五原县，1929年叫安北设置局，1942年后改为安北县。大余太原政区东西长300里，南北宽近百里。日伪侵占后仅能控制东西近百里、南北五、六十里的地方。

大余太地理环境优越，南靠乌拉山，西临乌梁素海，北部既有良田千顷，又遍布草原。自然资源丰富，农牧业很发达，还是东西往来的枢纽。公元1929年，安北当时一姓郑的负责人，为了防止匪患，大兴土木、修建土城。强征百姓劳力，外侧挖土城壕，内侧挑土筑墙，经十几个月的劳役，于民国十九年筑起了土围子。外围是护城壕，深一丈，宽3丈，城墙高1丈5尺、顶宽6尺，周长6华里。东门至西门约一里半。城自建成后，商人小贩你来我往，手工业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成为包头西政治、经济的中心。抗战初期，城内除有政权机构与学校外，沿街有几家杂货店、京货铺、车马店、饭店、药房、肉铺、理发馆、缸坊、磨坊、木匠铺、铁匠铺等。远近农牧民，逢年过节总进城卖买东西。十几年间由

几千人增长为近万人。

包头、归绥被日伪军侵占后，敌军向固阳、中滩、余太进犯，所到之处实行残杀、抢劫等暴行。和平安宁富饶的后套平原，顿时陷入枪炮声不绝、逃难老乡不断、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无保障的苦难深渊。河套儿女面对日伪军的暴行，心中铭记着强烈的民族仇恨。却有一小撮断了脊梁骨的走狗投靠日寇，认贼作父。如原在固阳的杨德三，纠结了几百人马，向日军摇首乞怜，充当了伪保安团的走狗。日军便派杨德三，于37年秋天侵占了余太城。杨进驻余太土城后，挂起日本旗，穿上日军服。对日本人奴颜卑膝，对老乡狐假虎威，趁火打劫。后日酋又从包头调来一些人马，把东公旗的一部分伪军也划归杨德三指挥，城内总共盘踞日伪军近千人。

为了夺回绥西战略重镇，拔掉河套抗日军民的眼中钉，煞住日伪军嚣张气焰，替死难同胞报仇雪恨，骑七师乘敌军立足未稳，春节除夕戒备疏松、喝酒、吃肉过年之际，部署发起了攻克大余太土城的战役。

参加攻城的部队分布是：骑七师十九团由朱钜林率领，攻占城西南角与西门。游击师的一个团和骑四师一个连，共同攻打城东南一带。游击师的王国祥率两个连，攻打东门一带。游击师的张汉山

率第一连，罗永胜率第四连，攻打城西北部。还有一部分部队在外围设防，以备拦击从固阳、包头、中滩增援的敌军。

我骑七师十九团进入阵地后。除侦察地形、了解分析城内敌军设防、人数、火力等敌情外，迅速分配了各连的攻击任务。我当时指挥十九团第四连从城西南攻打。我给各排布置好任务后，各排即准备攻城木梯（大部分是借城外农村老乡上房用的柳木梯子绑扎而成，或找柳椽钉成长梯）。攻城工具备好后，每位士兵备好弹药（腰插两枚手榴弹，斜背装足2百发骑步枪子弹的子弹袋），轻枪手把轻重机枪擦拭的锃亮、严阵以待。晚九时左右，我连各班把马匹交给牵马兵（每班十二人，三个牵马兵不参加战斗，在打阵地战或攻城时看护或隐蔽战马；每个牵马兵骑一匹、牵三匹，负责管理全班十二匹战马），晚十时投入战斗。战士先用手榴弹将城墙上守敌消灭后，在轻机枪掩护下，各排战士勇猛迅速地架起梯子，强行爬城。敌军也拼死守卫，几经反复，骑七师十九团四连战士，经六个小时的生死搏斗，终于首先攻入城西南角。西门、东门、北门的部队，也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先后攻入。这时东方逐渐露出鱼肚白，我派传令兵沈长标与另外几名战士进城搜索未逃之敌，把日伪县长俘获后交师

部处理，同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太阳从乌拉山顶升起后，我十九团的号兵吹响了集合号，部队整队上马返回驻地休息，准备过春节。

骑七师攻克大余太土城，是后套军民在“七七”事变后与日伪军第一次交战；是自包头被日伪军占领后，光复的绥西第一个城镇；是后套军民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次胜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骑七师攻克大余太后，又过了几个月，于38年5月，从马七渡口过河，路经陕北府谷县过黄河，到达山西保德县休整。于1938年6月6日，与八路军一二〇师协同作战，反攻晋西北被日军占领的偏关县城。经两日激战，于6月7日日军被歼溃败，偏关县收复。

1940年初（阴历腊月），日军指挥部门调集平绥、同蒲两线之敌共三万余人（李守信、王英之伪军），分乘几百辆汽车，配合着几十辆坦克，在敌酋黑田师团长指挥下，以乌拉山为界分三路，向河套进犯。

南路沿包头——五原公路向我前沿阵地霍亥滩、马七渡口、西山咀进攻。当时这一带仍由骑七师的十九团、二十团官兵驻守。门炳岳师长亲临前线指挥。滴水成冰的天气，风狂雪卷，地面大量敌军，天空敌机穿梭轰炸。二月一日（腊月

24) 接火后,日军以数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强大的火力向我骑七师守军各连阵地猛冲,我各连官兵誓死反击,战斗达白热化。此时此刻门炳岳师长告诫官兵:生是阵地,死为坟地,视死如归。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寸土必争,保家卫国,以无畏的精神击退敢于进犯的日军。特别是十九团二连连长吕学启,率全连近二百名战士,浴血苦战、阻击日伪军,打了几十个小时后只剩六名士兵(还都挂彩负伤),仍紧握武器,在战壕中冒着枪林弹雨向敌军射击。经与其他连队的共同战斗,迫使日伪军多次狼狈溃退,体现了中华民族与异族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

迟几年仍有好多70岁左右的老五原人,谈起那场战争时说:“骑七师在西山咀打的那一仗真厉害,始终顶住小日本过不来,后来日伪军只好从乌不浪口子打。”

抗战期间,骑七师几千官兵转战河套及察北、绥东等地,必然还有许多史实值得回忆与记载。因我记忆有限,难免挂一漏万,粗疏简略,希亲历者、知情者添补充实。

# 忆骑七师的几件事

许庆阳

抗日战争时期在绥远战场上和傅作义的部队协同作战，冲锋陷阵，重创敌人，取得辉煌战果的骑兵第七师，在河套人民心目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该师全体官兵都头戴钢盔，当时河套群众皆呼之为“铁帽兵”。

骑七师是骑六军的一个师，是由原骑兵十三旅等数部缩编而成的。刘风岐是原骑兵十三旅旅长，改编后任该师副师长，师长由骑六军军长门炳岳兼任。该师大部战士是原骑兵十三旅驻扎河南时招募的河南、安徽、山东的青壮年和部分学生，因此士兵素质良好。武器装备亦较优良，每个士兵佩带大刀一把，马枪一支，班长以上官佐都发给二十响手枪一支，每班都配备轻机枪和冲锋枪数挺，每连有重机枪班和掷弹筒班，每团都设有小炮连一个。所有马匹亦经过选择。

门炳岳将军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中一位具有高度爱国爱民热忱的将领，他曾在西北军冯玉祥将军部供职，受冯玉祥将军影响很深。他德才兼备，治军严谨，对士兵战斗训练一丝不苟，对部

队纪律要求一贯严格。所属官兵在不断刻苦训练中练就一身杀敌的好本领，该师成为一支战斗力极为坚强的骑兵劲旅。

解放前我在河套地区工作，几乎走遍了所有村庄，听到群众谈及骑七师情况很多，虽时过四十余年，我仍能回忆起关于骑七师驻防河套地区时的几件大事。愿记述于后，以作纪念。

### 一、惩办汉奸，整饬军纪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我绥、包二市，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被阎锡山调回山西守卫太原，河套地区危在旦夕。骑六军军长门炳岳率骑七师进入河套，驻兵五原。在五原县城成立绥西守备司令部，门军长兼任司令。门军长进驻五原后不久，即法办了准备投敌附逆的唐兆铭和康三元，坚定了河套地区人民的抗战信念。

那时由绥、包退入河套的军队十分混乱，军纪废弛，扰害严重，人心不安。门军长立即派出执法队，在五原城乡日夜巡回纠察，遇有违犯军纪、扰害百姓的士兵，均严惩不贷，就地正法。有一天，在五原城中心义和渠桥西侧，马占山部两个士兵用伪蒙疆币强行购买一卖鱼老汉的鲤鱼，卖主不要伪钞，双方在争吵中，被执法队查获，遂将两个不法士兵在离卖鱼老汉不到十步的



地方执行枪决。又有一次执法队在一民家查获一名污辱妇女的士兵，经军法处审讯，该士兵系跟随门军长多年的一名卫士，门军长批示立即正法。但该士兵在服刑时仍赞颂门军长爱兵如子，奖罚严明。他说：军长做得对，是我做出给军长丢脸的事，我真是死有余辜。在不到半月的时间内，被执法队在河套地区辑获骚扰群众祸害地方的散兵游勇有八九十人，均以军法严惩。从此之后，驻河套地区的游杂部队士兵无事不敢离开营房，上市公买公卖，祸害群众、骚扰地方的事方得敛迹。河套地区得以安定，骑七师军纪严明，爱护群众的声誉，传遍了整个河套地区。

## 二、二圪旦湾阻击战

一九四〇年初，绥包日军因受傅作义将军策划的包头战役的奇袭，遭受到惨重损失。张家口日本驻屯军集团司令岗部直三郎气急败坏，决意对傅作义进行报复，叫嚣：“一定要扫平河套，全部消灭傅作义军”。遂由张家口、太原等地集结敌军三万余人，由包头分兵三路向河套入侵。一路沿乌拉山北后台路向西进犯；一路沿乌拉山前套大路向河套扑来；一路出包头由昭君坟渡过黄河，沿黄河南岸西行，再由马七渡口过河向河套进犯。当时骑七师驻防伊盟，接受傅作义

将军命令阻击南线沿黄河西犯河套之敌。这路敌军约五六千人，汽车三百余辆，沿黄河与库布齐沙漠之间向西进犯。我骑七师十九团受命阻击该路敌人，该团命吕学启连，在马七渡口对岸的二圪旦湾与王方营子村中间一条渠背上布置了阻击阵地，并在库布齐沙梁畔布置炮兵一连附小炮三十余门为侧翼阵地，袭敌侧背。战斗开始前数天连降大雪，平地积雪盈尺，沟洼处深达三、四尺，战士们就俯卧在雪地里待敌人到来。门军长对阻击部队发布命令：人在阵地在，人死阵地即坟墓，丢失阵地只身回来者以军法从事。阻击阵地上的士兵身卧冰雪之中，受严寒的折磨，遭狂风的吹打，有些战士虽快要冻僵了，但不敢在阵地上蠕动一下，旨在避免敌人发觉。当来犯之敌转过二圪旦湾进入骑七师伏击圈时，阻击阵地上的战士们猛烈向敌人开火，侧翼炮兵亦同时发炮。敌汽车被击毁数十辆，敌军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惊慌失措。此时，敌人依仗兵力庞大，凶猛地向我骑七师阻击阵地扑来。我阻击战士沉着应战，二十余挺机枪组成火网向敌扫射，敌人一排排倒下。战斗直打了一天，敌人未能超越骑七师阻击阵地一步。敌人恐遭全军覆灭，天黑时趁夜色向包头方向退去。此次阻击战斗中打死打伤敌军三百余人，击毁汽车四十余辆。骑七师阻击部队牺牲亦甚

惨重，正面阵地一个连只留下二十八名战士。

一九四一年冬我由伊盟来河套时，路经河南岸王方营子村。村东首建有骑七师抗日阵亡烈士祠一座，祠堂为土木结构，平房一间，房周筑围墙一道。祠堂内正面建筑三尺高，两丈余长的土台一个，台上零乱地放置着烈士们的牌位。其中有排长二人，战士三十一人。祠堂内无人看管，烈士们的牌位是否齐全已无从查考。祠堂东墙上还嵌有石板一块，上面镌刻着二圪旦湾战斗经过。那时我曾将烈士们的姓名、籍贯及石板上记载的战斗情况抄录在笔记本上。该笔记本因年久及政治变革已散失无存，烈士们的姓名也记不清了。我在石板旁边曾写下：“平原健儿未能马革裹尸还，白骨埋在黄河边，修建简陋祠一座，留下英名代代传”。打油诗一首，以志哀悼。只是从那次路经该地后，再无机会前往那里，不知此烈士祠今日是否尚存？

### 三、百川堡骑兵大演习

一九四一年九月，金风送爽，气候宜人。骑七师休整一年多，战士们精神饱满，马匹体壮膘肥。骑七师在驻地百川堡（现临河新华镇）举行阅兵及马术大演习。全体官兵集合在堡子东大操场上举行阅兵式，各种步伐操练，队形变换，动

作整齐而熟练，给参观的人们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其庄严的军威坚定了河套人民抗日的必胜信念。

阅兵式结束后开始骑技与马术表演，驻地群众约两三千人在场参观。先是骑技表演，项目有：镫里藏身，一马双跨，马背拿顶，马上金鸡独立，五人马上叠罗汉，快马在地上抢救伤员等……这些项目都是战士们在奔驰的马背上进行熟练而惊险的表演，他们的动作是那么纯熟、迅速、敏捷。这些精湛的技艺，是他们经过长时间不断地苦学苦练的成果，他们既要作战又要刻苦训练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接着是各连队马术与战斗演习：整队的骑士催马挥刀向结扎的干草人（假设敌）劈砍；刀起处人头落地；马上实弹射击，对准目标，弹无虚发。乘马超越障碍，骑士们听到冲锋号声，马似弓箭离弦齐向前方奔驰，到五米多宽的战壕边一跃而过，至两米多高的铁丝网前腾身飞越。然后战士们齐下马鞍，迅速给马戴上面罩和护体防火布罩，战士们也戴上面具，翻身上马，向浓烟翻滚、火焰熊熊的火网地带（预先放置的柴草，演习时将其点燃）驰去。人马毫无畏惧，冲过火网地带。枪声、冲杀声汇成一片，消灭了假设敌人，占领了敌人阵地。这一壮观的骑兵战斗演习，博得参观者的一致赞

扬。观众都说：“骑七师的战士似天神，他们的战马像神马”。骑七师的战士们能够奋勇杀敌，克敌制胜，全赖于他们从艰苦中锻炼出的一身真功夫。

## 后 记

骑七师由于历次战役中兵员损失过重，四一年由伊盟桃力民开回河套休整，师长暂由朱钜林代理，门炳岳调升为军政部骑兵总监。从此门炳岳将军离别了同他共同战斗多年，耗费了他多少心血训练出来的这支铁骑。据传说：门炳岳将军调任骑兵总监不久，在重庆开会，一天由住地独自一人去开会时，死于河边，数日后才被部属寻回尸体，当时报载门炳岳将军患高血压中风死亡。门炳岳将军官至将衔，权至管辖全国骑兵，官位不为不高，职权不为不大，外出不乘车，身旁不跟随从。像他这样完全以一个平民百姓自居的将领，在国民党时期的权势社会中实属罕见。门炳岳将军的死使不少人悼念、惋惜并感到蹊跷。

门炳岳将军出生于贫寒家庭，幼年时过惯简朴生活，后来虽官至将衔，仍一直保持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在一生带兵中坚持勤俭治军，亲身深入连队检查财政开支情况，将节省下来的钱

平均分给所属官兵或救济生活困难的官兵家属。门炳岳将军一生廉洁，不置私产，无有积蓄。他去世后，其家属生计艰难，连子女上学读书的费用也无力筹措，多赖旧部捐款资助。门炳岳将军为国家建设强大骑兵献出了一生，光明磊落，热爱祖国，崇高的道德品质，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堪为后人楷模。

# 傅将军在河套组训国民兵

白 震

## 一、傅作义部兵源枯竭

“七·七”抗战军兴，傅作义主力部队陆军第三十五军辖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刘奉斌任七十三师师长，董其武任一〇一师师长，孙兰峰任二一一旅旅长。由于战忻口，守太原，配合平型关，反攻绥南，转战晋西北神池、宁武、朔县等地，官兵伤亡严重，兵力大减。除在河曲承共产党主持之战地动员委员会协助动员新战士三千五百余人，为傅部注入新血液外，总的看仍是军备空虚，兵额不足。何况又经连续一百一十五天的绥西、包头、五原之战，傅部主力军已伤三分之一，元气大丧。虽经奉命在一九四〇年夏，傅部以三十五军为基础又扩编了以孙兰峰为军长的暂编第三军（辖三个师），以董其武为军长的暂编第四军（辖三个师）等主力，并派副师长杨维垣率李上九、石穆然等一批中下级干部往返于西安、平凉地区，派王赞臣副师长率李吉祥、张振基等中下级干部到甘肃、兰州等地区接收了新战士（先后一万余人），暂作了补充，但仍是名难符实，缺

额不少。而绥西，远处边陲，塞上荒漠，人口稀疏，无壮丁可补，且粮食生产关乎这一地区的军粮民食，万万不能因征兵而偏废。为此，傅作义将军是十分焦虑的。

## 二、河套地区人口状况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绥西虽属后套（银川地区为前套），但该地区枕狼山，面黄河，阡陌交通，渠道纵横，沃野千里，水草丰美。东起西山嘴乌梁素海，西接磴口县，乌拉山屏于北，黄河经于南，如能治理有方，真可谓塞上江南，鱼米之乡。抗战开始，由于傅将军奉命督师山西，河套地区兵连祸结，万家墨面，军政大事都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傅部奉命于一九三九年春自晋入套，而日寇紧逼，又接连进行了攻包头，战绥西，克五原近四个月的战斗，直至一九四〇年春五原大捷后才全力投入整顿吏治，经武练军，加强粮食生产，促进人民生息的工作。但由于绥西人口稀少，因而不能因盲目征兵，置军需民食于不顾。兵源问题是当时令人十分踌躇的大事。

绥西是一九四一年开始实行新县制的，意图全面解决好所谓“管、教、养、卫”的四大问题。当时，在五原、临河、安北三县的基础上，在杨家河设米仓县，永安堡设狼山县，塔尔湖设



晏江县，加上伊盟的东胜县，桃力民、达拉特两办事处和组训处，共是七县，两处，一专署（东胜专员公署），伊盟准格尔，达拉特、杭锦、郡王、鄂托克、乌审、扎萨克等七旗不包含在内。据一九四二年统计（伊盟除外），绥西人口是262792人，适龄壮丁男子（16—45岁）是45,931人，户口数是53,478户。一九四五年人口是270,682人，适龄壮丁是42,756人，户口是53,968户。这种地广人稀的状态说明，绥西的粮食生产任务是艰巨的。何况除供应傅部两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一个步兵旅外，还有以李作栋少将、苏开元中将（地下中共党员），刘万春少将等为司令的在敌我接触区的三个游击军，以及属于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战斗序列的伊盟榆林地区的邓宝珊部二十二军，马占山部东北挺进军，门炳岳部骑七师，张励生部热、察、绥边区挺进军，朱巨林部二十六师、马腾蛟部骑五师等相当数量的步骑部队的人食马料。如果没有一个寓兵于农和保护民力、奖励农耕的妥善之策，不仅是民力凋蔽，军需枯竭，而且，一个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也是不堪设想的。

### 三、傅作义将军的“锦囊妙计”

为了达到寓兵于农，奖励农桑，战时又能全民皆兵，支援军事，且可节约人力经费，达到事

半而功倍的目的，经傅作义将军亲自主持的战区长官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战区政治部的高级人员联席会议决定：

1、进行特殊形式的预备兵役（国民兵）训练。

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傅作义、副司令中将张濯清）领导下，以各军部辘重兵团为基础，酌调各师卫生大队（相当于营级）班排以上干部及抽调各有关部队在职之参谋、附员分区组成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输送兵（即国民兵）训练管区部。以米仓、狼山、晏江三县为第一训练管区，管区部设陕坝镇之刘七柜堡子。任命郭希璞为管区上校主任，辖四个营，派车道隆、单杰、贾承祖、杨××为营长。以五原、临河、安北三县为第二训练管区，管区部设五原。任命刘景新为管区部上校主任，辖三个营。以东胜、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组训处为第三训练管区，任命郭跻堂为管区上校主任。辖三个营，派傅作良（傅作义之弟）等人为营长。第一、二管区于一九四二年十月正式成立，第三管区迟至一九四四年春才予组成，管区部设东胜县，受第三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陈国贞指导。

2、管区政治工作的组成和开展。

由于输送兵（国民兵）训练的管区组织既不

是属于正规部队，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众组训，因而战区政治部表示没有这一任务，无法派人前往工作。但为了保证训练任务的胜利完成，又必须配备政工人员从事政治思想教育。遂以傅作义副司令长官兼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决定，在不新增经费，不增添人员的原則下，从各级政府抽调得力人员组成之。遂任命省政府视察员白震为第一训练管区中校政治主任；视察员许庆阳为第二训练管区中校政治主任；省保安司令部课长朱保生为第三管区中校政治主任；并责成省政府人事室从县、乡政府抽调相当于校尉级干部刘玉璋、左金、王俊等五十人经集中作短期训练充实管区政治部和连级政治指导员；并讨论拟定了适合输送兵（国民兵）训练的政治工作大纲，要求在军事上完成从各个分解训练，到班排联系演习任务；在政治上要求巩固抗战必胜的信念，并进行送情报、做侦察、当乡导、送子弹、抬伤兵、送茶饭等敬军、协军、抗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教育。这一工作和战区政治部不发生任何联系，因而没有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的组织和党团活动。傅作义将军对管区政治工作非常重视，每期结业都带着省保安副司令张濯清、保安处长陈光斗、人事室主任王克俊，以及中央社记者张剑梅，奋斗日报社社长崔载之，阎又文等负责人前往

训练营地检阅和讲话，颁发结业证书。造成一种抗日光荣，当兵光荣的社会风气，为日后国民兵征召参军开创了条件。

### 3、训练的期数、时间、待遇

国民兵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春种秋收时不招集。夏锄期间放假返乡中耕。管区军政干部在不招集国民兵训练期间，集中在第一管区学习讨论“干部条件”和“干部戒条”条文及军政业务，总结经验。每年大体训练两期，每期三个月至一百天，每期训练四千人，每年每管区训练八千人左右。由于东胜管区成立较迟，只训练了两期即行结束。

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训练开始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为止，三个管区共训练国民兵十期，人数达三万八千四百多人，成为傅部正规部队可以补充七个师的巨大兵源。

国民兵在训练期间以正式服役军人待遇，除被褥自备外，凡食用粮食、副食补贴、薪金、服装、医药以及枪枝弹药、通讯器材等，基本上与正规军同一待遇。这一庞大的经费开支，在财殚力竭，偏处西北一隅的傅部来说，无疑是力难从心。但形势逼人，事不可息，遂变通地采取：军事部分由各军一级辎重兵团、各师卫生担架大队（相当于营）空额及其它空额内经费上交副长官

部统一开支；政治部经费，由省政府依调往管区的干部、勤杂人员名额核实统一交待副长官部按军队军事工资标准开支。这样，既利于军队兵源之开拓，又利于地方政府组训国民兵人力财力之节省，是开兵源，节财政的良好途径。后受到国民政府兵役部通报，作为全国的国民兵组训经验之一。

#### 四、不光彩的结局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的炮声，宣告了河套几十万蒙汉人民八年苦难的结束。广大蒙汉劳动人民希望出现一个团结、统一、民主、和平的新中国，使能休养生息，过上和平建设的新生活。但意想不到的，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了反人民的所谓“戡乱”战争。同年九月间，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绥远省政府、保安司令部立即发出征召国民兵入伍的命令，除第三管区因地处伊盟，人稀地广，可以暂缓征召继续训练外，其余全部征召参军，并规定凡应征参军者，其家属由当地政府发给糜米三石，市布两丈以作安置。有困难者，由乡、保民兵队员负责反映，省县各级政府酌情解决。实际上，一次征兵如此之多，涉及千家万户，还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只是徒托空言罢了。所以，当时就有：“三石糜子两丈布，老婆

交给保队副”的讽刺民谣。为了保证征兵任务的彻底完成，长官部、省政府立即派出征兵督导员。上校有：高秉仁（后在河北保安司令部工作）、李子英（后任绥远保安司令部政工处长）、胡肇封（后随战区政治主任张彝鼎到善后救济公署工作）。中校有：王怡（后任绥远托县县长）、田发生（后任河北昌平县长）、张绍武（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人事主任）、刘光瑶（后任河北香河县长）、王丽桂（后在长官部工作）、全文斗（后任河北武清县长）、崔少全（后任察哈尔省涇县县长）。视察员有：苗瑞凤（后任河北通县县长）、李一民（后任张家口万全县县长）等十余人分赴各县，配合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一到职的临河县长高映明、三月十六日到职的五原县长张玉璞、安北县长陈质文等及各管区部，以快速、严厉地行动完成了这一新兵被迫入伍的任务。第一训管区的政治主任白震，由于日寇投降时已立即奉调为受降官孙兰峰，特派员陈光斗部的上校外交联络官，随军东进大同，没有参加这一征兵工作。各管区部均奉命编为新兵补训师和各师补训师，一起接受了新兵的入伍工作。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国共两党在重庆所签定的“双十”协定，绥远当局随着内战的枪声，先后把这些补训师投入到反人民的战场上去，连东

胜县三管区郭跻堂部训练的国民兵，也在一九四五年冬增援了包头抗拒人民解放军解放包头的战斗。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以国民兵为主体的部队补训师同样是美梦难成，好景不再，在反人民的内战中，逃脱不了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命运。如郭希璞之三十五军三十一师补训师，于一九四八年春被全歼于察哈尔省蔚县之战；宋海潮师被歼于绥远省凉城之战；郭跻堂师被全歼于张家口乌兰哈达之战；关海山师被歼于河北龙吴县赵川堡之战……历史是无情的，由于师出无名，原为抗日战争胜利而组训的国民兵的荣誉，只能是历史上惊鸣一瞥，而留下来的，却是一页不光彩的记录。

# 傅部东进受降

## 抢架胜利桥的经过

张振耀

### 一、接受架桥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发出哀鸣，宣告无条件投降。喜讯由电话传到五原，已是夜半更深，当即军民相互奔告，欢呼者盈街满巷，接着锣鼓之响惊天动地，鞭炮之声响彻云霄，沸腾盛状可谓空前。

约不到半小时，电话兵来告我说：“副团长（我当时任九十二团副团长）军长（三十五军鲁英麟）叫你去接电话”。我到电话室接通之后，军长即说：“张副团长，你是学工兵的，对架桥有经验，现在派你到西山咀，在退水河上架一座军用木桥，即刻前去执行这个光荣任务。我答应之后即问军长，“材料怎么办”？他说：“你到扒子补隆找安北县府和他们联系，军部已电话告他们赶快准备，至于数量和民工等问题，由你按需要全权处理，争取时间，尽早完成”。

我放下电话，先令随从兵备马和整理什物，



准备即时出发，又叫电话兵接通安北县府电话，当问及架桥材料时，他们说：“河套木材奇缺，临时征集确有困难，据说电话局存有电线杆若干根，已派人去商量征用，但数目多少，尚待去人回来方得了解”。我告他们，至少也得三十五根，如不足定要设法征集其它木料，以免临时不足而误事。我又说，备好料连夜派车直送西山咀找我，估计明天中午我就会赶到那里，再征木工十五人，民工二十人各带工具，并委派一人统领带去，以免他们走散。最后又说：“事关军务，请勿稍误”。他们很负责地答应力争照办不误。这我才松了一口气，否则，等我乘马八、九小时到那后再商量筹划，岂不误了多少时间，延缓了施工的进度。

一切准备就绪，我从电话报告军长：说我即要出发，估计明天中午即可开展架桥工作，有无新的情况和指示？他在电话里告我说：务必想方设法及早完成任务，大部队已在待命行动中。这使我在精神上又增加了压力。

## 二、赶赴现场途中

放下电话，我即跨马扬鞭兼程而行，路经晏安和桥，翌日天亮已赶至槐木圪旦。一夜之行，我坐在马上脑子里尽在思考材料、地形、施工诸事宜，又设想了些可能出现的困难以及排除的几

个方案。总之，这一夜路上我无时无刻不在为完成架桥任务而深思熟虑着。

约八时赶到扒子补隆安北县府，问到材料及民工，他们说：“已按昨夜电话布置，运料车和民工已由李干事带领于天亮前出发了，现在可能已走出二十余里”。我听了极为满意，感谢他们征车派人忙乎了一夜。

我顾不得休息继续赶路，赶至盐海子已见到李干事一行。为了争取时间，我和李干事商定，牛车走得慢，恐误时间，可派人带领民工先走，到后可先做些准备工作。

我连续十多小时紧张安排和一夜的马上思考问题，确实感到精神恍惚人困马乏了。今见料来民工到，自不那样焦急了，便下马对向导说：“你牵上马在绿油油的草滩，叫马饱餐一顿，我和随从俩人就在这洁净的沙滩暂歇片刻，约吃两碗饭的时间定叫醒我们赶路，千万不可迟误”。说完我们就闭目躺在沙滩上睡了。时间虽短暂，但睡得很香甜。向导按时叫醒我们后，顿感身轻气爽精神倍增，上马之后乌拉山西端的卧羊台遥遥在望，民工业已先头走远，悠悠荡荡的牛马车队随后跟来。初步计划均已实现，但关键工作就在后边，仍应慎密周详的安排。以争分夺秒的精神，力求早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 三、初到现场先选架桥点

几年来，敌我对峙的前沿地区，北起盐海子，西至沙布他拉，南接黄河的马七渡口，东近卧羊台这片土地，由于炮火纷飞，早已人烟绝迹。以前的路径已不复存在了，只有茂密的芨芨和连片的芦苇，还有灰色的哈木儿和交织的红柳，长得高达两米，站在马背上也望不到远处，只好向卧羊台方向踏荒穿林前进。

所幸在一九三九年秋，包头战役之前，我随一〇一师在这里住过两三个月，（那时我任师的通信连长），退水河宛转流向尚记忆犹新。但这时我手中没有地图作依据，必须作一番细致的侦察，架桥点才能选得比较恰当，而不致发生失误。

选择架桥点，按一般规程，应先考虑两岸的地形，河流的地质，河底的淤泥，河面的宽窄，河水的流量、流速，两岸的坡度等先决条件。这对于用料、施工和桥的使用寿命、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军用桥虽说是临时性的，以争取时间为主，但也应考虑多一点，不能顾此失彼。

我初到河边，本计划沿西堤向南侦察，但堤土有的太疏松，又有芦苇挡路，不能乘马前进，只好下马交给随从在此等候。自己以手分开芦苇，再用脚踩倒，开条小径穿行而进，还得一面

观察河流诸情况。时值秋季苇未干枯，使我汗流浹背，头晕目眩。我自想“披荆斩棘”之说，确乎不易。这也是我生平难忘之事。

继续南行约三里，见有九十三团某连官兵正在用小木筏向彼岸摆渡。既破又小的木筏只能载四、五人，每次往返又需十多分钟，依这样计算，渡过一个步兵连也得三、四个小时，遇有机炮驮骡，那就更加困难了。所以目前大部队东进，桥梁是最关键的问题，我的任务是迫切的，责任是重大的。

向他们说明我来的任务，即登上木筏，在不影响他们摆渡工作下，我用撑篙探测河底的地质和淤泥状况，又探到主流深度约两米上下，这样的水深，部队“徒涉”是不可能的。西岸坡陡不能攀登，流速约两秒一米，因是乌梁素海之退水，流量不会因气候之变化而变化。得到这些数据，离开他们的船，上岸又向南侦察了一段，经过比较，即决定在他们摆渡之北约三百米处定为架桥点，较为合适。

架桥点初步决定之后，即令随从兵骑马到盐海子方向去接迎运料牛车和民工，以免他们在芨芨丛里东寻西找而误时间。我亦趁此机会坐在河堤上，打开图囊，取出纸笔，先画了一张“河床断面图”，把侦察所得的各项数据，完全附注于

图中。又按河面宽度，初步预定为四孔间各三米，五排桥柱每排四根，如料不足时，两岸就依坡度，用现有红柳、哈木儿压筑两个码头。又计算了柱材、横材、桁材、板材等数目。为节省时间，可分批跟进。现场只我一人，没有可与商量研究者，这也就算是个不成熟的计划吧。

#### 四、施工前的布置

民工先来到，我即分配如下：（1）先令木工一面稍事休息，一面整理各自带来的工具，已备料到即可开工。并推选一位年高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当组长，我把计划和用料之数目尺寸单，以商榷之口气交给他看，使他心中先有个底，一则可以协助我指挥加工，二则“十匠九巧”也可能有架桥的经验和知识，对我会有更大的帮助。

（2）令带铁锹的民工，也选组长一人，负责开西岸之甬道。因西岸之地势高于预铺桥面两米，长宽我已“经始”好了（经始为军事术语的划线）坡度已和组长讲明，土方工作问题不大。

（3）令带镰刀和镢头的人亦选组长一人，带领去东岸远处，砍伐红柳和哈木儿，以备压筑两岸码头，并告以数量越多越好，采好即运到现场以备。

民工分配完毕，运料的牛车也珊珊而来。我令木工组长赶快召人卸料，经我一数只有二十六根

电线杆，显然不够。缺料严重，怎么办？就近征吧，周围三、四十里无人家，安北和这不通电话，在安北征到与否还是个疑问。天高地远何处去求援，贻误战机，罪过就在眼前，我急得满头大汗无济于事。我想，要等料齐全再动手干，是绝对不行的，当即令木工组长选十二根柱材，削好尖，开始先“植桩”。倘若迟延，拖到夜间施工、又无照明设备，那困难就更大了。

### 五、开始植桩

植桩在架桥工程中，是个最重要的部分。不但需要的时间长，而且质量要求也比较精细。第一排四根桩的位置，我已向木工组长说明，即令他们先架个简单的操作台。有人问：“没有榔头铁锤，用啥往下砸”？的确，旷郊野外要啥没啥，这可怎么办？于是我心急如火，悔之昨夜在电话里和安北县人员谈工料时，遗忘工具问题。大家亦都默默无言地望着我。我反复想，古人云“智勇多困于所溺”，又说：“思穷则通”。意思是在极端危急困难之时，多思考者，必有奇谋良策。片刻之后，我向组长说：“我倒有个办法不仿试试，即是把运料牛车的车轮卸下两个，各有四、五十斤重，用三、四个小伙子高高举起重重放下，砸在桩头，岂不近似打夯之力。不会的话，可先在岸边试举几下，不难立刻学会。”

组长同意试一试，即派几个木工去找李干事说：

“副团长叫我们来卸两个车轱辘以代夯打桩之用”。随后便在车队里找了两个质坚而硬的推来，依我所言试砸，果然效果不差。植桩刚开始，我便向组长提出了“桩一定要垂直，千万不可有丝毫偏歪倾斜”的严格要求。俗话说：“立木虽能撑千斤，但要不偏不斜重聚根。”

这里的工作安排好之后，我便去找李干事商讨解决架桥板材的问题。我们商量了许多办法，不是行不通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就地取材以解燃眉之急的办法。即是就地采取红柳和芨芨，扎捆成直径二十五公分，长两米的园柱形的捆，力求坚实，依次压在桥桁上，以代桥板，上边再铺上二十公分的土。这样车辆通过虽有困难，但步兵通过尚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李干事问到“芦苇行不行”？我说：“不行，因芦苇质脆，受力就碎，稍干还会压成碎末，不如芨芨有韧性。哈木儿虽有韧性，但长的多是团团状、很不易捆成柱状”。李干事年青但很热心负责，听完我的意见便立即带领人去干了。

## 六、支援的工兵连来了

在各组按计划紧张进行工作时，三十一师工兵连陈连长率队赶来。他一见我便说：“报告副团

长，我奉命赶来协助你执行架桥任务”。我即和他握手表示欢迎，当问他带来什么工具和材料时，他说材料没有，只带些锹、镐、板斧、手锯和绳索，还有二十磅大锤等。我说，这大锤正是植桩急需用的，即将河床草图交他看过，又将全面施工进展情况简略地交代一番。当即分配他们的工作如下：（1）选派植桩一组，先打第三排桩，再协同民工打第二排未完之桩，所有民工打桩木工，统一由陈连长指挥。（2）派一部分人去找李干事共同扎捆草柱。（3）派一排长，指挥民工压筑两岸码头。

因为事前不知他们前来支援，所以他们之来，使我喜出望外。指挥部队施工当然比民工好多了，虽然他们没带材料也没经过架桥技术的训练。但生力军的增加，使我省力而又放心，而且也有更多的时间去指导各组的工作了。

### 七、开始铺设桥面

工兵连刚开始植第三排桩时，我就腾出手来，调民工压筑东西两码头，并令木工组架柱上之横材，接着铺桁材，以准备铺设预制代用板材之红柳、芡芨扎捆的草柱。

这时长官部派赴包头的先遣总指挥孙兰峰将军和十几个高级军政大员，已乘一辆大卡车由陕坝赶到。孙将军下车后问：“谁在这指挥架



桥”？我即上前先说明架桥的进展情况又说明了材料问题。孙问：“什么时候我们的车能通过”？我稍加思索便肯定地说：“一个多钟头”。孙说：“那就快干吧，我们就等着吧”。说完他和车上的人都休息去了。大家都见到这一紧急情景，感到比以前更紧张了。

开始铺桥面之前，我已把捆好的代用品检查了一次，由于感到不理想而起疑。但李干事和那些赶车人都已费尽了气力，他们既无绳子又无工具，自想“不能强人之所不能”，就先这样试试看吧。

一开头大家依照原来设想铺设，又勒、又踩又压，干劲十足。当铺了约一公尺远，我上去踩了下，只觉得虚呼呼，有的地方好象脚在两捆之间就可插下去。我略加思索后，即举手喊了声“暂停”。这时大家正在拼命地干，一声暂停使他们不知所措。我呆呆地想着，自言自语地说：“这样松松的、软软的，是肯定负荷不起汽车的，万一把这辆奉命急于东进的汽车掉在河里，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我立时找人把李干事叫来，对他说：“看来代用品解决不了问题”。李干事望着那辆汽车也着急地说“怕是不行”。我紧接着说：目前只有一个办法，你考虑行不行？就是把现有的送料牛

车，去掉上边两侧之栏杆和下边的轴耳子，一辆一辆地横排桥桁材上，以此代一层桥板，上边再铺草捆，载重量便可增加许多。李干事听后，以赞同的口气说：“行，行。”我说：“既如此那你快去和牛倌们商量一下，并解释征用的迫切，也要说明政府负责依价赔偿”。他回去不一阵子，一辆一辆的车架盘子搬来河岸。

桥西岸上之甬道，早已挖好，这时运料极为方便。待再次开始铺设桥面时，工兵连所植的第三排桩也亦完成。人力都集中在这里，军民合作若奔若狂，紧张而有秩序地配合着干起来，一孔一孔的向东伸延，全部完成计时可待。

最后桥面上还铺了二十公分的土。为防桥上铺土两边流散，又用芨芨束成捆，以作“边材”之用。桥面土层铺好，因无木夯难以捣固，大家只好用现有的铁锹、铁镐、推、推、耙，用双脚踩踏。

这时我在岸上留心观察，桥上挤满百余人，虽然摆动、震荡，而桥身丝毫没摇摆之现象，方使我心中有了底。此时已日近西山。自料到至完工，用了三个小时。一般说来，倘若久经训练的工兵，利用预制构件，这样的桥一个多小时足够了。

#### 八、大军跨过胜利桥

我立即报告孙总指挥说：“桥已架好，可以

通过了”。为了减轻车的重量，请告大家先把车上所有行李什物搬过桥去等候”。人人依言而行。

这时让桥上的人也离桥上岸，只我一人站在桥上，聚精会神地举手示意，叫车缓缓地向我开来。我提心吊胆地高举双手，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引车上桥，两眼紧盯车轮下的桥面。待车的后轮上了东岸的码头，围观的人们拍手欢呼时，我似如梦初醒，又似千斤重担由肩落地，顿时感到轻松无比。

我和陈连长一同送孙总指挥上车，他当即表扬了我们雷厉风行、勇于完成任务的作风和干劲。车开之后，我俩又仔细检查了桥柱、桥面，均未发现有变异现象。

我刚上西岸，即有军部某参谋来问部队过桥的事宜。我简单地把部队过桥应注意的事项，请他笔记下来，传告部队：（1）步兵散步通过；（2）骑兵下马单行通行；（3）机炮驮骡拉大距离；（4）队外人员不得在桥上超越通过；（5）各部队应派军官在桥头指挥监督；（6）部队行进序列应事先排定，不得拥挤在桥头附近妨碍友军。并将此注意事项，依次递传到后续部队。

后得知在这里等候的有驻五原的三十一师，

驻南牛犊的三十二师，驻梅令庙的一〇一师，还有后续来的骑兵师，差不多河套东部地区的部队都先后开来。大军如潮似涌，浩浩荡荡，战士们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跨桥东进。我亲眼目睹这一壮观景象，心中自觉有安慰、有贡献而自愉。

### 九、处理工程收尾工作

任务完成之后，我即召集工兵全连官兵、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并说大家来的及时，干的非常出色、使工程能以提前完成，功劳是大的。我又说：“工兵技术是复杂的、责任是重大的，在部队中担负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爆破、布雷、扫雷、野战筑城、坑道作业等任务。可惜咱们这连，设置较晚，器材又缺，得不到充分训练。这次来参加架桥，也可作为实习训练之一课，想大家都能有所收获，下次再有这样的任务，也不会感到陌生吧”。最后令陈连长，检点带来的工具，率队“归建”去了。

接着令李干事召集全部民工，我说：“大家自昨夜忙到现在，不但饭没吃，就连一口水也没喝，还争先恐后的干劲十足，感谢大家辛苦，现已完工，可以回去休息了。所征用车盘子，已开证件，交李干事带回，找县府及早赔偿”。

最后告李干事，先留两人在此看桥，回去叫县组织专人，看守此桥，因此桥为河套通往包头

之咽喉，近期人往车来，必定频繁，发生事故影响极大。李答回去照办，即率民工离去。

时已夜幕降临多时，我回部队途中，在马上疲倦难支，但回顾这次任务的始末，仍是思绪万千，惧喜交加，也为及时圆满地完成所负重任而庆幸。这也是我在抗日战争中永远难忘的一件事。

# 傅将军在河套创办银行

## 制鞋 制糖厂的回忆

一九三九年，傅作义将军率部进驻河套之际，正值国难当前，岁月难熬，军需民用物资日趋奇缺，在此境况下，傅将军发动军民共赴艰难，利用农贷兴修水利，恢复发展生产，并创办了一些小型工厂以利战时需要。

### 一、创办农民银行

河套农民银行的设立

包头、绥西、五原战役后，为帮助农牧民恢复生产，瓦解敌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争取群众内向，巩固战区社会基础，傅作义将军通过朱绍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向中国农民银行兰州分行提出，在绥西战区迅速办理农贷业务的要求。经兰州农行研究后，责成宁夏农行（管辖行）负责，宁夏农行则派农贷员杨钟哲前往战区调查，并写调查报告上报农行。在此期间，鉴于国家银行资金短缺，傅先生遂责成绥远银行先筹拨一笔资金，配合战区动委会，对农牧民发放贷款，以解决春耕生产和生活的急需。

一九四一年秋，陈德起和宁夏农行农贷股主任乘木船由宁夏抵达绥西，受到了傅先生的热情接待，并详细介绍了战区的农村实况，嘱我到农村去作一次调查，并安排了马匹和向导。我深入到临河、五原、安北等县乡镇，亲眼目睹了战后农村的萧条景象，军民以菜蔬、豌豆代粮，生活十分艰苦。但整个战区军民同仇敌忾，艰苦与共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当即代表中国农行与绥远省政府签订了战区农贷草约。对绥远省银行过去发放的农贷全部拨还，解除了地方银行资金不足的困难。同时在陕坝设立农贷通讯机构，增加外勤人员，就地办理贷款业务。一九四三年春，我又赴陕坝，进行就地核放，简化贷款手续。

由于河套农贷业务的不断扩大，傅先生以绥远省主席的名义，向农民银行总行建议，在陕坝设立正式机构，以垂应河套农业、水利、合作等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九四四年春，总行决定批准在陕坝设行，并派我为主任，开展各项农贷业务。

回顾河套战区，农贷业务的迅速发展，贷款种类和数额的逐年增加，为当时各战区之冠。这与傅先生把农贷工作作为对敌斗争战略措施的一部分是分不开的。

#### ·办理各种农贷

1、农牧民生产生活贷款。由绥远省合作事

业管理处负责、按县乡镇组织信用、供销、手工业、生产等合作社，并试办合作农场。每县有合作指导室，配备指导员二至三人。根据开展业务和社员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办理贷款。生活贷款主要是为解决农牧民穿衣困难，由银行负责贷款，由省贸易公司统一采购布匹，然后折实贷放给农牧民。这样既解决了困难，又方便了群众。

2、农业生产改进贷款。此项贷款由省农林处经办。河套地区过去不种水稻、甜菜等作物，经农林处试验引种成功后，把培育出的种子提供给农民种植。银行贷款，还从甘肃、宁夏一带统一采购优良种子、经农林处贷给农民种植，并负责对农民的技术指导，大大促进了河套的农业生产，有力支援了抗日前线。

3、农田水利建设贷款。傅先生率部进驻河套后，采取了治军与治水并重的措施。省政府成立了水利局，选聘王叔彬（唐山工学院毕业，熟悉水利工程、事业心强）为局长，并招聘组织水利技术人员，对河套的主要渠道进行测量，合理规划，全面治理。冬季施工时，动员当地驻军帮助群众兴修水利。一九四三年在五原与安北县之间兴修了复兴渠，长约60余华里，首先动员军队分批分期完成土方工程，既作为防范日军进攻的屏障，又为两县开发百万亩良田提供了水利条



件。这条大渠土方工程由军民共同负担；引水、渡槽、桥梁等工程由农贷解决，分五年偿还。

各渠道的岁修和改进工程（裁湾取直、泄洪工程等）的贷款，是由银行农贷员与水利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商量，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办理短期或中期贷款，建成了一批水利工程。

河套战区办理的农贷，为河套迅速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保证了军政人员的供给，保障了河套人民的生活，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 二、世成西的军鞋厂

### （一）军鞋厂的创建

绥西地处西北边陲，交通不便，水路只有一些木船，陆路汽车很少，运输只能靠骆驼、牛马拉的二柄车，负重小、行走缓慢。从大后方兰州、西安等地拉运军用物资十分不便。为解决军队急需，傅先生报请国民党中央，利用军队每年换下的破旧军装，就地建厂制做军鞋，以保证按时供应军需，因而得到中央政府的赞许。

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结束后，开始在临河永嘉（世成西）乡屯垦九连旧营盘（现白脑包乡联丰五社），筹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军鞋厂。厂房利用屯垦队旧营房因陋就简加以修缮而成。原有土木结构的房六幢，计六十间。经改造建成

办公室五间，军官宿舍五间，各种库房二十间，碾磨房各一座，合作社一个，制鞋车间一千二百五十平方米，均系土木结构。

## （二）机构设置和人员安排

工厂设正副主任各一名，主任由张彦科中校担任，副主任由王志昌少校担任。总务科设科长一人，由王嗣轩少校担任。下设会计、事务、文书、医务、保卫五个股，各设股长一人，协助科长办理日常工作。会计股长由赵学志担任，股员有王少录等四人，主管预算、结算、经费拨发报销等工作；事务股长由李芝担任，股员有张秀山、张登科等四人，总揽全厂后勤，包括干部、职工生活福利等；文书股由董金奎担任，股员有雷长寿等三人，主管文件往来，撰写收发等工作；医务室主任由张家成少校担任，配备医师三人，负责全厂干部职工的疾病医疗，并定期检查身体，预防各种传染病的发生；保卫股由段毛仁负责，配备五名士兵，负责全厂治安，昼夜轮流值班。生产科设科长一人，由郭沛霖少校担任，下设生产、保管、毛皮纺织三个股。各股设上尉股长一至三人，协助生产科长办理生产安排，物资调拨、技术革新、质量检查等日常工作。生产股长由牛广汉担任，股员有郑乃民、刘银浩等四人；生产股下设裁案组，缝纫组，绗鞋组，翻上

组、制鞋组、打绳组。各组设组长一人，由工人推选或由干部指定。厂合作社供应职工日常生活用品，对外不开放，另外还设理发组、饲养组。

工人来源：主要采取招雇自愿原则，工人绝大多数来自榆林、五原、临河、陕坝等城镇的皮匠，另一部分是走村串户的鞋匠。勤杂工大部分是当地逃避兵役的农民，他们到军鞋厂做工后，乡公所便不再向家里要兵。建厂初期每个勤杂工月工资八至九元法币。

### （三）生产情况

军鞋厂的生产主要由生产股负责。该股有工人三百五十名，小型缝纫机十台，大型缝纫机五台。小型机器只能扎鞋口，大型机器专门制翻毛皮鞋。其它制鞋工序全用手工操作。每日生产布鞋一千七百双，全年生产布鞋四十九万两千多双。翻毛皮鞋日生产四十至五十双，全年生产一万八千多双，只供给校级军官穿。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傅先生率部东进，军鞋厂于同年底迁往归绥，家在绥西的工人大部回家从事农业，其余工人随厂去归绥。

## 三、世成西制糖厂

### （一）创建制糖厂

1941年，傅作义将军任命农林专员张立范为

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把试种甜菜列为重要任务之一，从外地引进籽种试种。经过三年试种获得成功，为制糖业提供了原料。经傅先生批准，于1944年在份子地农场划地五百余亩，大量种植甜菜，亩产达800斤左右，总产约40万斤。这为今后制糖业提供了大量原料。于是在傅先生积极倡导支持下，由绥远省政府报请国民政府工业部，指派二名工程师来厂指导。同年8月开始协助筹建甜菜实验制糖厂。

1944年8月，甜菜实验制糖筹备处研究决定，并经傅先生批准，借用绥远省日用品制造厂东大院为厂房（即现在陕坝东北大桥南的三角城址）共32间。正房八间作为制糖车间，内有12口两米直径的大锅熬糖；西厢房作为洗菜切片、溶解、石灰窑等车间；东厢房8间作为库房和总务会计办公室；还有后院大小厨房2间，工人宿舍6间，二位工程师的办公室1间，家属小院1所，传达室1间。

维修厂房工程，承包给工程师高二虎，合同约定为1944年10月底竣工交付使用，维修工料费8000元（按：1945年4月才交工使用）。

## （二）人员构成情况

该厂为绥远省直属工业组织，设厂长一名，由农业改进所所长张立范兼任；设副厂长一名，

由绥远省日用品制造厂少校总务股长张联珍担任，负责全厂行政领导工作；由中央工业部派来的傅国刚、侯敬民、罗煦逸负责全厂的技术领导工作。下设总务组长、由副厂长张联珍兼任，事务组由周汝智担任，事务助理由实习生马宏禄兼任；会计室主任由省财政厅直接派来冯毓川担任，共计职员8人。第一批招收工人86人（沦陷区难民中招收）。其中木工1人，负责木器检修，厨师2人，工勤2人，传达室1人，碾磨房加工工人2名，饲养工2人，夜信1人。有骡马车4辆，设车夫8人（跟车装卸4人）；另有水上运输工26人，负责由份子地农场用骡马车拉运甜菜到缠金渠（即永济渠）下稍，用木筏经水上运到陕五公路的崇发公大桥，再用骡马车拉运到陕坝，须经3倒手。制糖车间工人共51人。

### （三）建厂投资和开支情况

建厂投资概况：绥远省政府按试验期预算投资约10万元，由省财政厅拨款，并派专人掌握财政，包括维修费、设备费、职工工资及伙食费、交通运输费、办公费、福利费等。一切开支均按省级标准待遇，实报实销。职工口粮，由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直接按职工比例拨发，每月人均小麦24斤，糜子50斤。

工资开支情况：工程师2人每月各一百

元，正副厂长各80元，会计主任80元，事务员60元，实习生补贴30元，共630元。工人86人，每月人均均为50元。实行多劳多得制，评级核发。工人最高不得超过60元，最低不得低于40元。职工每月工资预算4830元。

伙食费开支：职工主副食均由厂内开支，一律不交伙食费。主食每人每月开支8元6角，副食每人每月开支10元，全厂职工共开支1748.4元。

#### （四）投产出糖概况

糖厂所需的先进机器设备无从购运，生产车间只有一台人工操作的甜菜切片机。糖分溶解与石灰窑车间的机械，也只好暂由工程师绘图设计，然后用木料制成转盘式的转动机，代替机器溶解糖分，安装成园形的16个头号大缸，内装摄氏70°——90°的水，经轮转上下洗滤后，交大锅车间熬制。大炉车间，安装直径两米的几口大锅，15米高大烟筒，烧煤熬制，按比例加入骨粉，泡沫用葫油烧开杀沫，并防止沸溢。经过一星期出锅，成为黑糖糊糊。因没有离心机设备，只好用土法阴凉成块状的成品，出糖率仅有30%左右。在当时红白糖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除军用外，尚有少量销售。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糖厂才购进

了部分机器设备，扩大了生产。同年8月底，工厂搬迁到五原郝头儿圪堵，工厂暂由五原苗圃主任邬堃负责。1949年绥远省和平起义，世成西制糖厂由人民政府接管。

（根据陈德起、周汝智、张连武资料整理）

# 傅将军在河套惩治

## 烟赌脏的部分见闻

张振耀 殷华生

烟、赌、脏（脏指贪污受贿）是我国历史多年遗留下来的严重恶习，是英帝国侵略者给我民族种下的灾难祸根，也是关系着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兴衰的大问题。因此傅作义将军，在他治军多年和在绥远主政期间，为根除积弊解决人民痛苦，下了很大决心，并采取了有力措施，解决烟、赌、脏的问题。先是宣传教育，晓以利害，继则绳之以严刑重法。虽然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使社会风尚有所改变，但因地区环境与时事的变迁，未能最后彻底成功，终成憾事。今就我们追忆，概述如下，供大家参考。

### 一、厉行禁烟

所说的“烟”，是大烟（鸦片）的简称，一般人最初不知其毒害之大，偶用麻醉止痛，等上了瘾，就难以摆脱所造成之痛苦。使之身体被摧残，意志亦颓废，万事潦倒，日夜唯求吞云吐雾而已。有钱的倾家荡产，贫穷的沿街乞讨，男盗



女娼。这样的人自顾生命尚不及，还谈得上什么平时的工作任务，战时的奋勇杀敌。

傅长官一闻“有嗜好”三个字的人，就深恶痛绝。在选拔和培养干部时，对这种人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敬而远之。这是他选人的先决标准。这样严格选用公职人员，是应该的积极的，但从全局来看还是消极的。如何能使全民根绝烟毒，这才是真正积极的。怎奈有决心的傅将军因环境所限，是力莫能及的。

一九三五年，傅主席在全绥境内推行了《五年禁烟规划》，其步骤是，第一年禁种植，第二年禁贩卖，第三年禁吸食，第四、五年是收尾根绝。此规划刚实行两年，“七七”事变后，傅便率部队入晋作战，绥远省除河套、伊盟外，大部沦陷于日伪，又开始种烟。河套虽未复种，但仍仍有吸毒者。这时宁夏和绥中等地之烟，大量偷运来河套，使河套内之禁烟工作大受影响，于是只能对贩运烟毒者施以严刑重法的政策。

其办法是，在套内关卡等处设立检查站，对过往行人车辆，都进行开包搜身，详细检查。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偷运者方法变换又奇，因而仍难根绝。首先是宁夏西来商人大批量运进，查获戮批，处决数人；其次是进入敌区之“游击”人员，如游三区队长×××，游

二区连长唐××（安北人），某部副营长王书臣等，均因偷贩烟土，依法处以极刑。再次是一些社会无业流杂瘾君子，因偷运亦依法被处决多人。这些人以身试法被处决是罪有应得，也使禁烟工作相应地收到了很大成效。

一九四一年春，河套局势基本稳定，禁烟工作继续进行。当时，河西伊盟靠近敌占地区，有少数农民认为有利可图，乘机种植大烟。省府得报后，傅主席即派宁志远（山西稷山人）为特派铲苗专员，前往铲除。宁到达之后，本应遵令彻底铲除免留后患，而部分农民为谋利，则要求说：

“春播时节已过，倘烟苗一铲，苜蓿播种不及，会影响一年生计……”，宁则未得完成使命而返（是否有受贿之事不详）。宁回后慌报烟苗已全部铲净。后被暗中化装乞丐追随监视人翟维华（山西晋城人）回来据实呈报，经查后宁亦供认不讳，傅即下令处以极刑。由此可知傅主席的求实和禁烟的决心。傅二次派人前丢将烟苗铲净。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陕坝军政各机关，在中山堂隆重召开了一个“纪念虎门海滩焚烟大会。”大会宣讲了鸦片烟的来源和危害以及当今禁烟的必要性，号召全民团结起来积极参加。会后，人们列队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行，最后到大

转盘，将多次查获的大烟数百包，约百余斤，当众焚烧。游行和围观的人们高呼口号，表示决心。这次大会对禁烟起了极大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解放后，禁烟戒毒工作在全国雷厉进行，不几年就全部彻底肃清，既雪了我民族的奇耻大辱，又解除了人民受毒害之苦，真是普天同庆的大事。傅作义将军对此曾感慨地对人们说：“咱们下了决心，费了气力而没能办到的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办成了，我的多年宿愿已达，使我热诚佩服，衷心感谢，终生难忘。”

## 二、关于禁赌

赌博也是社会上伤风败俗，腐化堕落，危害极大的恶习。因此傅作义将军把它列为严禁的条律，以求根绝其害。他经常告诫人们说：“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把全部精力投入本职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一番事业，这才是正确的方向。但有的人成天醉生梦死的沉迷在赌场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消耗了自己的精力，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有负国家重托，愧拿国家薪俸，天良何忍？这真是极大的罪恶，我们应该严禁重办。”

如一次抓获的赌徒中，有前七十一师王靖国部的旅长田绣章和伊盟达拉特前旗康王等人，本应依法严办，奈因情况特殊，有关民族团结，

虽没枪毙，但亦被处长长期关押，而没有人敢于出面为他们求情。这正说明了傅作义将军执法如山高，铁面无私情。

曾记得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为整顿河套地区纪律，傅长官派遣了两个“纪律巡查团”。一个由骑兵团长刘春方率领为北路，沿永安堡、百川堡、同义隆、乌镇地区；一个由政治部主任张彝鼎率领为南路，经临河、鄂家地、五原到安北地区。授权任务是查有烟、赌、脏（脏指贪污受贿）和违法乱纪者，发现就抓，经核实就地正法，决不宽容。

在纪律巡查团未出发前，先作声势浩大的宣传，差不多全河套内家喻户晓，妇幼皆知。一时间，套内军政人员，各界人等，素有烟、赌、脏等涉嫌之辈，人人担心个个谨慎，社会歪风邪气顿为消失或减少，正气昂扬，人心大振。其实两个团回来，并没有杀一个人，只是际此增强了遵纪守法的观念，提高了思想觉悟，打击了歪风邪气，促进了工作和生产的提高。

### 三、严惩贪脏

俗话说：“公正的自然清廉，贪脏的必然枉法。”国家设立公务人员，本为执行国家法令，为民谋利除害。这种贪脏枉法的人，已经丧失根本立场，只知为己谋财，哪还顾及国家和人民。

傅长官经常告诫人们说，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应该时刻牢记“遵纪守法，从政清廉。”这是明智人高瞻远瞩，走向正确、成功、光明大道的要诀。而有少数糊涂人，一旦有权就以权谋私，有势就仗势勒索。他们眼光短浅见利忘义，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不自量力互相攀比，狐朋狗友终日盈门，甚至打肿脸充胖子。最后，必然堕入法网，遗害终生。两条道路很明显，结果各异，希望大家在处理事务之前，务必反复思考，明察利于害，分清是与非，识别荣与辱，深思后果方可行事。唯此才不会失误，起码不会上当受骗，为奸人所利用、所摆布。

一般来说，傅将军执法是很严的，尤其对贪脏枉法者。他曾说，古人有言：“刑以制刑、辟以制辟”，又说：“礼施于未然之前，法行于已然之后”。立法之目的要先示法以明，叫人们明白法，遵守法，少犯法或不犯法，绝不是为杀人示威。平时不宣传、不教育，放纵不管，到时乱杀乱砍，形同大路设陷阱，只能造成结怨积仇，还有谁能肯与你同生死共患难，去完成救国拯民的大业呢？

记得在抗战艰苦期间，他诚恳地对大家说，困难当头大敌当前，抱有爱国家为民族思想，在惊涛骇浪中，愿和我们同舟共济的人，我们热忱欢

迎。倘若抱着来我们这里想发财的人，我们不能容纳，因为他潜藏阴谋，不是真心实意的，最大限度这些人也是我们胜利船上的蠢贼。对这些人一则要防止，二则要教育，三则要挽救。

为整治法纪，他也惩处了一些无法挽救的人。记得五原西关第一区区长王清（山西河曲人）因贪污公款；某团军需张某（山西临汾人）因贪污军粮三千斤；运输处押运员曹清林（河北南宫人）因利用军用物资船贩运商品牟利；长官部副官刘××在奉命监筑五原烈士公墓中贪污公款；副长官部副官刘云（河北献县人）奉派赴乌梁素海捕鱼而贪污等案件，都被处以极刑。对此，傅长官并不认为是得意之举，每遇此类之事发生，他何尝不痛心惋惜。奈因他们知法犯法，国法难容，无可奈何而为之。据说事后还对死者遗属予以适当照顾，使死者无憾而瞑目，生者感激而无怨。

### 小 结

我们追随傅将军多年，深感他待人以诚，亲如父兄，教人以义，明辨是非，导人以廉，生活俭朴，情深而感众，法严而不骇，使我们永铭肺腑，终生难忘。

# 忆傅将军的几件事

## 一、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傅作义先生身材魁梧，剑眉黑目，鼻直口方，声音宏亮，他生活朴素，不吸烟，不喝酒，茶亦不常用。一九二九年与刘芸生女士结婚后，家中亦朴实无华，从不使用佣人。

一九四一年，刘芸生女士住陕坝郊外，时年不满三十岁。傅作义的长官部离此住处也仅二三里路，但他除了每星期六回家住宿一夜，星期三晚回家看望一下后，仍回长官部住宿，一般不作变动。

一九四五年十月，刘芸生带领子女几经周折后，于四八年初冬赴四川成都。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起义消息传出，刘芸生的成都住所曾被包围。后于一九四九年二月绕道香港回北平，全家始得团聚。

傅先生对子女管束极严，如不准人们以少爷、小姐相称，让直呼其名。对子女的衣饰饮食亦皆以一般水平为准，不得特殊，平时亦不许随便外出游玩。

## 二、张中齐有眼不识泰山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傅作义来到陕坝。除整

训部队，成立绥干团培训军政干部外，还多方招才纳贤，充实力量。有一位叫张中齐的，持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信，从重庆来河套谒见傅作义。来到长官部，经侍从人员引到会客室坐下。报告了傅作义，当时傅正在土丘上散步，顺便走下来，进入会议室和张中齐谈话。傅当时身穿士兵服装，腰扎小皮带，脚穿笨山鞋。张中齐以为他是傅作义的侍从人员，毫不介意地和他问长问短。谈了很久，傅最后说：信我看到了，你先住下，你的工作随后安排。这时张中齐才恍然大悟，他就是傅作义。还想和傅攀谈，傅却说：“我马上要开会，有机会再谈吧。”张中齐出来给人说，我在大后方看到的军官们，都是呢子衣服，身佩武装带，领章符号齐全，万没想到傅将军竟是这样的打扮，悔恨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 三、一尘不染，平易近人

一九二八年，傅作义只三十三岁，但已身为天津警备司令兼任军长。那时的天津，华洋杂处，市面繁荣。傅亦常周旋应酬于社会上层之间，但他仍处之泰然，安之若素，衣饰饮食，依然故我。

傅作义先生不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官高逾谦，平易近人，如常和官兵打排球，布衣



素食，与官兵毫无差异。他关心士兵，常去士兵住地问寒问暖，了解生活情况。他特别注意士兵们的眼睛是否红肿，是否缺水。同时对所属的军政人员亦要求严格。对体罚士兵的军官，严加斥责。对抽吸鸦片、赌博、贪污公物和克扣军饷者，均严惩不贷，为此，所驻地区的禁烟、禁赌、杜脏皆见效果。

#### 四、为民解难受爱戴

一九四二年秋，傅长官骑马赴大发公视察骑四师。在离蛮会约六里的大路上，有一位年约五十多岁的小脚妇女跪在路上喊冤，向傅长官哭哭啼啼地说：“我养童养媳多年，已长成人，在将要完婚之际，她却跑到娘家不来，没办法，只好求傅长官大人给我作主……”此妇人边说边叩头，卫士再三拉她都没拉起来。这时傅长官在马上对她说：“我知道了，让卫士带领你就近找董军长解决。”待这位妇女去后，傅长官才继续上路。

到蛮会后，卫士说明经过，董找着党部书记曹朝元负责办理。因曹是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又在一〇一师作军官多年，颇有经验。当即传唤各当事人，在军部会议室开了几次庭，使双方在满意的情况下结了案。

## 五、出行简朴风气良

傅长官在绥西多年，除去远处坐一辆双排座的大卡车外，在市里一般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出行也只带卫士一、二人，从未有前呼后拥的习惯。

一九四三年，时届春末，塞外仍寒，泼水后地上不易干，且早晚尚有冰渣出现。一天傅长官骑车由绥干团回来，因街上泥滑，他被摔倒在泥水参杂的土马路上。跟在身后的张景涛急忙放下自己的车子去搀扶他，并且气愤地向路上的人说，这是谁泼得满街污水。傅见此情当即制止说：“怨人家干什么，只怪咱们没留心。”当时在场的两位市民帮助张将他扶起。傅当时已不能站立，几个人只好连背带架地把他送回长官部。

原来这是路北的理发馆每天将用过之水泼在街上，大街上又是土筑的，积水不化自然是道路泥泞难以行走。理发馆老板得知把傅长官摔伤了，认为可闯下天大的祸，只好等着挨打受罚，以为至少也得坐几天警察局的冷班房。终日提心吊胆，寝食俱废。

傅长官摔伤后经过医务人员检查，是腿关节脱臼，但骨折尚不能排除。因当地医疗条件差，为了及时和慎重，当即电告兰州朱绍良长官，第二天派来飞机，便将傅接到兰州治疗。所幸未

有骨伤，没几天脱臼很快愈合，行动如常了。

傅伤愈返回后，人们见他精神焕发满面春风，自然欢喜，待一批一批看望他的人相继散去之后，傅长官向张景涛说：“你去那个理发馆看看，问一下这几天有没有咱们的人去难为人家，若有的话就说那是不应该的。”张即去问。一进理发馆，张问，你们老板在不在？别人不知何事，也不敢回答。老板在旁边低头小声说“我就是。”老板误以为是来抓他的。这时张向他说明了来意，并问老板“这几天有人来难为过你吗？”老板又惊又喜地说：“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张说“没有就好，以后有人来提这件事，你就说我来过就行了。”这位老板当时由惊吓变欢喜，心头上的乌云顿时散去，不知该说什么才是。早就双手举在胸前连连拜谢不止，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他老人家不怪罪小民，真是量大福大，量大福大”。

（根据张振耀、姚毓斌、萧如芝来稿整理）

# 傅将军在河套

## 整军经武 励精图治

樊 真

一九三九年春，傅将军接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遂率部由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一带，渡过伊克昭盟大沙漠，到达绥西河套。日寇闻傅将军部队来到河套，颇为惊慌，曾出动飞机二十九架前来侦察并滥肆轰炸。此时，傅将军积极备战，于同年十二月至次年四月，傅将军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包头、绥西、五原三次大战役。历时四个多月，终于将日伪军赶出河套地区，获得了五原大捷，名震中外。

五原大捷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对峙阶段，前方战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我游击部队虽不断出击，但并未发生较大战斗，日伪军也未敢进犯我河套地区。在此情况下，傅将军在河套整军经武，励精图治，生聚教练，准备反攻。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始率部离开河套。

由于五原大捷三战役另有专著，故在此从

略。本文只叙述傅将军在河套期间军政两方面的重大措施。疏漏之处，望知者指正。

## 一、傅作义将军接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 (一) 横渡伊克昭盟大沙漠

傅作义将军接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即带了总部的部分干部（原北路军总部），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底由河曲到达五原，并命令所部由河曲过河，经准格尔旗越过伊克昭盟大沙漠，陆续向绥西五原、临河一带集结。于同年五月，在五原正式建立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二 伊克昭盟当元代时还是一片绿洲，水草茂盛，为蒙胞游牧之所。成吉思汗陵墓即葬在鄂尔多斯草原、郡王旗境内的伊金霍洛。后因外蒙大沙漠不断南移，天长日久，使伊盟变成了大戈壁。昔日繁茂之区，一变而成为黄沙千里，人烟稀少、粮食困难之地。在这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傅将军严申军纪，要爱护百姓，不许扰民。部队均准备十日干粮，晓行露宿，横渡伊克昭盟大沙漠，开往五原。由于沿途饮水十分困难，饿时只能啃几口干粮，到达五原后，不少人生了口疮，其艰苦之情况，可想而知。迨四、五月间，部队始先后全部到达五原。

阎锡山得悉三十五军北上，划归第八战区战斗序列，感到非常惋惜。但他知道这是蒋介石的

决定，势难阻挠，遂派其亲信赵承绶，正式接任了北路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时，电傅只能带一〇一师与独立步兵旅，不准带七十三师。傅为人克己，为了避免纠纷，复电同意。但七十三师四二二团团长王雷震，追随傅将军工作多年，该团各级军官又系傅亲所培养，故都不愿留在山西，一致要求追随傅将军为国效命。在此种情况下，总部参谋长陈炳谦电告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谓偏关情况紧急，速令四二二团带上炮兵营开赴偏关待命。孙兰峰旅长早在偏关等候，即命令王雷震率该团由楼子营河向五原进发。四二六团团长郑海楼素怀忠义，对傅颇为敬仰，亦愿率队追随傅将军开往五原。但由于谋事不密，为刘奉滨所察觉，施行分化离间，结果只带了一个营的兵力，自动开往五原。炮兵第二十六团团长刘振衡敬仰傅将军为人，颇愿执鞭从后，亦自动率领所部开往五原。此外，还有七十三师的军官刘春方等，因敬仰傅将军为人，亦皆弃官而走，追随三十五军到了五原。

赵承绶到达河曲后，即电傅将军要求将王雷震、郑海楼及刘振衡等部开回河曲。傅为了圆转矛盾，即电赵承绶将在河曲所留的新兵团拨给赵部，作为对王雷震、郑海楼两部的补偿，至于炮兵团，请派人接领。赵遂派人至五原接领炮兵

团，但全团官兵，均表示不愿回山西。接领人无可奈何，只好作为罢论。

傅将军率部到达五原后，日寇颇感恐惧。于是派飞机二十九架，对五原进行狂轰滥炸，傅将军险遭大难。

## （二）五原改编

三十五军全部到达五原后，即按照一军辖三师的体制进行改编，改编后的建制如下：

军长傅作义将军自兼。

三〇一师师长董其武、副师长杨维垣。

三〇一团团长王建业；

三〇二团团长郭景云；

三〇三团团长王赞臣。

新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副师长王雷震。

九十一团团长刘景新；

九十二团团长郁传义；

九十三团团长安春山。

新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副师长李作栋。

九十四团团长杨新钊（后为鲁乐山）；

九十五团团长张世珍；

九十六团团长黄纯熙。

三十五军直属骑兵团团长刘春方。

同时，列入副长官部战斗序列的还有：

绥远游击军司令马秉仁；

新五旅旅长安华亭，  
新六旅旅长王子修，  
新骑三师师长井得泉，  
新骑四师师长石玉山，  
炮兵二十六团团长刘振衡，  
骑六军军长门炳岳，  
五临警备旅旅长徐席儒，  
察哈尔游击军司令张励生，  
东北挺进军马占山，  
宁夏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  
游击部队李兆兴、高振兴等。

以上各部队的总兵力共计三万余人，这就是奇袭包头、会战绥西和五原战役的基本力量。

## 二、积极整训、准备出击

### (一) 成立绥远省动员委员会

一九三九年三月间，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在五原城内成立，绥远省政府亦由榆林迁至五原。傅将军为了实行全民抗战，仿效共产党的先进经验，成立绥远省动员委员会。于是发出布告，号召知识分子到绥远省政府秘书处登记，共录取了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五百多人，连同在职的行政人员和三十五军、绥远游击军的一部分政工人员，共七、八百人，在新公中集中训练了一个月。



训练内容：分军事、政治两大项。军事方面，由三十五军参谋长张濯清主讲；政治方面，以傅将军的抗战救国言论为主（精神讲话），另由于纯斋讲国民精神总动员，潘纪文讲《论持久战》，张遐民讲《三民主义概要》等。傅将军非常重视这次集训，曾亲自参加了听课和大会讨论。

一九三九年四月间，从参加集训结业的人员中，挑选比较优秀的学员三百多人，成立了绥远省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傅将军自兼主任委员，民政厅厅长袁庆曾为副主任委员，于纯斋为书记长。县、区、乡也都成立了动委会。

动委会的任务是：清查户口、编组保甲、组织通讯网，建立并健全盘查哨，配合军事供应，组织担架队、设立救护站，发放救济款、救济物资等，以及动员有关人力、物力、财力参加抗战等。

绥远省动员委员会的内部组织为：组训组、宣传组、民众组训组、妇女工作组、总务组、流动传宣队等。组训组主管干部分配、调遣、组织、训练、考核等；宣传组主管有关抗日战争及动员工作的政策法规，编印及发行《动员报》，组织歌咏队，大力推动和教唱抗战歌曲和进步歌曲等；民众组训组主管适龄壮丁训练，组织通讯

网、盘查哨、救护队、担架队及动员新兵入伍等；妇女工作组主管妇女训练、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学文化，建立缝洗队、组织妇女为伤兵缝洗被褥、衣物等；总务组主管财务、伙食、杂务等；流动宣传队则分赴各区、乡演剧、书写标语、画漫画、出大型壁报及教唱抗战歌曲等。

各县、区、乡动委会的组织及工作任务大体仿此，只是编制小些。值得一提的是，动委会还有一个奋斗室组织。据于纯斋说：一九三八年冬在河曲时，傅将军曾和他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三十五军已经建立了政治机构。而此次从西安、晋南运城一带招来的知识分子中，论思想，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员；论资历与学历，有大学生、中学生、中小学教员；论地区，则华北、东北各省都有，南方各省也有。怎样才能使这些人服从抗战救亡这个大前提呢？怎样才能团结这些人为抗战建国热诚工作呢？以什么组织形式作为领导核心呢？傅作义将军说，国民党中央军有“中山室”的组织，八路军有“列宁室”的组织，我们该叫什么呢？最后说：我们为了抗日而奋斗；为了抗战的胜利而奋斗牺牲到底，我们就叫“奋斗室”吧！只要能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就好了。这些话反映了傅将军当时的思想境界。以后的《奋斗日报》、奋斗中学、奋斗小

学，都是由此而来的。

绥远省动委会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在各次战役中，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强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二）召开抗战建国工作讨论会

三十五军改编就绪后，傅将军即着手补充枪械弹药，补充兵员，并加紧进行军事训练，以增强战斗力。与此同时，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以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念，并研究新的战略与战术，以及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抗战等。他学习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民主讨论，制定抗日大策的先进经验，在百州堡召开了“抗战建国讨论会”，（以下简称抗建会）。所有军政干部轮流参加讨论，以集思广益，制定抗战建国大计。每期一个月，前后共召开了四期。第一期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开始的，一至三期由傅将军亲自主持，到第四期开会时，由于准备出击，军事匆忙，便无暇亲自主持了。

此时，副长官部已由五原迁至乌兰浩特，继而迁至陕坝。笔者当时任副长官部经理委员会综训科科长，曾参加了抗建会第二期的讨论；到第四期，笔者代表经委会到会主持军需干部的讨论。

在抗建会第二期的讨论上，傅将军讲话的要点如下：1、抗战建国是国家的大事，民族的大

事。目前日寇侵略，强敌压境，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必须发动全民抗战，方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军政干部是抗战建国的骨干力量，只有依靠广大干部，群策群力，才能充分发动群众，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讨论抗战建国的大计。希望大家踊跃发言，献计献策，共同讨论，集思广益。对军政各方面应兴应革的事，大胆提出，共同讨论，改正错误，发扬优点，使错事变好，好事更好。如果每人提出一条好的建议，四百多人就能提出四百多条，三期就可提出一千多条好的建议（抗建会原计划办三期，后因还有部分干部尚未参加讨论会，故增办了第四期），这就达到了集思广益的目的。根据这些建议制定出抗日大计，集中了大家的智慧，所制定的大计，必然是正确的，必能战胜日寇，达到抗战必胜的目的。

2、抗战建国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必须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如果只抗战而不建国，则抗战就没有后援；反之，只建国而不抗战，则建国就没有条件。只有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才能战胜日寇，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3、抗战建国是全中华民族的神圣任务，必须全国人民精诚团结，不分党派，不分领域，共同努力，一致行动才能取得胜利。但要想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必先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才能做到

统一行动。这就是我们召开抗战建国工作讨论会的目的。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献计献策，把抗战建国工作讨论会办好。

大会在统一认识方面，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以激发干部的爱国主义思想，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战略战术方面，以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为指导思想，研究了运动战、游击战，软顶硬打，正顶侧打，化整为零与集零为整，远程奇袭（即掏心战术），围城打援，避不利找胜利，诱敌深入而聚歼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即甩开数路打其一路），打敌人长处之短，防敌人短处之长，以及近战、夜战、巷战等战略战术。针对敌人飞机与坦克的威力，提出用步枪、机枪射击敌人低空飞行的飞机，用集束手榴弹炸敌坦克，以及用飞刺刀消灭敌人等方法（用飞刺刀消灭敌人，即在肉搏战时，充分发挥枪口弹的威力，以杀伤敌人）。在全民抗战方面，已决定成立动员委员会，县、区、乡干部广泛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组织民众自卫队，协助军队作战，以及空室清野等，并确立了军民一体的领导体系。

为了准备作战，任命优秀军官李吉祥为五原

县县长，实行空室清野，并密切军民关系。

### （三）国民党中央破坏团结

在参加抗建会的军政干部中，大部分是无党派人员，但也有部分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由于政治倾向不同，在自由民主讨论过程中，各抒己见，颇为热烈，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有时也发生争论。但总的目标都是为了抗战建国。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却引起国民党中央的非议。蒋介石认为抗建会所讨论的战略战术，是标新立异，于是国民党当局派中央委员苗培成前来绥西河套，要求排除共产党员，并建立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治部。随即任命张彝鼎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苏寿余为副主任。

在国民党中央及副长官部政治部的种种压力下，被迫不得不将各级政工机构中的共产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送回延安。这是傅将军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事。

同年十月间，“抗建会”第四期开会时，傅将军因军事匆忙未能亲自主持。而政治部副主任苏寿余已来到河套，并参加了大会的讨论。他伙同绥远省省党部委员陈国祯，在大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军政干部都要参加国民党，谁不参加，就要开除谁，永不叙用”。强迫第四期参加讨论会的军政干部，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以往生动活

泼的政治气氛，为之突变，象征着冬天即将来临。

### 三、五原大捷三战役的颂歌

自从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的嫡系军队，在其统帅部的错误战略思想指导下节节败退，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一九三九年九月敌陷长沙，十一月又侵占南宁，南线形势吃紧。蒋介石政府为了表示坚持抗战，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蒋介石恐华北日寇南下增援，曾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率部，向大余太以北的高台梁出击，以配合湘北战役。目的是吸引华北日寇于塞北，使之不能向江南增援。傅将军认为，高台梁地区人烟稀少，根本没有日伪军驻守，只有我游击队往来。即使是大余太（为伪安北县政府所在地），也仅有日伪军数百名。把这个地区选为攻击目标，对敌人来说不关痛痒，未能打中日寇要害，不可能将华北日寇吸引过来，对湘北战役不能起到配合作用。因此，傅将军从抗战全局观点出发，建议将日寇在华北的战略要地包头，作为这次攻击的目标，以达到吸引华北日军于塞北，而起到配合湘北战役的目的。蒋介石批准了傅将军的作战计划。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傅将军率部与日寇进行了奇袭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三大

战役，直至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终将日伪军大部歼灭，残部赶出河套地区，获得了五原大捷。

五原大捷，是傅将军率部与日寇经过连续四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攻防血战五十七次，经过反复冲杀较量，终于将日伪军歼灭殆尽，光复了五原县城。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写下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傅作义将军军事战略的伟大胜利；又是河套军民，团结合作，歼敌政果的胜利；更是广大官兵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勇于自我献身精神的胜利。在作战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发挥了军民一体、同仇敌忾的综合力量，表现了傅将军非凡的军事才能。也证明了军民合作，乃是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自此，日寇再未敢进犯我河套地区，从而保证了河套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五原大捷以当时的战况而论，是全面抗战以来首次收复已失陷的城市。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重庆《大公报》在头版显赫位置，连篇刊载。标题为：“五原战役，开创最后胜利的先路。”“五原城血战月余，三失三得，最后卒能击败强敌，克竟全功”。五原大捷，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的民心与士气，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日寇的威风，是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五原大捷使日寇心惊胆裂，狼狈逃窜，不仅大灭日寇的威风，而且敲响了日寇走向灭亡的丧钟。

关于五原大捷的作战经过，笔者另有专文叙述，在此从略。谨将五原大捷的赞歌三首，收录如下：

（一）七律 奇袭包头  
将军筹运帷帷间，前卫薄城夜未阑。  
黄水封冰千里雪，阴山月冷万家寒。  
寇兵穷巷半生死，壮士街头战匪酣。  
借问夺关谁作首，军民争道是青山。

（二）七律 五原大捷  
进城飞雪草枯凋，倭寇凶狂犯九皋。  
狼阜云深伏壮士，大河冰裂涌波涛。  
八千子弟挥龙剑，一旅偏师斩巨鳌。  
黄帝子孙多尚武，弯弓朔漠射黑雕。

（三）古风 娘娘庙无名英雄赞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热血化龙泉，飞剑诛寇仇。  
人生谁无死，山重鸿毛轻。  
古庙松柏林，凛凛有烈风。

四、五原大捷后的国内外形势  
从一九四〇年四月五原大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获得最

后胜利。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国际方面：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侵略波兰，欧战爆发，英法对德宣战，而美国却隔岸观火，保持中立。并伙同英国，搞“东方慕尼黑活动”，企图拉拢日寇，牺牲中国。这时日寇内部也对“东方慕尼黑”抱有幻想，从而引起北进与南下之争。由于希特勒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寇权衡利害，便决定南下，与德、意两国结成轴心，以对抗英、美。

一九四一年，美国对德、意宣战。不久，希特勒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入侵苏联。苏联与英、美、法结为军事同盟，合力抗击法西斯德国。同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战争，美国与英、法同时对日宣战。从此，欧亚两洲的战火连成一片。已经浴血抗战四年多的我国，至此，亦加入同盟国，与盟国协同作战。

在国内方面：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秘密由重庆飞云南昆明，转往越南河内，旋于二十九日在香港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叛国投敌。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汪在日寇卵翼下组织伪南京政府，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成了天字第

一号大汉奸。同时，日寇从中国战场上抽出兵力南下，去掠夺英、法、美、荷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妄图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因此，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已感到兵力不足，逐渐由攻势转为守势，与国民党军队形成相持对峙的局面。这时，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许多大片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已拥有精兵百万，民兵二百二十余万。抗击了大部分日寇与几乎全部的伪军，使日寇的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

随着世界军事形势与我国抗战形势的发展，日寇在中国战场上日益走向衰落的困境。而我国的抗战力量则日益发展壮大，正由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发展。

由于中、苏、美、英、法等同盟国，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军事力量等方面占有优势，因而，在战争方面不断取得胜利。而德、意、日等轴心国家的非正义之战，失道寡助，势穷力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直至最后灭亡。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击败德国侵略军，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军节节败退，一蹶不振。苏联红军乘胜跟踪追击，势如破竹，取得重大胜利。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从而，敲响了希特勒灭亡的丧钟，使法西斯德国处于东西两面夹击的狼坝境地。

次年五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杀身亡。紧接着盟军会师易北河，德军无条件投降。在此以前，意大利已先期灭亡，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暴死米兰市。至此，欧洲战场的战事即告结束。

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日寇侵略军大部在中国大陆，前方与国民党军队相持对峙于数万里之长的战线上，犬牙交错，互相胶着，欲进无力，欲退不能。其后方则陷入各解放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处于被动挨打和被歼的困境。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上，配合盟军向日寇发动进攻，不断取得胜利。美国海陆空军在太平洋上歼击日寇，连续取得重大胜利，一九四五年七月攻占冲绳岛。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这时，日寇已成网中之鱼，瓮中之鳖，败局已定，只有投降之一途。八月十四日，日寇天皇不得不按照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盟军代表在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军舰上，正式举行了签字仪式。至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部结束。我国为期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亦同时取得最后胜利。

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内，我国的抗日战争，是由战略相持阶段逐步向战略反攻阶段发展。傅将军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

在军政两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有力措施，这就是：整军经武，准备反攻；励精图治，生聚教练。

## 五、整军经武，准备反攻

### (一) 辞勋与授勋

五原战役我军取得重大胜利，全军振奋，举国欢腾。全国各大报刊称之为“五原大捷”。在这次五原歼灭战中，共击毙日寇水川伊夫中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荒一郎中佐及其特务人员、伪蒙军顾问中岛少佐、警务指导官内久保作，以及到五原勘探的技术人员等三百余人，日寇士兵一千一百余人。死伤伪蒙军三千余人。生俘日寇指挥官观行宽夫、警务指导官浅沼庆太郎、西田信一等五十九人，俘虏伪蒙军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各种火炮三十余门，汽车五十辆，轻重机枪五十余挺，步枪三千余支，还有橡皮船、电台和其他战利品甚多。

我军也付出重大代价。团长贾世海（晏如）、营长赵寿江、阎梦云、冯增波以及连长三十余人，均为国光荣牺牲。仅一〇一师三个团长均负伤，宋海潮团长负重伤。此外，师长袁庆荣，团长安春山，营长杨廷璧等，均中弹负伤。连排长阵亡和负伤者更多，有几个连几乎全连殉国，甚至有整营殉国者，如赵寿江营最后只剩下官兵七人。战斗之猛烈，前所未有。前方将士为

了抗日救国，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其自我献身之精神，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

五原战役的胜利，当时在全国各战场上都是罕见的，新闻界对五原大捷给予很高的评价。蒋介石为此发布了给傅作义将军的嘉勉电。大意是：查五原屏障西北，为内蒙重镇，此次傅副长官督率所属部队血战月余，三失三得，最后始能摧破强寇，克竟全功。此役不仅保障西北，而且奠定了收复失地，驱逐敌寇之基础；在抗战全局上，关系尤为重要，其功绩彪炳，殊堪矜式。兹特呈请国民政府，颁给傅副长官作义最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以资策勉。并对为国牺牲的贾晏如团长、赵寿江营长，各进两级议叙，以示优恤……；并发给部队三十万元，由傅副长官妥为分配，以资奖励。

全国抗战慰劳总会组织慰问团，到绥西河套前线慰问，并携带党、政、社会团体和社会名流赠给的锦旗一百余面。这是河套军民的光荣。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六日，傅作义将军到达重庆，向蒋介石委员长呈递了辞勋电（电文略），以谦逊之辞，表坚贞之志。陈所部杀敌致胜之由来，献争取最后胜利之良谋。

蒋介石披览之后，复傅将军一电，略称：功不自居，归之部属，惟中央授典策勋，实属斟酌

至当，兄为所部将士之长官，则兄受国家之殊奖，亦即全体共有之光荣，望即诚敬领受，勿再谦辞……等语。授勋仪式，由何应钦主持，鹿钟麟为司仪官，当傅作义将军步入会场时，司仪官高喊“欢迎常胜将军傅作义！”会场上立时爆发了一片雷震般的掌声。

同年八月，在河套峡坝“中山堂”隆重举行五原大捷祝捷和授勋发奖大会。对作战有功的官兵和抗日爱国民众的代表等，分别授了勋、发了奖。参加庆祝大会的各界代表数千人，盛况空前。傅作义将军亲自主持，转发了国民政府嘉奖各级指挥官和战士代表以及董其武、孙兰峰、袁庆荣、郭景云、安春山……等人，分别颁给勋章和奖章。同时，以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和绥远省政府的名义，给二百多名爱国民众、杀敌英雄，颁发了奖章、奖金和奖品。其中有杀死十二名日寇的农民英雄董贵成（即王大老虎）、王乐成（即王二老虎）兄弟和不怕危险为我军引路的老人张三姪，以及抬担架送伤兵的小脚妇女陈玉娘、甘冒危险救护伤员的刘天宽、郭四毛旦……等。他（她）们胸前佩戴红花，迈着矫健的步伐，满面春风地走上讲台，领受奖章、奖金和奖品，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从此，他们的英雄事迹，一时传遍民众抗日佳话，家喻户晓，交相赞誉，这

是河套人民的光荣。

傅将军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赞扬了五原战役中爱国军民齐心协力、歼灭日寇的英雄事迹。最后傅将军说：“这次胜利，不单是绥西河套军民的胜利，而是全中国的胜利，全民族的胜利。我们要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励精图治，以必胜的信念，坚持抗战到底，保卫祖国，收复失地，把日寇驱逐出我国，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 （二）陕坝改编与补充兵员

一九四〇年七月，傅将军在河套陕坝，根据军事委员会所颁发的新番号、新编制，对所部进行了改编。共编成三个军，相当于一个集团军。改编后的新建制如下：

第三十五军军长由傅将军自兼（辖三个师）：

第一〇一师师长郭景云，

新编第三十一师师长安春山，

新编第三十二师师长袁庆荣。

替编第三军军长孙兰峰（辖三个师）：

替编第十一师师长王子修，

替编第十七师师长王雷震，

新编骑兵第三师师长井得泉（后为梁立柱）。



暂编第四军军长董其武（辖三个师）；  
暂编第十师师长安华亭（后为王赞臣），  
步兵第二〇三旅旅长徐席儒（后为于霖瑞，  
旅的编制与师同），

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石玉山。

副长官部直属部队有：

直属骑兵团团长刘春方，

炮兵指挥部指挥刘振衡（辖炮兵团及战防炮  
营），

炮兵第二十六团团长刘振衡兼

战防炮兵营营长尹汉初。

此外，归傅将军指挥的中央军有：东北挺进  
军马占山部、察哈尔游击军张励生部、骑兵第  
七师朱钜林部（原骑六军军长兼骑七师师长门炳  
岳，因在包头战役后擅自跑到宁夏平罗县避战，  
因而将该军番号撤销，骑七师师长由朱钜林升  
任），以及驻榆林邓宝珊的二十二军等。还有一  
些游杂部队。

到了一九四二年，又奉令将暂四军改为骑兵  
第四军。除三十五军原建制不动外，调整后的暂  
三军与骑四军新建制如下：

暂编第三军军长孙兰峰（辖三个师）：

暂编第十师师长王赞臣，

暂编第十一师师长王子修，

暂编第十七师师长王雷震（以后是张朴）。  
骑兵第四军军长董其武（以后是袁庆荣，辖两师一旅）：

新编骑兵第三师师长梁立柱，

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王宪章（以后是刘万春），步兵第二〇三旅旅长于霖瑞一九四二年夏，蒋介石派陈长捷为伊盟警备总司令，辖骑兵第七师朱钜林部和暂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骑七师原驻伊盟，何文鼎部原系陕军，由陕西开至伊盟驻防，目的在于对陕北采取包围形势。同时，也隔断了傅部与陕北的联系。

一九四三年，傅将军辞去了三十五军军长的兼职，遗缺由董其武接任。董缺调袁庆荣升任。袁缺由铭鼎升任。

自从陕坝改编后，干部与兵员均感缺乏。重庆国民政府指定陕西汉中、城固等县和甘肃武威、民勤等县为傅部接领新兵地区。傅所属各部曾多次派员前往接领新兵，使所部兵员逐渐充实起来。后来又在绥西河套动员了数千名新兵入伍。经过逐次补充，部队按新编制基本满员。至于干部，则需要自行培养。

### （三）成立军政干部训练团

由于在历次作战中，军官伤亡较多，部队改编后，编制较前扩大，军事干部极感缺乏，政工

干部亦感不足，同时，地方百政待兴，绥远各级行政干部也极待补充。为此，傅将军决定成立军政干部训练团，以培养干部，造就人才。傅自兼主任，并任命李世杰为教育长，负责培训事宜。同时派人到西安、汉中、兰州、武威、天水等地，招收初中以上的青年学生入团学习。团址设在临河县八岱地方，校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干部训练团”，另一块是“绥远省政府干部训练团”。意在军政干部熔一炉而冶之，但以军事为主。傅将军对干部训练团极为重视，他虽然身兼军政要职，日理万机，但总是抽出一定的时间多次亲临训练团作精神讲话，并在训练团住一个时期，与教育长、教官等人研究教学方针与教育方法等；同时，亲到各教研小组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有时还和学生一起听课，或作野外演习。

干部训练团的教育宗旨：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提倡为国家、为民族甘愿自我献身的高尚精神。以前在抗战建国讨论会上所提出的三个口号，在干训团仍继续执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为国家、为民族甘愿自我牺牲，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就是要确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抗战到底，必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军事第一，胜利第

一”，就是一切服从军事，一切为了最后胜利。

干训团的主要目的是：要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能文能武的青年干部，以充实和加强抗战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其中心问题是要培养大量的青年后备军官，以补充各部急需的军官缺额。同时，也兼顾到其他专业人员的培养。在军事学员中，除培养青年学生外，还由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有实践经验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士兵，实行学生与行伍并重。团本部设有若干教学小组，计有：军事组、政治组、行政组、秘书组、军需组、军医组……等，而以军事为主。各组设主任和副主任各一人，负责教学业务，教官由各组主任聘请。

傅将军对各专业小组的教学情况，颇为关心，曾亲往各专业小组视察并指导工作。有一次，傅将军到军需小组视察，当时，军需小组副主任樊鹏翱请他参观了摆在桌案上的许多课本，计有：簿记会计学，粮秣经理、被服经理、作战给养以及樊自著的《战时军需业务概要》等。傅将军翻阅一遍，表示满意。但他又说：“书眉太大，浪费了纸张”。接着他问：“您们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樊答：“让学生学好这几本专业课程，当好军需”。傅将军又说：“教育学生要当供给军需，不要当帐房先生。要经济公开，一切为

公；要把部队的钱全部用在养兵上，使兵强马壮，消灭日寇，争取最后胜利”。寥寥数语，给军需干部指明了方向。樊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贯彻了傅将军的指示。后来，樊又以“要当供给军需，不要当帐房先生”为标题写了一篇论文，登在西安军需局机关刊物《西安军需通讯》上，受到好评。

军政干部训练团连续办了几期，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和其他专业干部，从而满足了部队与各部门的需要，壮大了抗战力量。

#### （四）关于整体干部的标准问题

傅将军多次亲临军政干部训练团作精神讲话，有一部分是讲整体干部问题，希望军政干部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曾提出“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大家享，有难大家当”的口号。为了处理好个人与整体的关系，提出整体干部必须具备的条件与干部戒条等。后来逐步归纳为四有、四为、四要和五个一致，以及干部戒条十二条等。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傅将军召集军政高级干部开会，研究整体干部问题。经过讨论修正，明确规定了整体干部的标准为：“四有”、“四为”、“四要”和五个一致。明令颁发各部队和各级政府贯彻执行，并由人事部门考核，使全体

干部艰苦成风。

在另外的条例中，还规定了“严禁烟、赌、赃”。这一禁令非常严厉，对于违犯禁令的人员言出法随，雷厉风行，决不宽贷。曾在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各枪毙了一名贪赃枉法的犯人，以示儆戒。

傅将军对整体干部标准与干部戒条颇为重视。由人事室成立评考委员会，专司其事。定时或不时地派员到各部队进行督导考核，对成绩优良的干部，给予物质奖励。一等奖给布三丈，二等奖二丈，三等奖一丈六尺。傅将军还规定：每个干部和战士（士兵），都可以直接和他通信，表达自己的心愿和意见，并对来信一一答复。为此在人事室增设了一个科，专管官兵信件。

由于傅将军提出了整体干部的标准与干部戒条，对部队与行政机关影响很大。广大军政干部基本上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奋斗牺牲的抗日士气。同时，在蒋介石统治的范围内，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局面。

#### （五）补充军械装具等

关于枪械弹药的补给，蒋介石对他的嫡系部队一向是优先充分供应的；而对非嫡系部队则是很不容易得到补给的。而且后勤部门上、下都卡，联勤总部拨给陈旧的武器，弹药军械仓库还

要勒索贿赂。陕坝改编后，傅将军把按新编制应补充的军械弹药列表呈报军事委员会，经蒋介石亲自批准，拨给一大批军械弹药。傅令其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慎五到西安军械仓库去领，却领不到。西安军械仓库主任毫不客气的告诉杨慎五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杨即电傅请示，傅复电说：钱当然照付，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而该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杨慎五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手，乃立即告到蒋委员长那里。蒋介石批给傅部这一大批武器，是为了让傅给他看守大西北的大门，免遭日寇侵犯。蒋介石一怒之下，把那位仓库主任撤职查办了。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乃是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特色。

至于应补充的军用装具，如子弹袋、手榴弹袋、干粮袋、水壶、马鞍子……等，西安军需局均无现品供应，改发代金自制。傅将军只好派人到西安、兰州等处，招商制造。这些事务，均由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统筹办理。但报销却要以军为单位，分别报销。这是一大矛盾，给军需领报手续上造成极大困难。当时，经理委员会综计科科长樊鹏翔主管此事，乃决定由副长官部统一报销，货款多退少补，一一结清。同时，将各军应分摊报销的货款，按所领的实物结清，通知

各军在决算中列表，并报军政部备案。另外，由副长官部统一印制了计、决算表格，分发各军，限期列报。结果，受到军政部统令嘉奖，认为傅部各军决算报告最快，余款上交最清，名列全国第一。傅将军闻讯颇为欣慰，亲自接见了经理委员会科长以上干部，勉励有嘉。

(六) 开展对敌战区的游击活动

五原战役后，日寇侵略军一部南下，中国抗战力量不断增强，大陆战场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河套五原与包头之间，亦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傅将军此时一面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一面积极整训部队，准备反攻。

傅将军效仿八路军的办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确定乌拉山前为第一游击区，乌拉山后为第二游击区，先后组织了不少游击队伍。但其中大多数军官习惯于正规战争，而不会搞游击战争，在敌占区难以立足。因此，多以河套前沿为避风港，偶尔到敌占区游击几次，也是聊以塞责。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并进行游击的，只有原来“绥远自卫军”的鄂友三、王有功、乔汉魁、鄂青云、郭长青等。但这些游击部队多被军统特务所控制，勾结日寇，联络伪军，与太青山的八路军李支队为敌，实有损于国共团结抗战。

(七) 傅将军关心官兵生活、为干部解除后



## 顾之忧

傅作义将军讲“为整体”不是只提出这样的口号，而是有其具体内容与深刻含意的。翻译成现代语言，那就是集体主义，或者说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傅将军本人就是“为整体”的模范。具体表现在他关心官兵生活，为抗战干部解除后顾之忧，使其专心致志抗战救国。他常以家长自居，工头自命，不但关心官兵的吃饭问题，关心官兵的冷暖，关心干部的学习与培养，而且对随军眷属的生活以及干部子女的就学等问题，都关心备至，体贴入微。现分述如下：

1、关于官兵主副食问题。一九四一年初部队军粮发生困难，绥远省粮政局征购的军粮不够补给，而马料却有多余，同时，附带征购了不少胡麻。部队的主食，小麦和糜子发了几个月就告罄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用豌豆代替米面。傅将军示意粮食主管机关，略谓：官兵浴血抗战，按照国家规定，主食应发大米白面，现以当地条件所限，不能按照规定发给，但也不能让官兵吃亏。应当算出豌豆与米面的差价，折发胡麻油，以资补偿，借以改善官兵生活。粮食机关认为傅将军所提意见合情合理，代表了广大官兵的利益，即遵照办理。秋收以后麦糜丰产，官兵主食改为麦糜各半配发，但糜子与太米的差

价，仍折发胡麻油，以资补偿。官兵普遍表示满意。

傅将军不但关心官兵主食，对官兵副食尤为关注。趁前方相对稳定之机，调整各部队驻地，使部队防地基本稳定。同时，提倡各部在防地附近，自种蔬菜及土豆等，养猪、养羊以改善官兵伙食。还提倡部队经济公开，成立各级经理委员会及伙食委员会，由士兵中派代表参加管理，帐目按月公布。采取以上措施后，官兵生活逐步改善，身体日益健壮，并促进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友爱。

2、关于官兵的服装鞋帽问题。部队服装，以往由山西按照寒冷地区发给，比较适用。一九三九年夏，部队由晋西北开至河套后，改由西安军需局发给，所发冬季棉装多不适用，主要是不能御寒。例如：棉衣棉絮太薄，棉裤不但棉絮薄，而且有一部分是短裤腿。棉大衣也因棉絮薄而不能御寒。棉帽没有皮帽沿，棉鞋更不能御寒。五原战役时，不少官兵冻伤了脚。傅将军对此大为不满，曾示意经理委员会向西安军需局交涉，加以改善。经委会综计科科长樊某按照傅将军的意图，撰写了一篇文章论述此事，登载在西安军需局机关刊物《西安军需通讯》上。大意是绥西河套位于阴山地区（贺兰山、狼山、乌拉

山、大青山……等地区。总称阴山山脉），气候酷寒，最冷时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以下，非皮衣不足以御寒，棉衣也要加厚。唐朝诗人王昌龄出塞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阴山内外乃古战场，气候寒冷，常覆三军。南方人不知阴山之酷寒，犹之塞北人不知南方之酷热一样。接着详细叙述了所领棉军装不能御寒的具体情况，请军需局派人到河套亲身体验，制造出适合河套地区之军装，以利抗战。该刊加了编者按，予以肯定。傅将军阅后，派人与西安军需局洽商后决定：甲、棉衣增加棉絮，棉裤全部发长腿裤，并酌发一部分材料自制；乙、棉大衣改发皮大衣，布面只领材料，皮筒与皮领发代金自制；丙、棉帽加缀皮帽沿，发代金自制，丁、设立军鞋厂，领代金或材料自制军鞋。

傅将军生活艰苦朴素，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所以能亲身体验出官兵的冷暖，兼之他素常关心官兵生活，并尽量加以改善，使官兵得到温暖。傅将军赢得了官兵们的信任与尊敬，在部队中有崇高的威信。

3、关心干部学习与培养。此事在成立军政干部训练团一节中已有详细的叙述，故不再赘。

4、成立眷属团，解除干部后顾之忧。在抗

战初期，一度将随军眷属送回家乡或转移到太后方。后因前方军事形势相对稳定，不少眷属又由大后方来到宁夏之黄渠桥，不久又迁移到石咀山。在此种情况下，傅将军决定成立眷属团，派专人负责照料，统一管理。每月生活费用由干部自愿确定，通知经理委员会，经理委员会派专人送往眷属团，适时发到眷属手中。春秋换季时，廉价供应一些布匹，自制穿着。后来部队到了陕坝，眷属购粮困难，即由部队余粮中拨出一部分，按人口廉价供应。总之，在眷属团负责照料下，眷属吃、穿、用都可以得到保证。从而解除了干部的后顾之忧，使干部可以轻装上阵，抗日救国。

5、成立奋斗学校，使干部适龄子女入校就读。一九四〇年夏，在黄渠桥成立眷属团后，傅将军为了使干部子女免于失学，故决定在黄渠桥成立奋斗小学，聘请蒋志伟女士为校长，吸收干部子女入学。同年农历五月五日正式开学。

一九四一年，流散在后方各地的眷属，陆续集结到宁夏的石咀山。于是眷属团亦由黄渠桥迁移到石咀山，奋斗小学亦随之迁移到石咀山。此时，入校学生已增至近百人，教职工亦增至十余人，校长改由田玉册女士担任。由于有了一定的教学骨干，教学活动逐步走上正轨。至一九四二年，即有了第一、二届小学毕业生（入校的学生

中，有部分二、三年级的学生）。

一九四三年秋，奋斗小学随眷属团迁至河套陕坝，更名为私立陕坝奋斗小学，校长改由傅作义兼任，日常校务由郭揽青先生办理。

在奋斗小学尚未迁至陕坝前，于一九四二年秋，在陕坝成立了奋斗中学，公推傅作义兼任校长。由校长聘请王明德为校务主任，曾士先为教导主任，余咏晨为事务主任。

傅作义将军十分重视学校教育，曾在陕坝选址，建设新校舍。一九四三年建成完工后，中小两校同时迁入新校址。此时，初中部已有一、二年级各两班，学生一百四十余人。又由西安等地聘请了一批品学优良的教师，加强了教学工作，使各项教学工作纳入了正规。并为提高中、小两校的教育，又加聘郭揽青为奋斗中学副校务主任兼奋斗小学校务主任，各项制度逐渐完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经过一番努力，到了一九四五年秋，已经有了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并设置了高中部。此时，已发展到初中六个班。高中一个班。不但解除干部子女就学的后顾之忧，而且为国家培育了人才。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为奋斗中学建校三周年校庆，傅校长亲临参加庆祝，并与全体师生合影。

傅将军在军事方面，整军经武，厉兵秣马，做了一系列精密细致的工作，目的是造成一大批精练的队伍，准备反攻，在战场上，可以摧毁日伪军队，收复失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国将军魏德迈，以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前来河套陕坝检阅部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事先傅将军指令卫景林团长为演习指挥官，组织一个步炮联合加强营的实战演习（实弹战斗演习）。地点选定在距陕坝二十多里的红鞋店一带。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魏德迈将军一行九人乘飞机来到陕坝，受到军民的夹道欢迎。下午二时，在傅作义将军的陪同下，到黄济渠畔参观了部队的战斗演习。在激烈的战斗中，战士们以勇敢敏捷的动作，在两分钟内搭成浮桥一座，使四十多名增援的战士适时通过，将优势之敌击溃。魏德迈将军翘起大姆指连声叫好。下午三时，到达红鞋店，观看了步炮联合实战演习。起初魏德迈将军与演习指挥官卫景林一起行动，魏德迈详细询问了有关傅作义将军平时治军练兵的种种情况，魏景林一一作了说明。忽然魏德迈将军提出：为什么演习场上看不到一个官兵呢？卫景林说：日寇有飞机，我们没有，因此，我们的官兵只能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一声令下官

兵全部站起来，使魏德迈感到惊奇。此后魏德迈站到高处观战，他看到炮兵射击非常准确，魏德迈称赞不已。后来魏德迈兴趣浓厚地要看看狙击手的射击技术。卫景林随便指出三名步枪狙击手，两名轻机枪狙击手，做二百公尺射击，结果百分之百的命中靶子。魏德迈以热情的口气连连称好，并称赞了“飞刺刀”的射击。

演习完以后，魏德迈与傅将军谈话时，得知演习指挥官姓卫，他便以手拍着卫景林的肩膀说：“啊！咱俩还是堂兄弟呢”。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在陕坝东教场检阅部队，经傅将军介绍后，魏德迈将军致词。略谓：

“我曾旅行英、法、德等国，看到过他们的部队。绥西河套的部队，人强马壮，技术娴熟，实足与美、英、法、德等国的军队相媲美，可以说是西北的长城。……我相信中国必能战胜日本，取得最后胜利”。

下午三时，观着步、骑、炮技术表演。在各项表演中，多次博得魏德迈的好评。尤其在步兵战士张克明、全副武装在二十七分钟中，通过一百二十公尺距离内的各种障碍物——独木桥、壕沟、铁丝网、一般城墙高的光滑的木板墙等。魏德迈看后，惊讶不已，立即趋前与该战士握手致

贺说：“你胜利了！”

一九八三年傅将军的长女傅冬同志到美国时，曾与魏德迈将军会晤。事隔三十多年，魏德迈回忆起当年他在中国陕坝检阅中国部队时，风趣地对中国人说：“傅将军救了我一命”。原来是魏德迈乘飞机到达陕坝那天，天空云量较多，浓云蔽日，飞机找不到机场，只好在空中盘旋寻找。多亏傅将军事先派人在机场燃起篝火和多数火把，才使飞机找到了机场，安全降落。否则，飞机继续向前飞行，飞到包头降落，他将成爲日军的俘虏。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 六、励精图治、生聚教练

### （一）成立战地复兴委员会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军扒开乌加河南堤，引水淹没了乌加河至五原的公路。使敌陷入泥淖，行动困难。二十八日，日寇在五原大肆焚烧，烧毁其战备设施及民房多间。傅将军接到情报后，判断说：“日寇烧毁五原，那就是准备撤走了，看样子，我们不数日，便可到五原去”。果然，不久得到情报，日寇带着骨灰盒撤离了五原。傅将军在临河召见绥远省代主席李居义（财政厅长），组成了“战地复兴委员会”，任命李居义为主任委员，周北峰为副主任委员，开始医治战争疮伤，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战地复兴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宣布没收附逆汉奸所有的土地及收回包租蒙古王公土地的垦地庄园。此时，大汉奸仝喜亭、刘耀三、杜凤山等这些罪大恶极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民族败类已被我军枪决，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在战火的废墟上重建新五原。对因战争而受灾受难的民众，加以安抚和救济；堵口复堤，疏浚渠道，大兴水利；发放农业贷款，恢复和发展农、林、牧各业……。

## （二）土地整理委员会与地政局

战地复兴委员会成立不久，又成立了土地整理委员会，任命周北峰为主任委员。傅将军认为：要想发展农牧业，必先从整理土地入手。土地整理委员会的成立，负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当绥西会战和五原战役时，部队军粮发生困难。其原因是，河套的大地主和大地商每年秋收后，将大量粮食埋藏在沙窝中的地窖里，而他们却跑到大城市中去享乐。因此，我军与敌展开游击战与运动战时，到处找不到足够的粮食，军粮极度困难。五原大捷后，傅将军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军粮民食，首先从整理土地做起。

土地整理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将河套的几个垦务局接收过来，并宣布停止放垦。对已放垦的

土地进行清理整顿。周北峰在整理土地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绥西河套地区，原来属达拉特后旗管界（现属巴盟），为蒙古同胞放牧之所。蒙胞自古以来，习惯于游牧生活，择水草茂盛之地而居，蒙胞可以随时搬迁，没有固定住址。由于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附近汉民来此开荒种地者日多，且大多勤劳致富。清朝皇帝乃派貽谷钦差大臣来此，成立垦务局，开始放垦。辛亥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吏治，原垦务局依旧延续下来。百余年来，到此的垦户，大都是旅蒙行商中的商人及豪绅，他们都是用一、二两银子，或者几钱银子，向垦务局挂号，拿上若干领垦证，便串通垦务人员满滩遍野寻找能耕作的好地，随便编个地号，作为他们的领地，就筹建垦庄，经营起来。这样，每个垦庄都有土地百余顷。但他们大多不自耕，或者自耕一部分，其余则全部出租。每年春暖花开，由晋北、陕北以及甘肃、河北等地的农民，前来河套租地耕种（即所谓“跑青牛犊”）。农民种到那里，这些大户们便说靠近他们庄园的垦地都是他们的领地，秋收后就派他的帐房先生向农民按三、七或四、六分成收租粮。如某年收成特别好，他们还要对半分粮。河套这块一望无垠土地，当时还是初开垦的处女

地，又有黄河灌溉之利，由于地多人稀、耕种非常粗放，一两个劳动力，便能耕种百八十亩地。这些“跑青牛犊”的佃农们，收获后便把不能带走的粮食低价卖给地主们，买上一、两头牛，置上一、两辆木轮车，携带一家老小又返回原籍。如果还有不能运走的粮食，换些牛、羊、马匹，欢天喜地、满载而归。后来，在河套定居的人日渐增多，才建立了临河、五原两个县治。当傅将军率部队与日寇进行会战时，地主大户们将粮食窖藏在沙窝中纷纷逃匿，指示他们的代理人设法拒绝给抗日军队供给粮食。

土地整理委员会成立后，即在五原城开展工作。以傅作义将军的名义出了一张布告，简要地规定了几条，主要是：1、绥远全境一律停止放垦；2、凡向垦务局挂过号而未交地价的领地，一律无效；3、凡向垦务局挂号而只交部分地价的，交过多少地价，只留给相当的土地，其余一律收回；4、对所有领垦地一律进行丈量，领垦地的地户，于其所领地的一边指定地段，留其应得之垦地；5、凡是包租蒙古王公贵族的土地，承租权由土地委员会接收，支付给王公们租银，地商们今后不得过问；6、领垦户和地商们，在国家收回的土地上建有牛犊（农庄）及经营的土地，也一律由国家收回。其附设的房舍、酿造设

备作价收归国有，如有愿租种国家之土地者，其原建设牛棚者，有优先承租权，但是不得转租；7、凡过去在这一地区内租种土地的，土地清丈后，属于领主的地段由领主继续收租，但其租粮不得高于该土地上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清丈后，属于领主侵占国家的土地，一律收回，由绥远省政府田粮处公田科收租，不再向地主地商交租。其交租额为这块土地上正产物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这是当时国民党土地法上规定的地租标准）。佃农耕种的这段土地，由土地整理委员会发给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所印发的“部照”，作为耕种人的永租土地，只许耕种，不得买卖转让，也不得作为抵押向外贷款；8、地主、地商们在其所设的牛棚附近经营的土地，如果代经营的人愿意继续耕种的，也可以继续耕种，唯不得转租或变相转租。

当时，最困难的是：1、放垦地图无法核查，如在垦地底簿上写“南至乾梁、北至水渠、东至芄芨梁、西至白刺滩”等，模糊不清，难以辨认；2、清丈工作十分繁重，缺乏干部。经研究后，由后方招收了二、三百人，又抽调干部一、二百人，开办了“土地整理训练班”，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即开始工作。至一九四零年秋，大体上将应留给领垦的地主土地和佃农们租

种的土地面积丈量处理清楚。

一九四一年初，绥远省政府成立了地政局，任命周北峰为地政局局长。土地整理委员会同时结束。以后，各县成立了土地登记处，全面展开了地籍登记。此时，省政府设立了田粮处，征收田赋粮；专门设立了公田科，征收清理出来的公田地租。上述公田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和粮食收入的一大来源。但此事却触动了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们的神经，他们不敢直接攻击傅将军的土地整理办法，却联合起来攻击周北峰。一九四一年秋，他们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谣言，攻击周北峰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打进傅将军部的挖墙脚的人，用共产党的办法，没收地主和地商们的土地。这实际上是用恶毒的手法打击傅将军的土地整理政策。但傅将军态度极为坚定，对他们制造的谣言，置若罔闻，鼓励周北峰按既定方针继续办理。从此，周北峰放开手脚，在土地整理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工作。但豪绅们不肯善罢甘休，酝酿上告。

一九四二年春，国民党重庆政府地政署召开全国地政会议，傅将军派周北峰局长前往出席。周到重庆后，先向地政署署长郑震宇作了报告，然后，郑陪同周谒见蒋委员长，将绥远省的土地整理情况作了详细陈述。蒋介石听了后沉吟

了一下，站起来踱着步子告诉周说：“你参加完会后，就回去吧！傅主席叫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周北峰如释重负，愉快地返回陕坝。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 （三）粮政局与军粮办事处

原先部队军粮均系发给代金，由部队就地自购，比较方便。但当绥西会战与五原战役时，部队军粮发生困难。五原大捷后，按照国家规定部队粮食改为按定量发给现品。

一九四一年三月，绥远省政府成立了粮政局，任命俞杰为局长，负责征购军粮，供给军用。同时，军政部驻甘军粮局在陕坝成立军粮办事处，负责供应军粮，请傅将军协助安排人事。傅派俞杰兼任主任，樊鹏翔为副主任兼粮政局秘书主任，负责补给军粮（一九四二年改为军政部驻甘粮秣处陕坝分处）。当时，机构初成立，就要补给军粮，工作相当紧张。粮政局抽派大批干部赴各县催购粮食，以应急需。按照规定，地主大户除留足自己当年食用的粮食外，余粮一律征购，供应军粮。不少爱国开明地主，踊跃售粮，以济军用；而极少数刁顽地主，抗拒征购，制成困难。后来，依法惩办了少数最大的最刁顽的地主，才打开了局面。但所购粮食，仍然不敷供应，只供应了几个月，小麦和糜子就用完了。军

粮不继，成了大问题。傅将军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由后方运粮接济。国民政府电令甘肃、宁夏两省速运粮食接济傅将军部。前方将士望眼欲穿，而甘、宁两省当局，却口惠而实不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已只有以征购的马料（豌豆）权充官兵的主食。部队吃了几个月的豌豆，而甘、宁两省没有送来一粒粮食。在此困难期间，傅将军一面通知各部队，说明缺粮情况，望将士们体念时艰，共渡难关；一面带头以豌豆作主食，实践官兵生活一致，表示同甘共苦之意。由于傅将军患有慢性胃病，医生提议找点白面，为他做点晋南馒头，但他拒绝了。

从此，傅将军大力兴修水利，并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并推进了土地局与粮政局工作的开展，到了秋收季节，粮食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保证了军粮与民食的充裕。由于经过这一曲折，傅将军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进一步向粮政局与军粮办事处提出：1、要做到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储粮备荒；2、核发军粮，一定要核实人数，厉行节约。例如往后方接领新兵的官兵，在离队期间，军粮由沿途军粮机构补给，原部队应扣除领粮人数。粮政与军粮机构遵照指示，认真执行。傅将军的目的是，为了储粮备荒，保证军粮民食，坚持抗战到底。

#### (四) 成立水利局，兴修水利

绥西河套俗称后套。北有狼山，南为黄河，东至乌梁素海与西山咀，西至乌兰布和大沙漠。黄河故道，原在狼山脚下，后以主流逐渐南移，形成长约四百余里，宽约二百里上下的河套地区，共约一千二百平方公里，二十六万人口（抗战时期统计）。此地区原属达拉特后旗范围，后又设置了五原、临河两县治，成为蒙汉同胞杂居而分治的地区。

河套土地肥沃，宜于农耕。陕北的神木、府谷和晋北的河曲、保德等地农民，纷纷来到河套，开荒种地，河套逐步由游牧生活向农业社会转化。一九一一年起，河北省邢台县人王同春，在河套开辟了干渠八道，支渠百余条，从而使河套地区的荒地大部变为水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九三一年，傅将军为了安置部队的老弱官兵，组织了屯垦队，任命李生玉为队长，率队赴河套从事农业生产，使他们的老年生活有所依托。同时，派四一九团到狼山湾开挖渠道，兴办水利，以发展农业生产。后来，命名为百川渠。

一九四一年，绥远省政府成立了水利局，任命王文景为水利局局长，负责兴修河套水利。王派技术干部赴各地勘察测量，提出整修计划，以



供采择。当时河套地区水利的主要问题是：1、进水口无闸，进水无法控制，有时在用水时节来水不充，而在不用水时节又大量涌来；2、黄河泥沙太多，泥沙沉淀，渠道堵塞。因此年年要挖渠清淤，以保渠水畅通；3、退水渠淤塞，需大力疏浚。但以上主要问题，均非水利局本身力量所能解决，只能提出建议，以供采纳。关于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在傅将军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军民合作，协力互助解决了。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实难解决。一直延误到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在三盛公修建了水利枢纽工程，人民才控制了黄河渠道的流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鲜明的实例。

一九四五年夏，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赵守钰率测量队勘察、测量黄河石咀山至河套这一段的流速、降坡与河床变化等。傅将军十分重视水利工作，曾亲自陪同赵守钰参与了这项工作。水利局局长王文景率领技术人员，参加了实际勘察、测量工作，取得了一部分宝贵的水利资料。

#### （五）民养军、军助民、发展农业生产

陕北改编后，增加了两个军的番号。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等三个军，按编制约十万之众。再加何文鼎、朱钺林、马占山、张励生等

部，共计十余万人。军粮问题，已成为突出的问题。

河套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且有黄河灌溉之利，如能充分发挥当地之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的综合力量，军粮民食是可保无虑的。只因黄河泥沙过多，渠道日久沉淀，每年挖渠清淤费用太大，成为老百姓的一大负担。且人力不足清淤困难，但泥沙不除，水流不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遂成为老大难问题。傅作义将军学习诸葛亮屯田五丈原的经验，结合河套的实际情况，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号召。一方面组织部队屯垦戍边，自己生产粮、油、菜；另一方面动员十万军工支援老百姓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每年一到春天，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有的帮助地方挖渠清淤、修堤打坝；有的赶着骡马车辆，帮助老百姓春耕、送肥。到了秋天，帮助老百姓收割、打场。上述劳动，都是志愿的、无偿的，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和好评。结果，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粮食丰收，老百姓也富裕了，军粮补给也充足了，真是一举三得。

那时，傅将军特别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在副长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指挥军民兴修水利。主要指挥部队协助地方挖泥修渠，使水流畅通，以灌溉田园。一九四五年春，河套地区所修

的渠道，宽五丈以上的干渠，全长一千七百里；宽一丈以上的支渠，超过一万里。使河套形成渠道纵横，渠水遍流的局面。这种屯田助民活动，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繁荣河套经济，起了良好的作用。当时，河套被誉为“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确实名不虚传。因此，军民得以丰衣足食。

河套地区当时共有老百姓二十六万多人，能够养活十五、六万军队是不容易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奇迹。

当时民间诗人有春耕诗一首，词意清新，曾登在《奋斗日报》上，其诗云：“朝阳初露南风吹，草原花开春永生，有女簪花临风舞，笑将谷粒撒田间”。

#### （六）实行新县制与训练国民兵

五原大捷后，抗日军事形势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傅将军为了励精图治、生聚教训，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决定改革地方行政，实行新县制。其办法：缩小县的范围，取消区级行政机构，加强乡（镇）级行政力量，实行保甲制度；肃清日特汉奸，发展农业生产，训练后备民兵。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训练一大批新的行政干部，使政令能贯彻到基层。因此，决定在绥远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成立“新县制训练班”，以训练培养适

应“新县制”所需的人才。

一九四二年一月，在陕坝成立了“新县制筹备委员会”，聘请民政厅长陈炳谦，财政厅长李居义，建设厅长曾厚载，教育厅长潘秀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张遐民，粮政局局长俞杰，地政局局长周北峰，公路管理处处长刘建勋，水利局局长王文景，物资管理处处长王国英，绥远省动员委员会书记长于纯斋……等人为筹备委员，负责筹办。

一九四二年二月，在绥远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成立了“新县制干部训练班”。训练方式主要是上大课、小组讨论和大会讨论。每个人带小凳子一个和笔记本、图板等。讨论提纲内容分民、财、建、教、田粮、水利、农林、合作、地政等。各专业负责人根据各小组讨论的意见，作出业务专题总结，经大会讨论后，由傅作义将军作扼要的大会总结，结束大会讨论。

关于整体干部的“干部条件”与“干部戒条”，是新县制干部训练班的重要一课，曾作了长时间的学习讨论。这两个文件，都是由傅作义将军在早晨升旗讲话时亲自讲解的。所以，一般行政人员特别重视这两个文件，都将文件背得烂熟。这两个文件，对干部的品德修养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一九四二年六月，“新县制训练班”毕

业结束。绥远省政府人事委员会，适当地进行分配工作。

新县制实行后的行政区域规划是：除原来的五原、临河、安北三县外，另增加了米仓县（原临河第四区，以杨米仓开挖杨家河而命名），晏江设置局（原五原第三区及第二区的一部，以纪念五临警备旅贾晏如团长、三十五军赵寿江营长在五原战役牺牲而命名），狼山县（以在狼山湾而命名），陕坝市筹备处。各县原有区公所一律裁撤。当“新县制”开始时，首任五原县县长由竹生，临河县县长王映荣，安北县县长乔学曾，米仓县县长张福生（县址三道桥），狼山设置局局长赵国鼎（县址永安堡），晏江设置局局长贾业骏（县址乌志台、后移塔尔湖），陕坝市筹备处处长常佩山。以上七县市，共辖九十四个乡镇。

“新县制”于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实行，其特点是缩小县、乡、保的行政范围，充实基层人员，加强行政效能，使省级政令得以贯彻执行。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训练民兵。自从新县制实行后，即对适龄青壮年（十八至四十五岁），分批进行军事训练，在绥远省保安司令部主持下，将河套划为两个管训区，进行集中训练。第一管训区在临河县，第二管训区在五原县，共训练了七期，将河套青壮年基本上训练完毕，为争

取抗战最后胜利，实行反攻，积蓄了力量。这是按照历史上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练”的精神办理的。按照现代语说，就是“全民总动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 （七）伊盟“三·二六”事变与善后工作

### 1. 事变发生的原因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在水召开军事会议时，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为了解决驻军粮食问题，建议在伊盟开荒五万顷。蒋介石询问傅作义是否可行，傅答以原则可以，但开荒不宜过多。蒋介石当即指示陈长捷试垦五千顷，以后再继续开垦，详细办法须与傅研究决定。但陈长捷刚愎自用，蛮横成性，没有和傅将军详细研究商定，竟断然自定开荒一万顷，以后又继续开垦。他一面通知各区照办，一面直接招人开荒。他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地好，就开什么地”。其中不但包括各旗的脑包地、庙地、苏把汉会盟地，甚至伊金霍洛的“禁地”也要开垦。

陈长捷作好布置后，便到扎萨克旗会晤伊克昭盟盟长、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即沙王），通知要开荒。沙王当时答复：“此事关系全盟蒙民的生活问题，我一个人不敢答应，要各旗的官民同意才能决定，应该从长计议”。而陈长捷竟然说：“此事委员长（指蒋介石）已决

定，无论如何非开不可”。沙王虽然听懂陈长捷的汉语，但未表明态度。当时，担任翻译的绥境蒙政会委员胡凤山，听后非常气愤，从旁说道：

“总司令此来，说是和沙王商议开垦荒地，但如此谈法，哪有商量余地”。沙王表示同意胡凤山的话。此次会晤，不欢而散。第二天，陈长捷即返回东胜。从此，沙王对陈长捷有了戒心。

陈长捷要大量开垦牧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盟。蒙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反对开垦，大家认为：伊盟自清朝中叶开荒以来，已历一百余年，凡是可垦的地方，已开垦殆尽。剩下的地方，绝大部分是沙碛之地，是蒙民赖以放牧牲畜的牧场，绝不能再开了。

陈长捷一意孤行，不顾全盟蒙民的反对，竟在东胜他的总司令部，呼此旗唤彼旗，宣布垦荒地点和数字，引起蒙民更大的愤慨。沙王曾经派员交涉数次，始终无效。陈长捷一再表示，荒地非开不可，毫无商洽余地。沙王看到商谈不会成功，便借阴历十月初三祭祀成吉思汗之际，武装抗垦。会后，一面派人到杭锦旗、乌审旗、鄂托克旗秘密传达会议决定；一面令扎萨克旗保安队在阴历年前集合完毕。各旗蒙民对此都很拥护，并积极准备。

陈长捷对沙王的抗垦，也有所闻。于是采取

拉拢沙王左右亲信的办法，企图刺探消息，以便从内部破坏沙王的计划。于是便找到沙王的亲信白音仓。白音仓本系北京雍和宫大喇嘛姘妇的儿子，为人机警聪明，蒙语颇为流利。经白大喇嘛介绍，名义上给沙王当随从，实际上常跟扎萨克旗掌京僧格林沁办事。僧格林沁代表沙王出外公干时，白音仓担任翻译。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占绥包，僧格林沁留居包头，应付日伪，白音仓便有机会接近沙王，得到信任，逐渐弄权。白音仓在两、三年内便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身兼国民党党、政、军、团八、九个重要职务。他一面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树党营私，一面欺蒙沙王，把持各机关事务。他的派系中的重要分子王兰友、顾兆忠、王天毓等，都是宵小之徒，经常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引起仕官们的不满；尤其强迫保安队集体参加国民党，引起了扎萨克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和第一连排长老瑞的反对。白音仓的蛮横行为，引起蒙旗各阶层人士的痛恨！但沙王对白音仓依然信任。

陈长捷为了逼迫沙王，以达到开垦荒地之目的；对白音仓等大加赏识，经常派人与他们往来。白音仓亦派其羽翼王兰友、顾兆忠去东胜通风报信，出卖蒙旗的机密。对于开垦一事，更为积极。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间，沙王派白音仓前往东胜见陈长捷谈判开荒问题，并且嘱其只能答应开垦较少数荒地，以示让步。不料白音仓竟擅作主张，逢迎陈长捷，当面承认了大量开垦荒地。等他返回扎萨克旗向沙王汇报后，鄂齐尔巴图等扎萨克旗仕官都反对，并访白音仓，研究妥当解决办法。白音仓竟面斥鄂齐尔巴图等说：“你们是官儿，有意见可以到东胜说去”。鄂齐尔巴图闻言甚怒，拂袖而去，另谋对策。

自从白音仓强迫保安队“集体入党”，到鄂齐尔巴图等反对大量开荒，中间经过一系列的冲突。白音仓团伙和鄂齐尔巴图、老瑞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与激化，彼此都有消灭对方的打算。特别是在因开荒问题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以后，更坚定了鄂齐尔巴图、老瑞等要杀死白音仓的打算。对此，白音仓也有所闻，他决定暂时逃避，不久，就去榆林暗作安排。回来后，预备逃到鄂托克旗逗留一时，一九四三年二月间（阴历正月十七日），白音仓在由榆林返回扎萨克旗途中，果然被扎萨克旗保安队第五连击毙。陈长捷闻讯后，气势汹汹，一面致电沙王要求“缉凶”，在电文中说：白委员忠诚为国，不幸为奸匪刺杀，请速缉捕凶手，以慰忠魂。否则，即派兵来扎旗搜捕。一面派骑七师李连，侵驻伊金霍

洛，用武力威胁沙王。同时，白音仓的羽翼顾兆忠等积极活动，声言要为白音仓报仇。这就加速了事变的爆发。

## 2、事变的经过

骑七师李连侵驻伊金霍洛（距沙王府约三十里许）后，形势马上紧张起来。他们剑拔弩张，准备武力开荒；而扎萨克旗军民认为非武装反抗不可。鄂齐尔巴图和保安队见形势紧迫，便改变了原定的计划而提前行动。匆匆忙忙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晨四时许，首先在扎萨克旗的街上发动事变，分路杀死白音仓的主要帮手王兰友、顾兆忠，逮捕了白音仓团伙的其他徒众，拘禁在一处；并拘捕了国民党绥蒙党部主任特派员赵城璧（蒙古人），捣毁了国民党党部。

事变发生后，胡凤山、贺耆寿、任秉钧等，和扎萨克旗仕官们都来到蒙政会商讨办法。胡凤山等首先劝告老瑞等暂停杀人，提出用和平方式处理问题的意见，以避免演成蒙汉民族仇恨。老瑞等开始不许，经过一番劝告，才勉强同意。沙王见形势紧张，上午八时，召集胡凤山等和仕官们在王府开会，商议阻止骑七师前进的办法，并研究进一步对付陈长捷的行动。当时决定：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等，说明事变原因，要求停止开荒，以维系蒙民生活；致电陈长

捷劝他临崖勒马，以免造成更大损失；派贺耆寿到再生召，劝阻骑七师前进；派任秉钧到榆林，请邓宝珊、高双成调解；留下胡凤山、奇世勋协助沙王处理一切。

四月一日至二日，陈长捷玩弄两面手法，一面来电表示不派兵来，愿意和平解决；一面令骑七师软禁贺耆寿，并要求保安队撤离王府。在一阵和缓的情况下，陈长捷突然在四月三日拂晓，四面围攻沙王府激战终日，炮火猛烈，街上建筑物毁坏不少，沙王府亦遭到破坏。沙王因众寡悬殊，遂于当天下午五时许，率保安队三十余名携眷带上印信向乌审旗退去。

陈长捷一贯压迫和残杀蒙古人民。他刚到伊盟，便以共产党的“罪名”枪杀了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他把贺耆寿、胡凤山、任秉钧也看成是可疑分子，他密令骑七师和二十六师借事变的机会，捉住就杀。当贺耆寿第二次赴骑七师办交涉的时候，便被软禁，在攻击王府时，卒被杀害。胡凤山也曾被陈长捷捕去，监禁在东胜，企图杀害。后来经过傅作义再三去电，才解往陕坝后释放。任秉钧则因为到了榆林，由于有邓宝珊的庇护，始免于难。

### 3. 事变和平解决

一九三八年秋季，沙王赴重庆路过延安时，

中国共产党曾派员热情招待，并对他说明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他对党有了初步认识。因此，在“三·二六”事变后，他就毅然奔赴边区附近——乌审旗南部章高图、石边庙二处，与党往来。中国共产党对沙王颇为关怀照顾，给保安队补充了弹药、服装和给养，对沙王赠送了生活用品。并派张旅长、曹开诚二同志，经常与沙王联系，讲述党的各项政策，这对沙王和蒙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对陈长捷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促使事变迅速地结束了。

傅作义将军调任秉钧、康济民到陕坝，询问事变详情，又令胡凤山、经革陈到陕坝开会，商议解决办法，决定要尽力促使沙王回来。同时，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撤销陈长捷的伊盟警备总司令的职务，并停止开垦。沙王于九月下旬，由石边庙（解放区）返回鄂托克旗的阿拉庙（章司令驻地），受到章司令的热情接待。两天后，傅作义的代表、马鸿逵和胡宗南的代表都来了，在阿拉庙商谈了两、三天，就算和解了。沙王随即返回北萨克旗。

一九四三年十月上旬，国民政府下令撤销了陈长捷伊盟警备总司令的职务；同时，宣布停止开垦伊金霍洛的“禁地”、各旗的脑包地、部分庙地和沙王的祖坟地。震动一时的“三·二六”

事变至此结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姚琮、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偕同傅作义将军来到扎萨克旗慰问沙王，并赠送了礼品。

#### （八）试行耕者有其田

古语云：“民以食为天”、“足食足兵”、“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兵无粮自溃”。傅将军半身戎马，守城名将，对此体会甚深。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必须保证军粮供应无缺；同时，要统筹兼顾，保证民食充裕。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军粮民食充足。此时，清丈土地，业已结束，丈余的土地均已收归国有，而河套地广人稀，有不少公田，因无人种耕而放荒；同时，也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缺少土地耕种。为了使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进一步发展生产起见，傅将军遵照孙中山先生“要使耕者有其田”的遗教，并参照我国古代“一夫授田百亩”的精神，令地政局制定办法：凡有劳动力、有车马而无耕地的农民，可以提出申请，由地政局无偿拨给公田一百亩，作为永耕地，并发给“部照”，但不得转租或转让。这样，既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又收到发展农业生产的实效，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

## 七、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蒋介石对非嫡系军队（俗称杂牌军），一向采取拉拢利用、控制溶化或相机消灭的办法。对傅作义将军也不例外。抗战初期，傅作义将军在山西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时，在晋西北河曲、保德、偏关、五寨、神池……等地与八路军团结互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多次抵制阎锡山的反共措施，曾受到阎锡山的歧视与排挤，矛盾日益尖锐化。蒋介石闻讯，感到有机可乘，于是，在武功军事会议上，决定调傅作义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脱离二战区，率军开往绥西河套，扩充为三个师，为他看守大西北的门户。这样，既削弱了阎锡山的势力，又拉拢傅将军为己所用，一举两得。下一步，就是对傅部进行控制溶化。军统特务与中统特务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涌进河套，进行控制溶化工作。因此，在这一时期，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或明或暗，时紧时松，渗透到各项工作之中。

蒋介石一贯反共，这是人所共知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但在抗战期间，蒋又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在绥西河套地区，他的反共伎俩还是一箭双雕，既要打击共产党，又要控制傅作义。傅将军为了保持自己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不能不抵制蒋介石

的控制。当特务们把他的亲信列入黑名单时，他就起来保护，他为了保护亲信，也就附带保护了个别共产党员。当特务们紧锣密鼓地反了一阵子共产党后，蒋、傅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逐渐突出了。傅作义对他的部下和亲信常说：“咱们就象在几千斤的太石头夹缝中的苗苗，只能曲曲折折的生长”。的确，傅的半生军政生涯，就是既要依附于强大势力，又不能不抵制强大势力把自己吞掉。

军统和中统特务，大批涌进绥西河套，主要通过以下各种渠道：即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三青团绥远分团、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政治部、国民党中央缉私队、中央通讯社记者等。这些特务们虽然各有分工，但往往互相配合、联合进攻，造成白色恐怖气氛，有如秋肃降临，万马齐暗之势。为了叙述方便，兹就几件大事简述如下：

#### （一）武功军事会议蒋、傅密谈

一九三八年傅将军在晋西北时，阅读了毛主席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对毛主席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颇为敬佩。因此，他想面见毛主席，商讨抗日大计。同年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邀傅参加会议。傅在赴武功前，曾告诉周北峰，他路过延安时，打算拜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嘱周北峰派人给王若飞、徐冰

送信，说他去时因时间紧迫，不能在延安停留，返回时打算在延安住留一日。周北峰按照傅的吩咐，即秘密派人前往延安联系。

在武功会议期间，傅作义决定脱离阎锡山，转到蒋介石的范围，并决定率部开往绥西河套。蒋介石为傅安排了一个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绝大多数战区都没有这个官衔，即使个别战区有这个官衔，也都没有副司令长官部的设置。蒋介石特地为傅作义设置了一个“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算是特殊照顾。由于以上原因，傅作义原拟回程经过延安时拜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打算就变了。他路经延安时，连停都没敢停，一直越过延安若干县，在一个小村子吃了饭，就直达榆林。他在榆林即召集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门炳岳、白海风等人开了一天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他的部队要脱离二战区，归第八战区管辖的决定。随即返回河曲，开始移动队伍。为什么傅作义回程没有在延安停留？这显然是傅受了武功会议政治空气的影响。

据说在武功会议期间，蒋、傅曾密谈过一次。但密谈内容无人知晓，傅将军一向注意保密，恐怕也不会对别人讲。他回到河曲后，在和周北峰的谈话中，仅仅透露了点滴消息，他告诉周北峰，在武功会议期间，他第一次和蒋单独谈



话。蒋说：“汪先生在我飞西安的当日即飞往越南转南京。他走了，走了就走吧。我们还是安排我们的抗日工作。”说明汪精卫投降日寇，其中似有奥秘，事先与蒋有无默契，虽难肯定，但不无疑窦。至于其他问题，傅未讲，谁也无从得知。但从傅回程未敢在延安停留，不问也可想几分。傅将军未能去延安拜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是一件颇为违心之事。说明他此时内心矛盾重重，难以自解。但从此，傅被迫逐渐向右转了。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而阎锡山在山西正企图消灭新军与牺盟会。那时，傅将军正在率部奇袭包头、会战绥西和收复五原，所以他没有参加反共军事活动。在此期间，三十五军政工人员除公开的中共党员已经撤走外，绝大多数都还留在部队里，动员委员会的各级机构也都完整，他们都积极参与了作战行动，动员群众，支援战争。

一九四一年四月，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军统和中统特务，已经控制了绥西河套的有关要害部门，发出反共叫嚣，使整个河套地区，卷入了这个罪恶的浊浪之中，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遭到迫害。与此同时，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日益趋于尖锐化。

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趁机组织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此时，傅将军忍无可忍，正在反控制斗争中实行反击，夺回了舆论阵地与人事任免权，特务们有所收敛，所以绥西河套地区，没有什么大动作。

## （二）强迫军政干部集体参加国民党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傅将军在绥西河套，为了准备出击，召开了抗战建国工作讨论会，军政干部轮流参加，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从而做到统一行动。当时，军政干部中，有国民党员、无党派人员，也有共产党员与民先队员。由于政治倾向不同，在讨论过程中，互相争论，颇为热烈。这本是正常现象，但却引起国民党中央的非议。于是，国民党当局派中央委员苗培成来到绥西，要求排除共产党员，并建立以国民党党员为核心的政治部，逐步做到军政干部全部参加国民党。不久，即任命张彝鼎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苏寿余为副主任。

一九四〇年一月绥西会战时，张彝鼎等政治部人员害怕战争，逃往大后方兰州去躲避。乃至同年四月五原大捷后，已将日伪军大部歼灭，残部赶出河套，张彝鼎等才由兰州返回陕坝。他们返回陕坝后，立即大张旗鼓办理军事干部集体参加国民党的活动，还是那一套“谁不参加，就要

开除，永不叙用”。此时，人事权由政治部掌握，强迫军事干部集体参加国民党。不久，即发了正式党证，每月由薪饷中扣交党费。

为什么政治部一来就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求军事干部参加国民党呢？这是因为：部队在晋西北时，曾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傅将军学习八路军的先进经验，在三十五军建立了政治部并请延安方面派干部协助，因而部队风气，焕然一新，军纪良好受到老百姓的赞扬，有“七路半”的声誉，意即和八路差不多。

但此语传到西安，添油加醋，其含意就变了样，变为和八路军差不多，不久就会变成八路军，甚至说：“三十五军赤化了！”这些传说刺激了蒋介石的神经，所以，派人衔蒋命而来，积极办理军事干部集体参加国民党。其目的—方面是为了排除共产党并清除其影响；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国民党党员的活动，来控制傅作义的部队。

傅将军是国民党党员，他当然不能阻止别人参加国民党。但他意识到这是蒋介石要直接控制部队的一种手法，如累任其发展，部队将无法打仗，甚至会脱离掌握。因此，他巧妙地作不积极的抵抗。他强调军队要打仗，一切要听从指挥官的命令。部队的政治工作，要在部队指挥官的领导下进行，以提高官兵的爱国思想和战斗情绪。

跃连队的政治文化生活，实行经济公开，改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为主要任务。同时，规定国民党党员要服从部队指挥官的命令，在部队指挥官的领导下统一活动，不得单独进行组织（即每周有一次纪念周）活动，不得有小组活动。附带说一句，在绥远省政府所属各行政机关中，国民党党员可以进行组织活动。

### （三）排除共产党，破坏团结

自从蒋介石派苗培成来到绥西河套，要求排除共产党员，建立以国民党为核心的政治部，使傅将军感到为难。因为这些共产党员与民先队员，是一九三八年傅将军派周北峰到延安请来帮助他建立三十五军政治机构的，在部队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官兵们的赞誉（怎能挥之而去呢？但蒋介石的命令又是不可抗拒的，否则，粮饷断绝，无法坚持抗战。在此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硬着心肠，做出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事。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原大捷后，军统与中统特务由大后方纷纷渗透到河套，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政府、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各个角落，企图消灭共产党，控制傅作义。一九四一年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张庆恩，伙同副长官部秘书长

曾厚载，向傅作义提出四百多人的黑名单。傅将军此时亦在被怀疑之列，无力抗拒。进步人士纷纷外逃，没有逃走的人多被逮捕。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即集中营，很快关押了数百人，受迫害被关押的青年，先后共达千余人，仅动员委员会就有百多人被捕。傅的军报《奋斗日报》改组了，新华社的消息不再使用，进步书刊被查禁，进步歌曲不许唱，报刊上不外是些悔过声明、领袖言论、反共叫嚣。一时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了整个河套地区，狼山为之低垂、黄河为之呜咽。表面上虽然如此，但人心所向，进步书籍转入地下传阅，就连傅作义本人也保存了一个小小的禁书图书馆。

#### （四）夺回舆论阵地，二次改组《奋斗日报》社

《奋斗日报》于一九三八年创建于山西河曲，当时是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的机关报，原为油印版，以安邑人景昌之为主编，由三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发行。一九三九年五月迁至绥西五原，改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机关报，后因部队奇袭包头、绥西会战与五原战役而停刊。

一九四〇年春，五原战役结束，四月《奋斗日报》复刊。当时，由西安运来平台机一台，脚踏机两架和新五号铸字炉一座，在陕坝南门外元

长义屹旦建立起营业部，才以八开铅印的面貌与陕坝读者见面。此时，景昌之任《奋斗日报》社社长，高也彭担任主编，杨文照担任副刊总编，王一然、秦丰川、郭灵墅等撰写社论，报刊办得有声有色，为读者所喜爱。皖南事变后，给景昌之同志带来一些麻烦。有一次，把蒋委员长的“蒋”字误排为“将”字，张庆恩认为是有意割“蒋委员长”之头。向傅指责该报主持人有“反动”思想。一九四一年四月，景昌之、高杰和雷表等因共产党嫌疑被遣送出后套。张庆恩借机举荐中央社记者王华灼去接办。傅将军对中统特务掌握他的喉舌很不乐意，所以只交给编辑权，而不让给经济权，将营业部改为印刷厂，成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直属的印刷厂。

一九四一年四月，王华灼接办《奋斗日报》后，拉来几位CC系的特务来装饰门面，他们没有写过一篇有关抗战大局的社论，而却用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来对待读者，引起读者的极大不满。他们还含沙射影攻击傅将军的高级干部，目的在于挖傅的墙脚。傅忍无可忍，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将王华灼调升为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而另派崔载之接任了《奋斗日报》社社长，从而夺回了舆论阵地。这是傅将军在反控制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成果。

崔载之曾任绥远游击军政治部主任，绥远游击军改编为暂编十七师以后，他升任了暂三军政治部主任。但他不愿与赖拂庭（暂编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彭光祖（一〇一师政治部主任）为伍，想显露一下自己的才气，使傅将军知道他的才能。于是他特地写了一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问题论文，叫陕坝第一流刻写钢板的能手尹文骏用美术套色油纸印成单行本，向有关方面散发。结果，这篇文章使王华灼主持的《奋斗日报》相形见拙，引起好多人的重视，也受到傅将军的好评。结果，崔载之取王华灼而代之，当了《奋斗日报》社的社长。

崔载之是一位颇有才学的人，思想比较进步，他接办《奋斗日报》后，约请原游击军政治部和原“动委会”的旧人给报社投稿，把报办得丰富多采，给了人们一种清新的印象，受到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在“青年剧团”演出“北京人”一剧后，他登载了杨文照、郭灵璧等人写的剧评，在河套地区简直是开风气之先，赢得了人们的齐声喝采，誉他是办报能手。崔载之还经常晋见傅将军，作长时间的谈话，讨论国际问题与抗战形势，并涉及到军令和政令的宣传贯彻。《奋斗日报》作为副长官部的机关报与民众的喉舌，它受到傅将军的赞许与广大民众的欢迎。

### (五) 三青团绥远分团的内部斗争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中央要求成立三青团绥远分团部，请傅推荐人选。傅考虑到部队的干部中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傅很重视三青团的建立，对部队可能产生好的影响，所以，荐举自己当时的得力干部赵仲容为筹备主任，但结果还是大权旁落。在特务的引诱下，三青团绥远分团的书记赵仲容投靠了蒋帮，他在绥远分团内安插了很多亲信，使三青团绥远分团实际上落到中统手中。他们以三青团为阵地，打开缺口，十分嚣张。他们在傅部中打击进步分子，捏造黑名单向上报告，经常制造事端，一时把部队搞得团结涣散，乌烟瘴气，不断发生因蒋方人员截抄电报和检查邮件而打架，并接连出现干部失踪等事件。特务们通过邮政局检查，扣压傅部的信件，通过电报局截收傅部的电报，设电台监听傅部电台活动。多次向傅提出黑名单，要加以迫害，甚至连傅的左右亲信也列入黑名单。有一次将傅的机要室主任王克俊也列入黑名单内，傅对此十分气愤，对省党部的人拍桌子道：“我的机要室主任你们都说不好，我的仗怎么打？！打仗的时候你们都跑了，他却跟着我去打仗，怎么不好？！”坚决顶了回去。这是反控制的一例。随着特务们的活动越来越嚣张，傅被迫不得不



采取反控制的措施，以制止他们对部队的瓦解活动，于是傅决心夺回三青团这块阵地。一九四二年傅调王克俊兼任三青团书记和组织科长，对王说：“你去三青团，给你经费加倍，干部由你选调，其他工作可暂放下”。王克俊到三青团后，根据傅将军的意图，更换了一批三青团的干部，开除了一批原来赵安插的私人，保护了一批被列入黑名单的干部和青年，把三青团这个阵地夺回到自己手中。这是反控制措施所取得的第二个成果。

#### （六）成立人事室，架空政治部

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彝鼎等是一九三九年秋来到后套。当绥西会战时，他们全部逃往兰州，躲避作战。五原大捷后，他们又回到后套开展工作。他们所谓工作，一个是强迫军事干部全部集体参加国民党，谁不参加就要开除，永不叙用；另一个是清除和迫害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人士。闹得乌烟瘴气，使人厌恶。

后来，由于政治部科长俞伯华与京剧演员张丽君的桃色事件，几乎使张丽君的丈夫中毒身亡，更闹得满城风雨，臭名远扬。政治部的声誉，一落千丈，几乎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此情况下，张彝鼎还俨然以监军自居，自高自大，盛气凌人，对各军师的政治部强调垂直领

导，安插私人，搞小动作，挖傅部的墙脚。傅将军忍无可忍，乃于一九四三年在副长官部成立人事室，调王克俊为人事室主任，把人事任免权由政治部转移过来，并通过人事室贯彻过去政治工作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排除张彝鼎的干扰。不久，又在原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叫做“整体干部办法”，曾集中登在一九四三年内部刊物《贯彻》第五期上，即前所述的整体干部条件和干部戒条等。这套办法，比以往的办法更为系统，内容更加丰富了。这对于增进内部团结，激励全军的斗志，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密切军民关系等，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套办法由人事室负责考核，贯彻执行。这个办法得到广大军政干部的拥护，收到良好的效果。不但激励了奋斗牺牲的旺盛士气，又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张彝鼎的政治部，被王克俊的人事室不声不响地逐步架空，取而代之了。

一九四四年，美国组织对华救济总署，要在绥远成立分署。傅将军调张彝鼎为绥远分署主任，任命董其武为政治部主任。这是反控制措施所取得的第三个成果。

（七）国民党中央缉私队的活动

一九四二年，国民党中央以缉私队的名义派

来以马汉三为首的一伙军统特务。他们以缉私队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名为缉私队，实为走私队。他们以截抄和监听日寇的电报、电台和抄收国际电讯为名，派来第五工作队，实际上是专门监视傅部的通讯联络，并兼对付共产党的。

傅部的通讯联络，完全是自编密码，副长官部机要室屡次破译蒋方监视傅部来往电报，而傅部自编的密码，蒋方却无法捉摸。马汉三一伙无计可施，乃上报蒋介石禁止各部队自编密码，密码要由国民党中央统一编发。为此，傅派王克俊到重庆与蒋的机要处主任毛庆祥交涉，王以确保军事通讯的机密为理由，据理力争，毛庆祥理屈词穷，最后，只得仍准许傅部自编密码。

马汉三等特务们因长久不能破译傅部的密码，无法监听傅部的军事机密，十分焦急。矛盾的发展，导致了一九四三年六月蒋派其人事大员杨司长到綏西干涉。杨特别抓住《贯彻》第五期的内容，开会指责傅部自提口号，自立办法，妄图自成系统独树一帜。说什么你们搞的这些办法，中央都有相应的规定，你们为何不按中央的办法办？于是，王克俊起立与杨辩论，口舌相争，短兵相接。王说：“你说要按中央已有办法来办，中央的办法你们那些办了？你们说党向国家负责，你们是如何负责的？我们在前方打仗，负了伤没有野战

医院，战死了眷属无人管，枪支、弹药、给养要自己筹，家属要养、子弟教育要管……我们的困难有谁过问？”杨无言以对。傅为了圆场接着说：“克俊，你不要说了嘛！杨司长请鉴谅，年轻人不会讲话，但是，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工作热忱负责，提出的问题都是实际问题，可以研究”，于是，此次干涉以不了了之。但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又趋紧张。

马汉三来绥西河套，一方面是监听傅部军事机密，另一方面是勾结日伪，专门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他和日本特务，蒙奸德王、汉奸李守信、王英等都有勾结，甚至控制了鄂友三、乔汉魁、鄯青云、鄯长青等游杂部队，勾结日伪军与大青山的八路军李支队为敌，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用河套的粮食与日伪交换日用品布匹等，以图暴利。他们名为缉私队，实际上是公开的走私队。

现将马汉三的来历，作一简要叙述。马汉三原名马士杰，河北省宛平县（现为大兴县）庞各庄人。他是当年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的学生队出身。冯的部下，中、高级军官都是由学生队提拔起来的，他在西北军多年，情况十分熟悉。一九三四年，他投靠军统，为蒋介石效命。马对西北军团长以上的文武官员都有全盘的调查，他为军统局提供了西北军的文武官员的名单，履历，是

一份很难得的材料。尤其是对学生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国民党和军队的人，都有较详细的注释。马汉三还为军统局提供了华北汉奸巨魁名单，以及汉奸媚日卖国的情况，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北、东北、内蒙的侵略阴谋情况，也是很详尽的。他的社会活动能力颇强，平日混入汉奸群中，谁也不会把他察觉。他与德王、李守信、王英等都建立了深厚的交情。他简直成了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活字典，因而得到戴的赏识和重用。他参加军统后，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很快地成为军统局北方五大干将之一（五大干将为陈恭澍、王天木两人，都是黄埔四期；刘艺舟、乔家才两人，都是黄埔六期；唯独马汉三是杂牌军出身）。

一九四一年初，马汉三被任命为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处长，公开身份是八战区副长官部的少将参议。同年八月，调往兰州，任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一九四二年初，调任财政部绥远缉私队队长，率缉私队由兰州来陕坝任职（由于他是保密单位，外界人只知他是国民党中央缉私队），同时，兼任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处长。他伙同张庚恩、张彝鼎等掀起反共浊浪，迫害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勾结日伪打击八路军，挖傅部的

墙脚；勾结伪军走私漏税……作了许多坏事。

马汉三为蒋介石效命颇卖力气，竭尽犬马之劳。但后来于一九四八年九月，被蒋介石以贪污罪处死于南京。

#### (八) 蒋派张治中来绥西慰问

傅将军在河套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已经拥有精兵十余万，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按照蒋介石对非嫡系军队所采取的办法，既要控制，溶化，又要拉拢、利用。他想利用傅部力量为他看守大西北的门户，等到反攻的时候，还要利用傅部为他抢占地盘。而傅将军坚持抗战到底，也盼望在反攻之时直下平津，驱逐日寇出中国（他经常在汇报会上讲，绥西河套离平津最近，且是下坡路，待反攻之时，他的军队将最先到达平津）。这与蒋的意图大体相同。因此，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时而紧张，时而和缓。紧张而不至于破裂，和缓而仍不放弃控制。

一九四三年八月，蒋介石为了和缓对傅部的渗透与控制，特派张治中将军前来陕坝，对傅部进行慰劳，并对傅将军好言抚慰。另外，增拨一〇五野炮四门，以示支持蒋傅之间的关系，又趋和缓。

## 结束语

河套军民是英雄的人民，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抵御日寇，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与日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经过多次浴血奋战，反复较量，终于将日伪军大部歼灭，残部赶出河套地区，获得了五原大捷。河套人民为了抗日救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这是河套人民的光荣。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脱稿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傅作义在河套（续编）

作者 =

页数 = 2 9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